

大劫掠

第二卷——埃及远征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

历史小说



内容简介

《大劫掠》第二卷——埃及远征（1798—1801）

《大劫掠》是一部以拿破仑掠夺行径为主题的四卷本历史系列小说，本书为其第二部，讲述其中最为壮观的一次大掠夺——埃及远征。

1798年5月19日，三百艘战舰从土伦起航。舰上载有一支四万人的大军和一百六十七名学者。他们的目的地是机密，而他们的使命，只对公众保密。

贝托莱在私人笔记中称这次行动为“征集行动”，波拿巴则称之为“科学远征”。这是同一现实的两个名称，小说一步一步地追随着它——从攻占马耳他，到尼罗河畔，再到巴黎的工坊，《埃及志》诞生于此。

透过德农的笔记本、若马尔的经纬仪、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标本瓶，以及贝托莱的沉默，启蒙式掠夺的内在机制得以显现：学术之举的美，与它所掩盖的掠夺之暴力。而在字里行间的边缘，哈桑·伊本·优素福——译员、见证者、记忆——记下了学者们从不书写的东西。

旅程的尽头，一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带走一件物品与带走它的影像，究竟有何区别？罗塞塔石碑在伦敦，拓片在巴黎，而埃及，依旧留在它的河岸。

作者简介

罗贝尔·卡萨诺瓦斯已出版《被盗的房间》《遗嘱是伪造的》和《掠夺》。他是荣休高等教师资格教授，法国文人协会（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会员。作为一名醉心于艺术收藏史的法学家，他多年潜心研究国家对艺术品的侵占问题。他现任“国际归还”（International Restitutions）非政府组织主席，并就此课题发表了大量学术著作。



《大劫掠》

历史小说，共四卷

Robert Casanovas

casanovas@hotmail.com

法定送存：2026 年 4 月——数字电子书及纸质版

© 2026 Casanovas。保留所有权利

ISBN : 978-2-488999-74-8

www.international-restitutions.org

封面：罗塞塔石碑的等大复制品，置于光学剧场之中，现藏维夫商博良博物馆（法国伊泽尔省）

2022 年 7 月 17 日——朱利安·佩亚尔



法文版

第二卷

1798—1801 年——埃及远征

第三版，修订勘误本

同一作者作品：

《被盗的房间》（历史小说）

《遗嘱是伪造的》（历史小说）

《掠夺》（历史小说）

《大劫掠》——第一卷——体系的诞生（历史小说）

声明

本书是以真实研究为基础的历史虚构作品。书中提及的所有作品，确实都是在 1794 年至 1813 年间法国的征服战争中被掠走的。

书中大多数人物确有其人。事件的进程再现了真实且经过考证的史实。

出于叙事的需要，书中部分人物、场景和对话系虚构而成。

本书原版以法文写成，后来被翻译成多种外语。这些译本中或许存在语言上的错误、误译或不够准确之处。

目录

第一章：东方整装

第二章：溯尼罗河而上

第三章：学者的时代

第四章：溃败与归途

大劫掠

历史小说，共四卷

第二卷——埃及远征（1798—1801）

第一章：东方整装

I - 从土伦到马耳他

1798年5月19日清晨，克劳德-路易·贝托莱在土伦码头上拾起一截涂了柏油的缆绳，凑到鼻前。四周，三百多艘舰船正在起航，锁链声与号令声响成一片。

缆绳散发着斯堪的纳维亚松木焦油的气味，混着地中海的盐味，还有某种他一时辨认不出的东西。一种植物树脂，也许是希俄斯的乳香脂。他把它放回口袋，打算上船后再分析。码头在脚下震颤。这气味让他想起了美丽之国。

1796年，波拿巴曾派他与加斯帕尔·蒙日前往意大利。任务是在意大利诸侯的收藏中，找出值得送往卢浮宫的东西。他们走遍了米兰、博洛尼亚、罗马的宫殿，记下作品的标题与尺寸。画作随后装进木箱运走，一幅幅分别装框，裹以毯子。有些运抵时已受损。有些则完好无损。他并不觉得这件事难做。这是应用科学：辨明一件物品的价值，将它保全，再把它挪走。逻辑与此处如出一辙，只是对象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次远征与在意大利所做的是同一回事，不过规模更大。波拿巴称之为科

学远征，贝托莱在私人笔记里却称之为征集行动。后一个词更准确。

不同之处在于埃及。意大利有藏家、有市场、有价格。埃及有的是封闭了三千年的陵墓。

在一百二十门炮的旗舰“东方号”甲板上，波拿巴注视着舰队缓缓启动。目的地何在，士兵们并不知晓。

舰船正在调度，蒙日在笔记本的封面上涂写着方程式。他没有看码头。凡是无法计算的东西，蒙日从不去看。

更下面，在C层舱内，埃德姆-弗朗索瓦·若马尔在两个滑轮之间拉直一根细绳，测量一条走廊的长度。他八个月前才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毕业，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法国。细绳显示三米六十二。得到这个已知数值后，他在心里乘以数得的走廊数目，推算出船身的长度，误差不超过两米。

让-巴蒂斯特·傅里叶，三十岁的数学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在上层甲板的一间舱室里安顿下来，随身带着一摞关于代数方程的论文，整个航程中却一页也不会翻开。促使他登船的，并非实地科学——这方面他毫无经验——而是眼前有一整个文明可供丈量。

多米尼克·维旺·德农久久凝视着空荡荡的地平线。

在狭小的舱室里，他自登船以来第三次整理器材。先是素描本，按开本分类。炭笔装在皮套里。鹅毛笔，黑墨水与深褐墨水，粗细不一的画笔则卷在帆布卷中。这套整理，他早已烂熟于心——每件工具各得其位，每个位置各有其用——正如语法学家熟知自己的语言。不是为了说，而是为了永不丢失。重新整理一遍，让他觉得自己掌控着某样东西。埃及在他脑海中依旧没有形状。而他的器材，却有。他想：万一其余一切都出了岔子，至

少我的工具井然有序。这大概就是严肃工作的定义。从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开始。

波拿巴用一封十行的信招募了他：*您将描绘那些古迹。*这就够了。他没有问去哪里，没有问何时，也没有问是什么条件，便接受了。

舰队花了好几个钟头才驶出港湾。岸上，女人们在哭泣，孩子们挥动着手帕。德农望着海岸渐渐远去。

“您害怕吗？”若马尔问他。

“不。我迫不及待。这是两回事。”

舰船驶向外海之际，他画下了沐浴在晨光中的波拿巴的侧脸。多年以后，这幅速写出现在他的《*上下埃及游记*》。

从土伦到埃及，航程逾一个月，中途在马耳他停靠。舰队横渡地中海，保持着相对的航行静默，避开纳尔逊，靠的是运气，也靠纪律。第一个停靠点并不是亚历山大。

最初几天，海面平静。学者们涌上甲板，摆出仪器，进行测量，记录风向。若马尔通过数绳结来计算舰队的航速。博物学家们用网捕捞标本。德农的素描本渐渐画满：鼓满的风帆，幽暗的船身，水面上变幻的光。他画海不如画古迹那般得心应手，但仍在尝试。人人都在尝试。

波拿巴则整日读书。他带上船的是一座精心挑选的行军图书馆：亚历山大的战役，恺撒的评述，波利比乌斯的历史，阿拉伯旅行家们关于埃及的记述。他读得很快，折起书页，用密密的字迹在页边做批注。一天早晨，蒙日撞见他又一次重读沃尔内的叙利亚与埃及旅行记，此书出版于十一年前。

“沃尔内太悲观了，”波拿巴头也不抬地说，“他只看见了衰败。我们将看见源头。”

波拿巴合上书，放在膝头。蒙日看出了他的一个典型特征：波拿巴读书并不是为了被驳倒。他读书，是为了替自己早已打定的主意找到先例。

“东方号”的图书馆本身就是一个机构。波拿巴把它筹备成一所漂浮的小型学院。每晚设有朗读会，围绕随船携带的著作交换看法，就埃及的古代史展开辩论。这些夜晚，主要的学者与对文学感兴趣的军官们聚在大舱室的桌旁。人们读希罗多德，谈修昔底德，争论罗马覆灭的原因。波拿巴主持会议，时常发言，展现出名副其实的深厚历史修养，令研究院的教授们印象深刻。

“我感兴趣的问题，不是文明为什么消亡，而是它们为什么长存。埃及延续了三千年。是什么使一个国家在三千年里如此稳定？”

傅里叶提出了一个假设，关乎尼罗河泛滥的规律与收成的可预测性。他喜欢历史例证，因为它们赋予抽象的观念以时间的分量。数千年来年年如期的泛滥：这是单靠数学无法给出的论证。尚未抵达埃及，吸引他的就已是这一点：这个文明没有代数——而他正以向学生讲授代数为业——却解决了灌溉、建筑、天文等复杂的问题。解答先于理论。这既令人不安，又令人着迷。贝托莱谈到了权力集中于中央行政机构。德农回答说自己不知道，只盼能在古迹中找到一些答案的线索。

波拿巴向贝托莱俯过身去。

“在意大利，我们与诸侯谈判。这里没有诸侯。只有无人认领的陵墓和古迹。我们将要拿走的东西，早已没有在世的主人。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别。”

贝托莱回答说，没有在世的主人，并不等于没有主人。但他说得很轻，而波拿巴已经重新拿起了书。贝托莱又盯着灯焰看了一会儿。自威尼斯以来，自米兰以来，他

就明白，正确的词与有效的词并不总是同一个。波拿巴并不征求他的意见。他要的，是让他认可一个早已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远征的代价，而贝托莱在登上“东方号”时就已接受了它。

第十天，天气变了。一阵西北风迫使舰队改变航向。船只略有分散，随后在海军上将布吕埃斯的号令下重新集结。士兵病倒了。若干学者也病倒了，其中有蒙日，他在铺位上躺了两天，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手边放着一只脸盆，多年来头一回连书也翻不开。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种沉默等于认输。生病的蒙日从不抱怨。他只是认命地等待，等身体肯重新干活。

德农在甲板上继续画他的素描，丝毫不受晕船之苦。大海呈现出一种他在绘画中从未见过的蓝。一种强烈的、近乎咄咄逼人的蓝，与克劳德·洛兰的海景画毫无相似之处。要表现这种蓝，必须另找一种画海的方式。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关于目的地的问题，长久得不到答案。

波拿巴已向军官们分发了密封的指令，只许在海上拆阅。士兵们纷纷猜测。耳边传来各式各样的名字：英国、葡萄牙、爱尔兰、安的列斯群岛、马耳他、印度。有些消息更灵通的人低声说出“埃及”，但这个名字显得如此遥远，如此不可思议，几乎没有人敢相信。那一天，猜测之声甚嚣尘上。

次日，波拿巴向高级军官们透露了目的地。埃及。地中海的非洲海岸。尼罗河、金字塔、撒哈拉沙漠、底比斯与孟菲斯的废墟。消息很快在学者中间传开。反应因人的性情和他们最担心的事而各不相同。贝托莱立刻思索起尼罗河水的化学含义和埃及泡碱的性质。蒙日晕船初愈，只简单地答道，他希望能找到饮用水。若马尔什么

也没问。他把自己关进舱室，花了两个小时重读他关于古代灌溉系统的笔记。他更愿意先弄懂自己将要看到的东西。

德农从背包里取出希罗多德。书自己翻开了，正是谈到金字塔的那一页。装订自有习惯，一如他自己的习惯。他浏览着莫伊里斯湖、哈瓦拉迷宫，以及这位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旅行家笔下的吉萨金字塔。希罗多德与此刻相隔两千三百年。而金字塔依然矗立在那里。德农合上书，没有做记号。那个地方自会记住。

在远远避开西西里海岸之后，舰队转向东南。太阳升得更早，落得更晚。暑热渐增，预示着前方等待着他们的纬度。从未离开过法国北部的士兵们望着地平线，好奇中掺杂着忧惧。对许多人来说，这片海已经是已知世界的边缘。

第十八天夜里，是整个航程中最美的一夜。不是最温和的——空气里仍带着白日的暑热，混着焦油和盐的气味——却是最澄澈的。天空无云，下弦月刚刚升起，洒下冷冽而分明的光，仿佛有人在地平线上放了一盏灯笼。护卫舰的白帆像湿润的纸一样闪亮。战列舰的黑色船体在平静的水面上投下清晰的影子。几乎听不见浪声——只有桅杆缓慢的吱嘎声，搜寻风向的船帆发出的沉闷拍打声——还有，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说不清是人声还是夜鸟的啼叫。

午夜时分，波拿巴来到德农身旁。这是他登船后养成的习惯。夜里在甲板上巡视，独自一人，或几乎独自一人，而军官们都在睡觉。他倚在舷墙上，许久没有说话。

“您夜里画得比白天好。”

“夜晚抹去了无用的细节。只剩下本质的形体。这更诚实。没有什么新东西。一切都被看过。但还没有人精确地

画过。希罗多德描述金字塔，却没有尺寸。斯特拉波提到它们，却不理解它们。我想做的，是带回一些图像，让人无法说它们是粗略的。”

波拿巴点了点头。这种思路，他是理解的。远处，左舷方向，能辨出一道暗色的线，可能是西西里海岸，也可能是低低的云层。两人谁也没有去问值班军官那是什么。就在这同一个夜晚，在向西数日航程之外，纳尔逊的舰队正在搜寻法国舰队，却不知它在何处。两支舰队，一片海，中间是黑暗。倘若风向不同，德农装进笔记本里的一切，都会随着舰船一同沉没。将被带走的与不会被带走的，并不只取决于人。也取决于风。

6月9日，经过三周的航行，法国舰船抵达了瓦莱塔港外。马耳他岛自1530年起由耶路撒冷圣约翰骑士团统治，以号称坚不可摧的要塞扼守着地中海东部的入口。

波拿巴召集他的主要将领和学者，来到城墙前。

“这些城墙在1565年抵挡过四万土耳其人。但今天守卫它们的骑士们年老、分裂，又没有钱。我们不需要强攻。我们只需要等待。”

路易·德塞将军，一位有着苦行者面容的军官，统率着军队的一个师，此时插话了。

“波拿巴将军，您关于骑士团内部分裂的情报可靠吗？”

“马耳他骑士分成了互相敌对的派系。大团长软弱无能。他们不会抵抗。我们很快就能进城。”

蒙日觉得有必要提个问题。

“将军，您打算以什么理由进攻马耳他？它并未与法国交战。圣约翰骑士团是一个长期受到国际承认的主权机构。这样的侵略难道不会招致负面的外交反应吗，尤其是来自教宗和欧洲各天主教国家的反应？”

“蒙日，我亲爱的朋友，你是数学家。去算一算，如果英国人封锁我们的航线，我们在埃及能坚持多久。马耳他，就是那把锁。至于外交上的理由，那不归你管。我的副官会处理。”

蒙日不再作声。他明白了界限在哪里。

登陆在岛上数处同时展开，守军被打打了个措手不及。抵抗持续了三天。马耳他在6月12日宣告投降。

清点结果显示出数量惊人的贵金属。足以支撑数月的战事。德农穿过宝库大厅，委员们正在那里逐箱清点。

骑士团的财富首先是钱币：银锭、金币、礼拜用的金银器。据贝托莱估计，价值三四百万法郎。

但让他驻足的却在别处。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圣器室里，士兵们正在摘下画作。中殿的穹顶——马蒂亚·普雷蒂于1661年至1666年间直接画在石头上的、关于施洗约翰生平的巨幅组画——无法拿走：太大，也太固定。只好留下。但架上画是可以拿走的。

他认出了普雷蒂的几幅画：一幅《施洗者约翰被斩首》，阴沉而暴烈，从它的礼拜堂里被扯下；几幅骑士团大团长的肖像；还有一幅巨大的《拉撒路复活》，属那不勒斯画派，正被毫无顾忌地卷起。

德农也看到了那些没有被拿走的东西。在见习修士的祈祷室里，自1608年起作为祭坛画悬挂在那里的：《圣施洗约翰被斩首》，卡拉瓦乔最大的一幅画，高三米六十，宽五米二十，一场黑与红的风暴。刽子手朝无头的尸体俯下身去，血在地上汇成一摊。画家在这血泊中写下了自己的签名：*f. Michelangelo*。这是他唯一签过名的画，而他偏偏把名字签在受害者的血里。他自己曾杀过人。这幅画知道。

一名士兵走上前去，估量能否把它摘下来。德农把手按在他的胳膊上。

“这一幅不能走。它是为这面墙画的。上了船，它会死的。”

士兵看了德农一会儿，又看看那幅画，耸耸肩，到别处去了。画留了下来。

他在笔记本里记下尺寸、主题、签名，然后在画前停留良久，没有再写。这幅画有一种罕见的特质。它反过来审视观看的人。不是那位被斩首的圣徒。而是俯身向着死者的刽子手，或是那个转过头去的狱卒，似乎在询问观看这一幕的人：而你，你要带走什么？

骑士团医院的金银器——餐桌上的水盆、烛台、圣体盒——被全部没收。马耳他的医院有大理石地面、挂毯，还有据说在欧洲独一无二的银器。它们将被熔成银条。来这里就医的病人今后只能用锡碗进食。

同一套过程，他想。每一次征服，都为下一次提供资金。

《印度壁毯》，挂毯产自戈布兰工场，图样取自拿骚-西根亲王约翰·毛里茨从巴西带回的绘画，色彩依然鲜艳，描绘大象、鹦鹉、热带要塞和异域宫廷场景。由路易十四所赠。法国国王曾赠给骑士团的东西，如今法国军队就要夺走。--

他记下尺寸。最大的几幅，高约两米五十，宽约五米。羊毛与丝线织成。它们本可以卷起来。却没有卷。士兵们或是没来得及，或是不懂它们的价值。

“把挂毯留下，”德农对负责监督清点的军士说，“自路易十四时代起，它们就已属于法国。”

外面，人们正把箱子装上小艇。黄金、白银、手稿、指定的画作。骑士团的图书馆，数千册拉丁文、法文、阿

拉伯文、土耳其文的书，被留下了。没有地方。没有时间。革命的士兵洗劫得很快。学者们则捡拾剩下的。

图书馆约有两万册藏书。摇篮本、中世纪手稿、自十二世纪起积累的航海与制图论著。士兵们不知道拿这些书怎么办。一名中士问这些值不值钱。德农回答说值，有一些值。中士说他没有箱子。德农找来两只，亲手把最古老的手稿放了进去。约一百册，凭直觉挑选，没有目录，没有别的标准，只看羊皮纸显得有多古老。其余的——近两万册——留在书架上。

留驻马耳他的法国守备部队，将在两年里把它们当作包装纸和燃料来用。

望着装满货物的小艇驶向舰船，贝托莱在他的观察笔记里写道：“佛兰德斯的掠夺是有条不紊的，意大利的掠夺是博学的，马耳他的掠夺则是仓促的。每场战役都依可支配的时间与在场的人手，形成各自的劫掠方式。埃及将是另一回事。不是一座三天之内就能掏空的城市，而是一个要花上数月去穿越的国家。那里的劫掠将是缓慢的。”

舰队于 6 月 19 日晚起锚。德农站在甲板上，望着瓦莱塔渐渐远去。一座淡黄色石头砌成的城市，城墙一直延伸到海边，还有巴洛克式的钟楼。仓库里，箱子与黄金、银器堆在一起。在他的笔记本里，有要塞、大教堂和港口的素描。被带走的与被留下的。他已经知道，自己不会再见马耳他。

黄金可以重新熔铸。艺术品一旦被挪走，便再也回不来。

II - 从亚历山大到尼罗河

法国人一路数度避开纳尔逊，7月1日，瞭望哨报告望见了埃及低矮的海岸。一股炽热的沙土与盐的气味。蒙日天一亮就已站在甲板上。

“亚历山大。欧几里得，埃拉托色尼，托勒密。七十万卷藏书被焚毁。看看它还剩下什么！”波拿巴高声说道。

蒙日细细打量着海岸。

“说实话，将军，眼前这座城市似乎与古代文献里那些辉煌的描述毫不相符。它看上去倒更像一座破败的外省小城。那些宏伟的建筑呢，神庙呢，宫殿呢，大图书馆呢？”

波拿巴笑了。

“这一切都消失了。罗马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奥斯曼人。古埃及如今只存在于它的石头里。这就是我们来此的缘故。”

登陆从下午开始，海浪汹涌。士兵们乘小艇驶向岸边，跳进浅水，在烈日下蹚水走上海滩。气味比一切都先到来。温热而带矿物味，鱼腥与烟熏混杂，那是一座古老城市的气味，它全然没料到会遭人突袭。

学者们在傍晚登陆，那时城市已经被攻占。亚历山大并不是他们读到的模样。一万五千居民，狭窄的街道，日渐剥落的土坯房。

德农第一次踏上埃及的土地，他环顾四周，毫不掩饰自己的失望。

“难道真是这样吗？废墟和破屋？”

庞培柱矗立在五百米外，孤零零地立在沙色的天空下。二十七米高的阿斯旺红花岗岩，立于方石砌成的基座之

上。它与庞培毫无关系。它是公元 297 年前后为纪念皇帝戴克里先而建，当时他刚镇压了亚历山大城的一场叛乱。柱身是整块的巨石，重二百吨，十五个世纪前便已打磨光滑，如今在灰尘之下摸上去依然平滑。顶端的科林斯柱头掉了几片茛苕叶，但仍清晰可辨。若马尔用他的仪器测量了它：底部直径二米七十一，顶部一米九十。柱身略呈收分。工匠们算准了视错觉，使柱身在地面上看去显得笔直。十五个世纪之后，这个计算依然成立。

基座上，散落的石块带着象形文字铭文的残片，在罗马的建筑中被再度使用，很可能是从更早的法老神庙上拆来的。这种再利用的做法贯穿了整个埃及历史。罗马人劫掠神庙来造自己的建筑，阿拉伯人劫掠罗马人的建筑，奥斯曼人劫掠阿拉伯人的建筑。每一层都成了下一层的采石场。庞培柱本身就立在曾在别处用过的石头上。

德农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画下这根石柱。正面，四分之三侧面，从北面看的侧影。这座重二百吨的古迹，注定要为驶入港口的船只充当标志。他的画将加入《埃及志》的图版。石柱会留在原地。它的图像却将去往巴黎、伦敦、维也纳。

亚历山大令人失望。叠压的世纪太多了。但尼罗河在他们面前展开。真正的发现在别处。

攻占这座城市，法军付出了约三百人伤亡的代价。克莱贝尔头部受伤，幸而活了下来。波拿巴把司令部设在奥斯曼总督的宫殿里，召集显要人物，并通过一份译成阿拉伯文的告示向他们宣告：法国军队是来把埃及从马穆鲁克的暴政下解放出来，恢复合法的奥斯曼苏丹的权利。“埃及的人民，”告示宣称，“有人会对你们说，我是来摧毁你们的宗教的。不要相信。我是来归还你们的权利、

惩罚篡位者的。我们是真正的穆斯林。我们不是已经制服了教宗和马耳他骑士吗？”

波拿巴整顿亚历山大的行政之时，学者们开始了最初的工作。德农寻找托勒密时代辉煌的踪迹。找到的很少。伟大的亚历山大城几乎已经消失。

德农第一夜未能入睡。并非出于不安，而是因为街巷里仍在喧响着一种他从未听过的夜间生活。阿拉伯语的人声，流浪狗，看不见的院子里喷泉的水声，黎明前从宣礼塔上传来的祈祷召唤。他带着笔记本在窗前坐下，画下他没有看见的东西，让耳朵引导着手。线条犹疑不定。他任其犹疑。夜很漫长。

次日清晨，他与若马尔一同走进城里。后者带着经纬仪，在每个路口测量。德农速写着一座座门面，集市上的一张张面孔，一头卧在尘土中的单峰驼，一群孩子，他们望着法国士兵走过，好奇中夹着戒备。两人谁也不会阿拉伯语。他们与居民交流，靠手势，靠微笑，靠钱币。

“我们要研究的埃及，不只是古代的埃及，”德农一边画一扇雕着几何纹样的木门，一边对若马尔说，“这里叠着好几千年的层次。每一层都覆盖了前一层，却没有把它完全抹去。”

“这就让测绘变得复杂了，”若马尔补充道，“您说的这些层叠带来了方法上的难题。如果一切都属于一切，那就什么都无法断代。一块古老的花岗岩，被再利用在十八世纪的房屋里，它属于哪个时期？”

“两个时期都属于。这是难处，也是妙处。”

鱼市向艾蒂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年轻博物学家——展示了十来种地中海鱼类，这些他还从未在任何标本中见过。他买了好几种，却叫不出名字，小心地用盐把它们包好，让人送到住处，打算晚上

解剖。同屋的伙伴们抗议这股气味。他回答说，科学的气味胜过无知。

另一边，贝托莱对集市上的染料产生了兴趣。商人们陈列的布料呈现出他不认识的色彩。极深的靛蓝，不带茜草色调的红，泛着藏红花色的黄。贝托莱取下染色纤维的样品，用纸卷起，仔细贴上标签。

学者们各依专长在亚历山大的集市上四处探访之时，波拿巴却没有闲逛。

要整编守备部队，要与当地当局建立关系，要解决补给问题，要筹备向开罗的进军。他坐在从自己船上搬来的扶手椅里，周围是副官们，接见了当地显要。他们前来时满怀戒备，像是还不知道这些新来者是否会留下的人。

与此同时，军队在做准备。士兵们灌满水壶，给骡子装载，检查弹药。雇来了埃及向导。他们是熟悉沙漠道路和水源的人。他们带着听天由命的神情望着这番准备。在这条夹于海与沙漠之间的走廊里，他们见过许多军队经过。

波拿巴并不为水文计算操心。他在观察沙漠。从学者们下榻的宫殿平台上，向南可以看到一条分明的线，城市在那里止步，沙地由此开始。一条笔直的一线。一边是房屋、花园、棕榈树，是人类经营已久的存在。另一边，什么也没有。一片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单调旷野，不见一丝阴影，没有一点色彩变化，也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7月6日，波拿巴下达了进军令。从海岸到开罗，相距二百二十公里。其间：沙漠。从来没有人向学者们明说这一点。

头一个钟点起就是阴凉处四十度。水井与水井之间没有水。士兵一边走一边死去，倒下的不是敌人，而是太阳。

人不是一下子死的。先是停下。跪倒。再没有站起来。队列继续前进。没有人乱了步伐去陪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波拿巴和士兵们一样步行，各纵队平行穿越沙漠。学者们不适应，只能勉强跟随。有几位晕倒了。德农边走边画风景。

蒙日踉踉跄跄，倚着一根临时做的手杖。波拿巴见他这副模样，下令把自己储备的水给他。

“喝吧，蒙日，”波拿巴把水壶递给他，说道，“你得活着走完这段路。”

蒙日喝了几口带金属味的温水。他险些说出一声谢谢，又忍住了。人们不会像对朋友那样，为一口水去感谢一位将军。蒙日一言不发地把水壶还回去。波拿巴已经望向别处。

“所有伟大的事业都有它的考验，”波拿巴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接着说，“亚历山大一路走到印度，用了八年。马可·波罗离开威尼斯二十四年。我们会撑住的。”

各纵队在一片几乎寸草不生的土地上行进。几丛带刺的灌木。偶尔有一座土坯砌的村庄。费拉们站在自家门口，默默看着军队走过。这种炎热与士兵们所经历过的一切都不同。它不只来自太阳，也来自地面本身，仿佛整个沙漠就是一座敞开的炉子。水壶渐渐空了。逢着水井，便把水壶灌满。水带着泥土和盐的味道，但没有人抱怨。第四天，接近中午，一阵低语掠过各纵队。士兵们抬起头。在他们前方，越过颤动的热浪线，地平线上浮现出一道绿色的带子。尼罗河。有人开始奔跑。军官们没有拦阻。他们也跑了起来。

最先的几列人马到达河岸，人们连背囊也没卸，便跪倒在水中。他们喝水，洗脸，一动不动地立在水流里，仿

佛不肯出来。在他们身后，各纵队仍在不断抵达，扬起的尘云落在水面上。

德农带着炭笔在河岸上坐下。眼前是七月阳光下波光闪烁的宽阔水面，数公里宽、浓绿欲滴的肥沃地带，再往后，沙漠就在灌溉停止的地方开始。

“看啊，若马尔，”德农对坐到他身旁歇息的年轻工程地理学家说，“这才是真正的埃及。”

“让我震惊的是那条线。一边是棕榈树，是庄稼。另一边是沙漠。离河岸才两公里。”

若马尔说得对。一切都取决于尼罗河。离河岸两公里，就是沙漠。沙漠来得彻底而陡然。埃及不过是沙之大陆上一条水的走廊。

饮用水现在有了。军队恢复了元气。若马尔展开他的刻度尺。蒙日在零散的纸页上画着方程。德农打开他的速写本。工程师们研究灌溉系统：水车、沙杜夫吊杆、分水渠。有几千年历史的技术，至今仍在使用。尼罗河的水被机械提升，送到高出几米的田地里。简单，有效，自法老时代以来毫无变化。植物学家们疯狂采集：枣椰树、埃及无花果、莲花、纸莎草，还有欧洲人闻所未闻的芳香植物。若弗鲁瓦把鸟类制成标本——朱鹭、苍鹭——装满了一箱又一箱。尼罗河的动物向他敞开：河岸上的鳄鱼，已变得罕见的河马，成千上万的候鸟。

“看看这些朱鹭，”若弗鲁瓦对贝托莱喊道，“埃及人把它们做成木乃伊。还把它奉为托特神。智慧，文字。一种每天早晨都能在尼罗河边看到的鸟。”

“我亲爱的若弗鲁瓦，把一只鸟当神来崇拜，在我看来是迷信的极致。启蒙运动已经纠正了这一点。”

启蒙运动确实超越了这类信仰中的许多。但若弗鲁瓦领会到了贝托莱不肯看见的东西。崇拜朱鹭，或许并非纯粹的迷信，而是在某一特定文明里，对自然的严谨观察所采取的形式。埃及人注意到，朱鹭随尼罗河的泛滥而出现。他们把它变成了神。十八世纪的博物学家注意到同样的事，却把它变成了方程。差别只在语言，不在对世界的关注。

若弗鲁瓦从第一个月起就开始购买了。他没有对同事们提起。傅里叶、蒙日、贝托莱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立场。是科学采集，还是个人占有？界线是模糊的。

几周之后，军队在开罗驻扎下来，自从法国士兵表明他们肯买东西，萨卡拉的集市便开了起来。邻近村庄的费拉带来他们在田里和墓中发现的东西。沙布提俑数以十计，圣甲虫数以百计，还有纸莎草残片、护身符、绿锈斑斑的托勒密钱币。德农总在清晨前来，趁暑热还没把行走变成苦差。他在临时的摊位之间缓缓踱步，灯芯草席铺在地上，东西就摆在上面。他蹲下。掂量。端详。让他停步的，未必总是最古老或最引人注目的东西。一尊彩绘木质的沙布提俑，十五厘米高的随葬像，双臂交叉在胸前，作奥西里斯的姿态，面容庄严，假发是蓝色的，上面细细描着金线。那张脸有着宫廷肖像般沉静的精准。曾有人端详过它，曾有人希望它在来世被认出。这尊沙布提俑曾在一间封闭的墓室里陪伴一位亡者三十个世纪。如今它就在这里，在萨卡拉的一张灯芯草席上，在太阳底下。这尊沙布提俑被一块破布裹起，德农把它放进了自己的挎包。

费拉说了一句话。德农没听懂。他转向军队派给他的翻译哈桑。哈桑听着，看了看自己的脚，然后低声译了出来。

“他说，这是他祖先的坟墓。”

那天晚上，哈桑独自回到营地。他沿着渐渐散去的集市走去，摊贩们带着各自的皮亚斯特消失在傍晚的尘土里。他在费拉摆放物品的地方停住了。草席还在那里。沙地上的一处凹陷，标出了沙布提佣曾经躺过的位置。他当翻译已有四年，译过商人、公证人、奥斯曼军官，如今又译法国学者。他懂得，翻译就是在永远无法完全重合的词语之间做选择。费拉的那句话——他祖先的坟墓——他译得准确无误。他没有译出来的，是语气。

接下来的几天，德农又做了几次收购。

圣甲虫。一枚蓝色釉砂的，刻着第十八王朝第六位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王名圈，刻在底面上，精细得他要用放大镜才能核实：棋盘格、圣甲虫、日轮。三千二百年过去，线条完好无损。第二枚是黑色皂石的，刻画一只鞘翅纤毫毕现的甲虫。埃及人观察过圣甲虫把粪球推向太阳，从中看到了神凯布利在黎明推动太阳。他们把它放进坟墓，放在亡者的心口上，以确保重生。

护身符。绿松石色釉砂的乌加特之眼，荷鲁斯之眼，在搏斗中被赛特夺走，后来又被重新拼合。三厘米，一颗彩绘的瞳孔，用化妆艺术的线条模仿隼的羽毛。一尊青金石的朱鹭头托特，书吏们佩戴它，好让手中的芦苇笔下笔不差。一尊深红色红玉髓的塞赫迈特。人们佩戴它，使战争与瘟疫不近其身。

德农还买了两只雪花石膏的卡诺卜罐——一只盖子是胡狼头，另一只是狒狒头——守护着亡者的内脏。高十六厘米，半透明的雪花石膏透出蜜色的光，仿佛石头仍然活着。几片写满僧侣体文字的纸莎草残片，买下时并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它们说了什么，改变不了它们是什么。

它们说了什么，他至今仍不知道。多年以后，东方学家们会知晓：那是《亡灵书》的咒文，是通往彼世的护佑祷词。工程师西莫内尔在底比斯买到、后来被称作卡德纸莎草的一卷类似的纸莎草，载有第125章，即灵魂在奥西里斯面前受审的内容。

卡德纸莎草日后将进入国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号为埃及文1至19号。

但在萨卡拉的这个早晨，这一切他还一无所知。让他停下脚步的，他就买下。集市渐渐散了。暑气渐升。明天还会有别的草席，别的物品，别的交易，而这些交易的字句，他不可能尽数记下。埃及比他的笔记本大。他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但他仍将继续。

黎明时分，若弗鲁瓦手里有十二页笔记和一个信念。尼罗河鳄与南美洲的凯门鳄，骨骼结构相近到不可能出于偶然。这种解剖学上的趋同，跨越数万公里和一片大洋，提出了一个他那个时代的生物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若弗鲁瓦还没有对任何人提起。这个想法与当时科学所传授的相去太远。

若弗鲁瓦请德农带他看萨卡拉浮雕中的动物形象。他们花了半天时间，把壁画上的朱鹭与活的朱鹭作比较。画与鸟如出一辙。三千年毫无变化。德农把两者并排画了下来——活的与画中死去的——却不知道哪一个更像原型。

III - 金字塔战役

7月21日，军队望见了金字塔。

三角形的轮廓，从十来公里外便在地平线上显现。士兵们不约而同地停了下来。没有人下过命令。波拿巴骑在马上，一言不发地望着它们。

然后他转过身来，面向自己的部下：

“士兵们，四十个世纪，正从这些金字塔的顶端俯视着你们。”

他向将领们示意，声音没有压低：

“邦，左翼师。德塞，右翼师。不要动。让他们来。”

接着，只对着自己，他最后一次面向金字塔：

“既然如此，就该打赢。”

学者们被送到步兵方阵内部，与行李和伤员待在一起。他们挤在骡子和弹药车之间，只到最后几排士兵的肩头。蒙日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从他所在之处，只能看见与人等高的东西：越靠越紧的双脚，双手握着的步枪，脖颈上的汗。从东面升起的尘土。马穆鲁克骑兵正在逼近，仍然看不见。左边一个士兵用阿尔萨斯语低声喃喃。蒙日听不懂。语气已经足够。自离开土伦以来，他头一回自问，这次远征究竟值不值得——人被夹在骡子与弹药车之间，而骑兵正穿过尘土冲杀过来。

轰鸣先于马蹄声到来。空气里有什么东西，脚下的大地在震颤。随后最前排开火，黑烟遮蔽了一切。排枪一轮接一轮，节奏均匀。间歇里，传来叫喊声。那是从马上坠落的人发出的。

蒙日在方阵内部看不到的，骑在马上军官们却看得见。穆拉德贝伊把他的兵力部署在东面，位于法军与尼罗河之间。六千名马穆鲁克骑兵，也许七千，聚成起伏的阵型，形状不断变化，却从不凝固。没有线。没有固定的

行列。一支如水般铺展在不平整表面上的骑兵。阿拉伯马比法国的坐骑矮小，五十骑一群、一百骑一群地奔驰，听从一位看不见的首领的信号变换方向。在他们身后，赭色的尘土升起，直到遮没天空。

波拿巴把各师编成五个大方阵。两万五千人排成六列纵深，刺刀向外，军官与行李在方阵内部。这是军事学校所教授的理论队形，按理说绝不会在骑兵冲锋下溃散。理论上如此。军中没有人 anywhere 见过六千骑兵同时冲锋。

第一波冲锋来自东南。约一千名骑兵，从马穆鲁克大部队中分出，直扑德塞的方阵。马穆鲁克们佩着弯刀，腰间别着手枪，肩上斜挎着卡宾枪。有的穿着在阳光下闪亮的锁子甲。有的穿着绣花的丝袍。这不是一支军队。而是一个骑在马背上的武士贵族阶层，每个骑手都为自己的荣耀而战，全无统一的号令。

他们全速冲锋了三百米。德塞的方阵在等待。二百五十米。军官们高喊着守住队列。二百米。步枪举了起来。一百五十米。波拿巴在中央的位置上，一动不动地望着。一百米。步兵能分辨出冲锋骑手面孔的距离。七十五米。开火的命令。

第一轮齐射正面击中了冲锋的队伍。子弹先打中马匹，它们比人更宽大，然后是骑手，他们向前或向一侧翻倒。到了五十米，冲锋放慢了。不是骤然停住。而是逐渐瓦解。马匹拒绝朝刺刀前进。几名落单的骑手冲到了方阵跟前。他们用弯刀砍向交叉的步枪，却无法突破六列的纵深。第二轮齐射在咫尺之内将他们放倒。

幸存者撤了回去。但接着又有新的冲锋。穆拉德贝伊一波接一波地投入骑兵中队，希望在法军阵形中找到一道缺口。每一波都在步枪前撞得粉碎。一个小时过去，方

阵依然屹立。法军阵地前的地面上，布满了死马和受伤的骑手。火药的烟雾凝滞在静止的空气里，形成一片灰色的雾，遮住了背景中的金字塔。

德农仍在盲画。一个个后背，步枪，烟，高出人头的一角金字塔。在方阵内部，他只看得见一些碎片：面前那个阿尔萨斯士兵的后颈，一支支举起又落下的步枪，呛人的、遮蔽一切的浓烟。外面刚刚发生的一切——冲锋，击碎马穆鲁克中队的齐射，法军骑兵的反击——他都无法看到。他留下的只有烟、热、汗，和声响。

临近傍晚，波拿巴命邦师和维亚尔师猛攻尼罗河畔安巴巴的壕沟营地。步兵纵队端着刺刀推进。这不是追击。这是一记精心计算的猛击，旨在打散敌人的凝聚力。夹在纵队与河流之间的马穆鲁克们向后退去。有的在骑马渡河时淹死。有的在河岸上被追赶的法军步兵击倒。

穆拉德贝伊明白，战斗已经输了。他的骑兵单看个个出色，面对一支纪律严明、寸步不让的步兵，却无计可施。他下令全线撤退。战斗开始不到两个小时，幸存的马穆鲁克就向南疾驰，把战场留给了法国人。他们身后留下了数千具尸体。法军的伤亡不到三百人。

德农画下了金字塔，前景是死者。是这幅速写，而不是后来受命绘制的凯旋画，道出了这一天的真相。

军队重新开拔。这时，金字塔回来了。不是早晨出现时的样子，尘土中遥远的轮廓，而是另一种性质的东西。随着靠近，它们变大的方式与寻常的透视毫无关系。并不是它们变得更大了。而是它们不再能与任何已知之物相比。在二百米处，德农明白了，自己一生都在想象以人为尺度的建筑。这些金字塔，却是按建造者心中“何物当永存”这一观念的尺度建成的。它们庞大，庞大得肆无忌惮。欧洲没有任何建筑能与之相比。

年轻的综合理工学院出身的若马尔取出测量仪器，开始测绘。他当晚记下的数字——底边长度、各面倾角、估算高度——将构成吉萨金字塔的第一份精确的科学测量记录。这项繁琐而细致的工作，就在胜利的当晚进行，概括了整个远征的两面性。

德农端详着金字塔，又看看在它们脚下扎营的军队。这些古迹重达数百万吨。它们哪儿也去不了。但它们所包含的物品则是另一回事。墓室里的小雕像。纸莎草。釉砂圣甲虫。凡是一只手拿得起、行军箱装得下的东西。

夜幕很快降临在吉萨高原上。士兵们点起营火。火焰橘红色的光，给石头染上了他在任何画作里都未曾见过的颜色。若马尔已在毯子上躺下，德农却久久地站着，眼睛望向天空。

过了午夜，他拿起炭条，走近大金字塔。哨兵没有拦他。他们已被告知，这个带着笔记本的平民到处走动，不会惹麻烦。他沿着底部走，直到找到一个月亮正好照在西面的角落。石块比人还高。他爬上两三块，在第四块上坐了下来。

石头依然是温热的。不是空气中弥散的那种热。那是石头自身的、由内而生的热，仿佛这一大团石灰岩吸收了白日的阳光，在夜里缓缓释放。手掌平放在上面。他头顶有一百四十六米的石头，隐没在黑暗里。他只能看见最初几层石块升向黑暗。

德农试着画。月光足以分辨各层石块之间的接缝，手工凿成的表面那细微的不平整，缝隙里深深的阴影。金字塔切割天空处划出的地平线，一层层石块如阶梯般向上。这比白天的画简单。

凌晨一点左右，若马尔在那里找到了他。他一言不发地在他身旁坐下，看了看笔记本里的速写，又看了看金字塔，再看了看笔记本。

“我们刚刚打赢了一场没有人会记得曾经输过的战役。一千年后，谁还会知道穆拉德贝伊刚才向南逃去？一千年后，这座金字塔会见过一百场像我们这样的战役。它不会去数。石头不统计人类的胜利。”

“我们的笔记本会写下来，”若马尔补充道，“知道与写下是有区别的。但我们的笔记本会作证，如果有人去读的话。”

“我们的笔记本。这就是胜利所剩下的东西。笔记本和金字塔。”

若马尔思索着。这座建筑的顶端吸引着他的目光。

“我今晚算过，大金字塔大约包含二百三十万块石头。如果工人们每天干十个小时，每年三百六十五天，持续二十年，就得大约每两分钟安放一块，不间断。没有停顿。没有差错。重复两百万次。让我不安的是，这个计算行得通。没有哪一处余量在崩塌。他们做到了他们打算做的一切，分毫不差。”

远处，士兵们的营火在平原上闪烁。向北某处，开罗正在沉睡。而金字塔并未入睡。

德农最后一次端详那幅速写。金字塔的线条映着夜空，简单，绝对。他从未画过如此难以画坏的东西。形体纯粹得让人无法失手。

若马尔站起身，拍掉裤子上的尘土，向营地走回去。

次日清晨，德农与蒙日和建筑师巴尔扎克一同进入大金字塔。他们走的是九世纪时哈里发马蒙强行凿开的通道。那是砌体中的一条隧道，窄得必须弯着腰前进，手里举

着冒烟的火把。前一天的暑热已离开高原。石头是冰凉的。

在上行通道里，他们遇见一名往回走的士兵。一个年轻人，也许十八岁，左手举着火把，右手攥着。他贴着石壁让开，好让他们通过。德农瞥见了那只右手握着的東西。一枚蓝色釉砂圣甲虫，有核桃那么大，是在一个侧壁的壁龛里找到的。士兵看着它。德农也看着。两人谁也没有说话。士兵朝出口走去。没有什么可说的。士兵的圣甲虫与德农自己行李里的那些小雕像，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区别在于程度，而非性质。德农自萨卡拉起就知道这一点。

大走廊让他们猛然止步。长四十七米，高八米半，打磨光滑的石灰岩墙壁以叠涩向上收拢至顶端。通道以二十六度的倾角通向国王墓室。火把高举。光线照不到顶。看不见顶。只有两面墙壁在黑暗中彼此靠拢。

“罗马人建造拱顶，”蒙日望着墙壁说，“埃及人建造假顶。结果是一样的。一处有顶的空间。技术上的解法却不同。他们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解决了同一个问题。”

“是的，相隔几个世纪，”巴尔扎克回答，“这条走廊比罗马的万神殿早了两千七百年。”

蒙日一边数着步子一边前行。他带了一根有刻度的绳子，在身后放开，每次转弯都记下确切的长度。巴尔扎克拿着水准器。

在国王墓室里，他们停下歇息。空石棺占据着西面的墙角。一只整块石头凿成的石槽，没有盖，没有铭文，没有装饰。不知何时，有人砸坏了它北侧的边缘。盗墓者没有留下任何别的东西。

德农测量了这间墓室的长、宽、高。长十点三米，宽五点二米，高五点八米。数字记下后，他核对了一遍，又

记了一次。然后他计算长宽比。接近二比一。接近双正方形。

“看。这个比例不是偶然的。埃及人有一种比例几何学，而我们如今正在重新发现它。他们没有把它写下来。他们把它建了出来。”

蒙日坐在空石棺的边缘，借着火把的光画着这间屋子。这具石棺曾盛放过什么。或许什么也没有。或许它一直是空的。很可能这间墓室本身才是坟墓，而不是那只石箱。没有人知道。墙上没有一个象形文字可供说明。即便有，他们也读不懂。

两个小时后，他们回到地面。清晨的阳光照在吉萨高原上。蒙日在一块石灰岩上坐下，闭了一会儿眼睛。他想着下面的那间屋子。下面绝对的寂静，纯粹的黑暗，还有那具空石棺——它在那儿等了几个世纪，等着有人来把手放上去。

德农打开笔记本写道：“进入一座金字塔，就像进入一个我们既不懂开头也不懂结尾的句子。意义就在那里，有条理，很精确。但我们缺少那门语言。”

下午，趁若马尔还在收尾东面的测绘，德农向高原南边走远了。他希望在走近之前先远远地看一看狮身人面像。他在三百米外停下，凝望。

头颅从地平线上的沙中升起，剪影映在被暑热烤白的天空上。比例令人困惑。对一个人而言太大，对一座纪念碑而言太小，介于两者之间，不属于他所知的任何类别。他精确地描下了轮廓。四条线。鼻子残损后留下的断口。奈姆斯头巾的边缘。围住面庞的条纹头饰。投在沙上的影子。

走近时，细节渐渐增多。淡黄色的石灰岩，被几千年挟沙的风磨蚀。地质层理在岩石中清晰可见。狮身人面像

是从天然的崖壁上凿出的。工匠们顺着石头的纹层雕刻，如同雕刻家顺着木头的纹理。耳朵半已磨损，却仍保有形状。眼睛如今是两个凹坑，但浮凸的眉毛表明，当初是有意把它们凿深的。

德农坐在沙地上，就在头像脚下，坐进它在傍晚投下的狭窄阴影里。这是此时高原上唯一凉爽的地方。从下往上画那张脸，是一个从未有画家表现过的角度，是坐在纪念碑脚下仰望的人的角度。

保护分队的一名士兵来告诉他，该回营地了。他做了个手势表示听见了，却没有动。士兵走开了。光线还够二十来分钟。

他想着狮身人面像守护的东西。或是应当守护的东西。古埃及人称它为荷尔-埃姆-阿赫特，地平线上的荷鲁斯。那位隼神，同时也是初升的太阳。这张脸朝向东方，不偏不倚地朝向东方，朝向日出时的太阳。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经过天文学的计算，精确得连若马尔的仪器也只能加以证实。

这里的一切都是有意为之。没有什么东西是仅仅为了装饰而装饰。每一个比例，每一个朝向，每一种选用的材料，都遵循着建造者心中的一套逻辑；他们不觉得有必要说明，因为后继者同样清楚。后来后继者消失了，逻辑也随之消失，只剩下石头。完美，精确，却沉默。

待到光线不够用了，他站起身，再一次望着那张脸。缺失的鼻子并未减损它的神情。如果那算得上一种神情的话。那大概不是宁静。也许仅仅是一张凿在岩石里的脸注视世界的方式。

7月24日，开罗的攻占出乎意料地迅速。城门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便打开了，当地当局宁可谈判，也不愿与

一支刚刚见识过其火力的军队交锋。波拿巴率领部队进入埃及首都，穿过一条条小巷，居民们谨慎地待在屋里。面对开罗，所有士兵无不惊叹。在沙漠里熬了数周之后，眼前竟是一座有三十万居民的城市。熙熙攘攘的集市，数不清的清真寺，棕榈与橘树的园林，喷泉。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见过的最大、最奇异的城市。

入城当晚，德农走遍了汗·哈利利一带。边走边画，随手记录。这座城市在他看来是一个完整而连贯的世界，依照某种逻辑组织起来，而他仍然没有解读它的钥匙。要过几个月，才谈得上开始理解。

自十四世纪起，汗·哈利利就是开罗的商业中心。一座有顶的小巷迷宫，金匠、织工、香料商、书商、铜器与黄铜器制造者挤在其中。他在那里游荡了一个钟头，笔记本摊开着，却无法把画定下来，因为人流从不停歇。面孔，布料，货物。一切接踵而来，快得抓不住。

一位卖阿拉伯书法的老商人注意到他，示意他进店。德农接受了。老人在他面前铺开一张张写满符号的纸，他读不懂，却一眼认出其中的审美价值。弯曲的线条，变音点排布之精准，既像绘画，又像书写。他以一笔不大的钱买下了三张。商人又送给他第四张，权当欢迎。

这个举动触动了。亚历山大的枪声刚刚过去，街头的戒备与猜疑还看得真切，竟有人肯送他一样东西。这并非出于对法国的好感，而是某种更为古老的东西——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一直奉行的待客之道，早于法国人，早于奥斯曼人，甚至早于阿拉伯人。

若马尔更务实，立刻关注起这座城市的规模。三十万居民，几乎相当于巴黎人口的一半，却挤在小得多的地方，街巷狭窄，仅容两头驴并行。密度是衡量一种文明的另一种方式。他记下了街道的宽度、建筑立面的大致高度，

以及建筑占地与内院面积之比。这些数据日后将用于他的人口估算。

波拿巴看开罗，则把它看作一道行政难题：三十万居民，要靠两万五千名疲惫不堪的士兵去统治，力量对比并不乐观。他需要本地盟友，需要间接的行政管理，需要一种借来的正统性。进城当晚，他就开始办公，而他的士兵们已累得瘫倒在地。

蒙日和贝托莱在一座废弃宫殿的庭院里碰了面，喝着埃及咖啡，端咖啡的仆人是后勤部门当天早晨刚雇来的。

“我们到了，”蒙日举起杯子说，“我们渡过了地中海，攻占了马耳他，走过了沙漠，赢得了金字塔战役，如今到了开罗。航行六个星期，打一场仗，我们就坐在这里，坐在马穆鲁克的宫殿里喝咖啡。”

“最要紧的还在后头。”贝托莱说。

“是什么？”

“弄明白我们面前的究竟是什么。这个国家，这种文明。军事征服是容易的那一部分。”

附近的街巷里，军队正安顿下来过夜。此起彼伏的喝令声，马匹的嘶鸣，木箱落地的闷响。开罗仍未入睡，或许它从来就没有真正睡过。蒙日放下杯子，打量着庭院：一棵棕榈，石砌的水池，墙头之上的星空。五十年来，他一直相信科学能够打开世界。它确实打开了。可这种打开竟会令人如此畏惧，他从未料到。

IV - 阿布基尔海战

8月1日，纳尔逊在阿布基尔湾袭击了法国舰队。战斗持续了一夜。拂晓时，十三艘战列舰中有十一艘被击沉或俘获。旗舰东方号已经爆炸。

自7月初起，法国舰队就排成一线停泊在阿布基尔浅湾，等待布吕埃斯海军上将的命令。十三艘战舰并排下锚，右舷朝海，左舷朝陆。这是舰队停泊时的经典布阵，借海岸作依托，护住一侧。布吕埃斯选择这个位置，是因为亚历山大港水太浅。他以为纳尔逊只能从正面进攻。

但纳尔逊看出了这种布阵的弱点。海湾既然深得足以容下十三艘战舰，也就深得足以让船只从这些战舰与海岸之间穿过。法国人只防住了外海一面，把左舷暴露在外，自以为没有人敢闯进浅水区。纳尔逊敢。

进攻在十八点三十分打响，当时太阳正沉向地平线。十四艘英国舰船驶入锚地，其中五艘吃水最浅，从法军战线与海岸之间穿过，其余的从外海发起攻击。法国人陷入两面夹击，左舷的火炮毫无用处，因为他们从未想过要朝这一侧作战。

战斗在渐浓的暮色中展开。法军战线最前列的几艘战舰猝不及防，许多水手还散在岸上，来不及召回，战舰便被压垮了。勇士号、征服者号、斯巴达人号遭到英军火炮的近距离轰击。到二十点，已是漆黑一片。人们只能借着炮火的闪光、受损甲板上蹿起的火焰，以及地中海上升起的月光厮杀。

东方号是一艘一百二十门炮的旗舰，位于法军战线的中央。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战舰，1791年建于土伦。布吕埃斯在舰上指挥，身负重伤，却拒绝离开岗位。二十一点，舰楼上起了火，那里散放着油漆罐和油桶，火势蔓延到下层甲板，又烧向弹药舱。水手们试图扑灭，但水泵早已在先前的炮击中被毁。

二十二点，东方号爆炸。三十公里外的亚历山大都看得见爆炸。一道火柱冲上夜空，高达一百米。爆炸声在整个海岸线上回荡。长达十分钟，战斗停了下来。英国人

和法国人都停止了射击，被这场毁灭的暴烈惊得呆住。燃烧的残骸重又落入海中，水手的尸体被抛向空中，落在离战舰数百米外的水里。东方号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千名船员中，只救起寥寥几名幸存者。

沉寂过后，战斗重新开始。幸存的法国战舰试图自卫，却已被团团围住，船员伤亡惨重。8月2日拂晓，十一艘法国战舰被毁或被俘，只有两艘设法逃向外海，即威廉·退尔号和慷慨号。它们将逃往马耳他。其余的被击沉，搁浅在海岸上，或落入英国人之手。

阿布基尔海战是纳尔逊最大的一场海上胜利。法军死伤和被俘者达数千人。英国人一艘战舰也没有损失。地中海重新成了他们的海。

这一夜改变了一切。没有舰队，法国军队便成了埃及的囚徒：没有援兵，没有补给，无路可归。三万八千名士兵和一百六十七名学者，与世界隔绝了。

消息于8月14日传到波拿巴那里，当时他正在自萨利赫耶返回开罗的途中。一到首都，他就召集了军事会议。他的怒气显而易见。

“布吕埃斯把舰队泊在阿布基尔湾，而没有把它安置到亚历山大的安全之处。纳尔逊趁夜进攻。舰队毁了。这就是我们的处境。”

克莱贝尔为此事专程从亚历山大赶来，四十五岁，阿尔萨斯人，身高近两米的巨人，直率得如同一种职业病。他问出了那个人人都到了嘴边的问题。

“波拿巴将军，长远的战略是什么？我们要在这里留到什么时候？”

波拿巴迟疑了。决定尚未做出。

“我们控制着尼罗河，克莱贝尔。埃及养得活我们的军队。马耳他给了我们足以支撑下去的储备。我们不依赖督政府。继续前进。东方军与法国断了联系，我们如今不得不成就一番大事。如果不能从海上回去，我们就从陆路回去，穿过叙利亚和土耳其，或者留在这里，直到形势改变。”

“我们被囚禁在这里，不知要囚到何时。”蒙日说。

贝托莱比蒙日更为坚忍，也更能认命，他试图把当前的处境放到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中，让它显得不那么沉重。

“亚历山大大帝离开马其顿十一年，蒙日。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会比我们活得更久。就想着这一点吧。”

会议结束后，克莱贝尔在宫殿的走廊里找到德农，伸手按住他的手臂，拦住了他。这位阿尔萨斯人是军中唯一一个在文职人员面前不做作的将军，也是唯一一个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而无需先征得许可的人。

“您听见波拿巴的话了。他已经下令继续。您怎么想？”

“我想他别无选择。而且他自己也清楚。”

“那我们呢？”

“我们也一样。”

克莱贝尔点了点头。这并非悲观。他松开手，转身朝他的军官们走去。

这类灾难里有些东西发人深省。那不是道德教训，而是关于偶然性的教训。伟大的事业并不总因伟大的缘由而倾覆，有时只因为一位海军上将把船泊错了地方。

舰队覆灭的消息传到学者们耳中，途径各不相同，要看他们在营地里的地位高低。有些人从穿过庭院的参谋军官口中得知，另一些人则是从一个听见士兵谈论此事的埃及仆人那里听来的。

那天晚上，德农在回住处之前，绕到哈桑·卡希夫宫殿的北侧附属建筑，藏品就存放在那里。他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拿着手写的清单。

木箱都在那里：十二只贴着他亲笔标签的箱子，蒙日和贝托莱的官方藏品。西北角靠着后墙，是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没有序列号，没有专员的姓名。普通木料，匆匆钉成，钉子是斜着敲进去的。他试着抬起其中一只，一个人根本抬不动。他的手指伸进木板间的一道缝隙，触到了帆布，布后面有什么坚硬的东西。他没有强行撬开。从远征之初起，他已经见过它们三次：第一次是在亚历山大，当时没有在意，它们混在别的箱子里；第二次是在阿布基尔海战之后，他提着灯笼来查看藏品；第三次就是今天早晨。它们一动未动，也没有人来认领。它们存在于体系之外，在表格、委任状和清单簿之外。它们是这次远征中没有名字的那一部分。

他把这二十三只箱子的存在记在了个人日记里，写在一页的末尾，注明日期，并写道：“来源不明。内容未核实。”他对谁也没有提起。这些箱子终归属于某个人，那人会来认领，或者不会来认领。

第二天下午，德农去汗·哈利利的香料市场，看看城里是否已知道这个消息。消息没有传开，或者传开了，却没有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商贩照常叫卖，买主照常购买，胡椒和肉桂的价格与上周相比毫无变化。

一个他认得面孔的布料商向他招手示意。那人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先指指天，再指指北面的海，接着双手合拢又猛地张开，这是世间通用的爆炸手势。

“他们知道了。”德农对他的翻译说。

“从昨晚起就知道了。消息在市集里传得快。他们说法国舰队被消灭了，你们现在成了这里的囚徒。”

“那他们怎么看这件事？”

翻译与商贩交谈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对他说。

“他说，法国人不是第一批被困在埃及的人，马穆鲁克也曾以为自己会一直待下去，等你们走了，尼罗河还会继续流淌。他还说，如果你们想买布，他今天可以给个好价钱。”

德农买下了一块靛蓝色的布料。并非出于什么实际用途，而是因为那颜色很美，也因为他想在这一天里做成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此后的几个钟头里，更让他挂心的是一个具体的念头：若马尔的笔记本、他自己的素描、若弗鲁瓦的标本，该如何才能回到法国？科学与战争搭乘的是同样的船。

当晚，军事会议之后，学者们聚集在宫殿的内院里。没有人提议过要在那里碰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了，被同一种需要牵引着：不想独自面对这个消息。

几分钟后，贝托莱来了，手里拿着一张演算纸。他坐下来，把纸摊在膝头，开门见山地对蒙日说：

“我估算了现有的给养：面粉、油、大米、干肉。只要配给得当，军队不依靠外部补给也能支撑十六个月。我们不会饿死。”

“我担心的不是饥饿。”蒙日说。

“我知道。可这是我能计算的。”

傅里叶独自坐在远处的柱廊下，一言不发。其他人早已学会，不把这种沉默当作漠不关心。傅里叶的思路与他们不同。凡是言语无法容纳的东西，他都需要借助数学去处理。失去舰队是一个多变量的问题：给养、援兵、可能的撤退路线。至于写出把它们联系起来的方程，他却做不到。这不是冷漠，而是他害怕的方式。

“我们的藏品，怎么运回去？”

没有人立刻回答。这是所有人都在心里问过、却谁也不愿第一个说出口的问题。

“笔记本可以揣在我们的口袋里带走，”若马尔补充道，“测量数据、记录、草图。每人不过几公斤的东西，什么地方都带得过去。”

“那些箱子呢？”德农说，“若弗鲁瓦的标本。贝托莱的木乃伊。陶器、纸莎草、小雕像。那些沉重的东西。”

贝托莱放下了他的演算纸。

“沉重的东西是脆弱的，这一点必须承认。如果英国人控制了地中海东部，我们想装船运走的一切都可能被截获。”

一只猫穿过石板地面，消失在柱廊下。城中某处，宣礼员开始唱响夜间的召祷。声音悠长，蜿蜒曲折，随着旋律起伏。自7月1日以来，他每个夜晚都听到这个旋律，却始终觉得陌生。

“波拿巴说过，如果不能从海上回去，我们就取道叙利亚回去。”蒙日说。

“波拿巴什么话都说，”贝托莱答道，“今晚，他说这些话是对的。军队需要有所相信。”

他们在庭院里待了一个钟头，没有计划，没有决定，只是在一起。

他们先后起身，各自回了房间。本来也无事可做。

德农在书桌前坐下，写了起来。

“十三个夜晚之前，我们失去了舰队，而我们并不知情。我说‘我们’，因为这个词最准确。这是集体的损失，即使我不在阿布基尔，即使我不是水手。而我随舰队一同失去的，是一种确信：我在这里所见的一切，将带不回法

国，至少不会以我所选择的方式带回去。我的笔记本，我的素描，还有我在萨卡拉和孟菲斯的市集上买下的两百四十件小雕像和护身符。这一切如今都成了一种军事局势的人质，而我对这局势毫无左右之力。”

他停下笔，重读一遍，划掉了最后一句。太像诉苦。德农又重新写起。

“今晚让我挂心的不是恐惧。我不认为我们会死在这里。波拿巴会想出办法，他总能想出办法。让我挂心的是一个更抽象的问题：如果见证人回不去，见证还有什么用？我画下的金字塔、狮身人面像、萨卡拉的浮雕，只有被人看见才有价值。锁在开罗的一只箱子里，它们的价值并不比它们所描绘的石头更多。”

他放下了笔。

他的素描本加起来约有十二公斤重。装在木箱里的小雕像和护身符约有四十公斤。一个人可以背着十二公斤走一段长途。四十公斤则需要一匹马或一头骡子。可军队的马和骡子，并不是用来供一个文职绘图员运送私人收藏的。

他列出一份清单，写下假如形势所迫，他自己能背得动的东西。首先是笔记本，绝对优先。其次是绘图用具：鹅毛笔、炭条、墨水，共几公斤。在购得的器物中，则挑最小也最珍贵的：釉砂和皂石的圣甲虫，青金石和红玉髓的护身符，还有那尊沙布提侖，彩绘木质，双臂交叉。这些都装得进一只皮挎包。

其余的东西，陶器、浮雕残片、雪花石膏的卡诺卜罐，都得留下。如果真像波拿巴所说，徒步取道叙利亚，就不可能把陶器放在沙漠中行进者的背上。

这种被迫的取舍，让他领悟到一件始料未及的事。自出发以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在记录埃及，以便把它带回

法国。现实此刻硬生生摆到他面前：他能带回去的，与其说取决于他的选择，不如说取决于什么东西在物理上走得动。人们讲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就是那些带得回去的东西的历史。其余的都不算数。

他写下最后一行：

“如果这些笔记本到了你手里而我没有到，那是它们独自走完了这段旅程。这大概是最好的旅行方式。物件比人轻。”

他把信纸折起，塞进第一本笔记本里，夹在土伦那几页之间。然后他吹灭了灯，等待天明。

V - 埃及研究院

阿布基尔海战三周之后，军队还在消化这场海上惨败，波拿巴于 1798 年 8 月 22 日颁布法令，创立了埃及研究院，距攻占开罗二十九天。

研究院的官方使命，是从自然、历史、经济各个方面研究这个国家，并回答军事行政部门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的问题。研究院设在哈桑·卡希夫宫。波拿巴任副院长，蒙日任院长。每隔五天，学者们便在大厅里落座，继续他们的工作。

蒙日主持了第一次会议。

他曾向工匠的子弟讲授画法几何，那些孩子是一边学认字，一边学圆锥曲线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创办，就是要让才能取代出身。在他看来，埃及不是一场征服，而是一个证明：革命后的法国能够做出君主国永远做不出的事，在一场军事远征的腹地开展一次科学考察。

他以寥寥数语开了场：

“我们来这里是为了理解，不是为了征服。我请求诸位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德农坐在最后一排，把这句话记了下来。

波拿巴常来。学者们乐于被一位大权在握的人倾听。

“诸位先生，埃及曾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三千年的历史被埋在地下，你们要把它们发掘出来。测量，绘图，采集。还要研究今日的埃及。科学也应当造福生者。”

几周之后，德农花了好几天，从各个角度描绘金字塔。若马尔爬上了大金字塔的顶端，在石块上攀登了三个小时。从上面望去：西边是沙漠，东边是尼罗河谷，东北是开罗。

“多么壮观的景象，”他低声对建筑师巴尔扎克说，“整个埃及尽收眼底。”

“是啊。而且从上面，我就能校准四个面上的瞄准线了。”

他们测量了卜塔神庙的遗迹，卜塔是孟菲斯的创世之神。尘土中躺着一尊粉红色花岗岩巨像的残片，后世将把它归于拉美西斯二世。

这项工作吃力不讨好。雕像碎成了几块，散落在草丛里。要靠累加来重建尺寸，弥补缺失，估算残缺的部分。

近午时分，若马尔在头像的阴影里坐下。头像高近两米。他端详着那张脸。嘴角微微含笑，这是新王国巨像特有的微笑，既不和善，也不凶狠，只是自公元前十三世纪以来便一直在那里。鼻子已被砸断，多半是中世纪的士兵所为，他们以为毁掉面容便能毁掉一种权力。额上的圣蛇，即象征神圣王权的王家眼镜蛇，已被扯去，只剩下痕迹。奈姆斯头巾完好无损，平行的条纹在尘土下依然清晰。

在腰带上，约在髋部的高度，那里的断腿带走了其余的部分，若马尔发现了一个王名圈。两个拉长的椭圆，由一条连续的线圈起：这是王的名字，而当时还没有人能读懂。

这颗头带不走。它重达数吨，是用一整块粉红色花岗岩雕成的，采自阿斯旺的采石场。

一位老人蹲在巨大头像的阴影里，已经看了若马尔好一阵子。也许是看守，也许只是比他先坐在那里、一直没有挪动的人。若马尔给他看自己的笔记本，看那些演算的草图。老人说了话，但若马尔听不懂。接着他拾起一根细枝，在雕像的脚边尘土里画了两条平行线，又斜着画了三道。一幅图。与若马尔的不同，却看得出来是什么：一个重物在斜面上移动。他们就这样待了片刻，两个人，两幅草图都在尘土里。一个有仪器，另一个有记忆。心算。一块八十吨的巨石，装在一条船上。尼罗河上的船是人所共知的：扁平、轻便的小船，最多能载二十吨。那么，八十吨是怎么在水上运送的呢？

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不是用一条船。而是把几条船拼成一座浮筏，捆在一起，雕像放在连接所有船只的粗木梁上。计算表明，至少需要十条标准尺寸的船，紧密地系成一队。

十条船。数百米的缆绳。数百个人。只为把一尊雕像运到一座神庙。

令他惊异的并非那项技术壮举，它虽然艰难，却是做得到的。不，令他惊异的是做这件事的决心。决定把八十吨的巨石沿着九百公里的水路运送，须有一种笃定：笃定结果值得付出这番努力，笃定这尊雕像一千年后依然在，笃定法老想要颂扬的帝国将永世长存。

法老们错了。帝国不会长存。可雕像会。眼前这一尊倒卧在尘土中，虽已破碎，却还在，看得见，量得出，真实存在。

古埃及的伟大，或许不在于它做成了什么，而在于它打算留下什么。这些纪念碑不是为同时代的人建造的，而是为我们建造的。

德农拿着素描本路过，看见若马尔坐在巨像头颅的阴影里，便停下了脚步。

“您在沉思？”

“我在测量。两者是一回事。”

12月，贝托莱清点了自7月以来所做的工作：数以百计写满的笔记本，数以千计的标本，关于地质、灌溉、木乃伊制作、农业和语言的论文。五个月的工作。账册合上了。这个国家只会向那些留得很久很久的人交出它的秘密。

自夏天以来，德塞一直在上埃及追击穆拉德贝伊。波拿巴决定派一个学者委员会随后跟去，于1798年12月中旬出发，考察底比斯的古迹。德农自告奋勇。

藏品的问题已经带来一些谁也不愿明说的麻烦。学者们采集自然标本，如矿物、动物剥制标本、干制植物，得到了波拿巴的默许，他从中看到了日后在巴黎建立埃及博物馆的基础。但考古文物属于另一类，在道德上更为暧昧。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从安巴巴的鱼市回来，带回了八种他从未见过的鱼。

解剖一条陌生的鱼，对他而言是一场对话。切开，观察，记录，再与他记忆中欧洲物种的解剖结构作比较。鱼类

的内部结构在不同物种之间惊人地稳定：同样的器官处在同样的位置，只是因生活方式不同而略有变化。底栖鱼类的眼睛位置与中上层鱼类不同，但其下的基本构造是相似的。

解剖构造在千差万别的物种之间如此恒定，这是他开始隐约窥见、却还说不清的东西。如果物种是分别创造出来的，如主流学说所主张的那样，它们为什么会共有如此精确的构造？答案是它们源自共同的祖先，而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自然史博物馆的教授居维叶会驳斥它。科学院会对它侧目而视。

第四条鱼正在解剖时，德农走了进来，被气味逼得停在原地。

“您还在干活。”

“是的。这些是象鼻鱼，尼罗河和刚果河特有的。尾巴下面的这些发电器官，亚马孙的鱼也有类似的，是在相隔一万公里、毫无接触的情况下发展出来的。这不是巧合，而是解剖结构上的约束。”

那天早晨带回的八种鱼中，有一种令他骤然停步。他是从一个渔夫那里买来的，那渔夫不明白这个法国人为什么对这种平常的鱼感兴趣。

鱼被放进观察用的水盆，那是一只盛满尼罗河水的陶盆。鱼长约六十厘米，棕金色，身披鳞片，厚实如相互铰接的小盾。游得很慢，带着爬行动物般的庄重。

让若弗鲁瓦停住的，是它的胸鳍。

不是他二十岁以来解剖过的所有鱼那样扁平而呈放射状的鳍，而是肉质的、分叶的附肢，由一种形似肢体的内部结构支撑着。

他花了一夜分析这条活鱼，随后又将它解剖。鳍的内部结构里有一样东西，像是肱骨，一根居中的长骨，鳍条从它那里伸出。这种鱼，他后来将其命名为 *Polypterus bichir*，与美洲毫无关系。然而它的鳍却具有同样的基本解剖构造。

当晚，若弗鲁瓦给居维叶写了信。居维叶在巴黎。他被拒绝登船前往埃及，太冒险，太不确定。他们的信件在海上交错，迟到了好几个月。

“亲爱的朋友，”若弗鲁瓦写道，“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样东西，单凭它就足以证明我们此行的价值。一种看起来长着手臂的鱼。当然不是手臂，是鳍。但它的内部构造像是肢体的构造，而且与那些从未有机会杂交的物种完全相同，一模一样。我仍不知该作何想。但这不可能是偶然。”

居维叶好几个月没有就这一点作答。待他作答时，只是说相似并不意味着有共同的起源，上帝完全可能在不同情形下使用了同一种构造。

VI - 开罗起义

若马尔已开始记这座城市的日志。不是私人日记，他没有那种性情，而是一份记录：各区估计的人口、建筑密度、巷道宽度、立面高度、市场面积。此外还补充了对人流的观察、各市集的开市时间、水的地理分布，包括喷泉及其水池。

那天晚上是起义的前夜，只是他当时尚不知情。他提着灯笼出门，去丈量艾兹白基耶广场。广场是法国人在城中势力的中心。波拿巴在这里设了总司令部，集市、官方庆典和军队集结也都在这里。开罗居民大多只是匆匆穿过，不愿逗留，目光半垂，脚步急促。

他正测量广场的各个角度，用一根标定过的绳子记下距离，这时发现有一伙人坐在喷泉边，看着他干活。

其中一人站起来，走了过来。他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若马尔听不懂。接着他指了指测量绳，又说了一句。若马尔猜想那是在问他做什么。

他给对方看了自己画的广场局部平面图。那人仔细端详，把笔记本翻过来，又举到一臂远处。然后他对同伴们说了一句。他们笑了。那笑声并不嘲弄，倒更像是惊讶。

若马尔始终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他认为，他们是在图上认出了自己的广场。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让他们看到自己城市的俯瞰图。又或许他们笑，是因为这个拿着绳子的年轻法国人想要测量一样根本无需测量的东西。无从知晓。

1798年10月21日，开罗居民潜藏的敌意爆发了。导火索微不足道：一个法国士兵与一个商人之间的争吵。

10月21日黎明，数以千计的暴动者手持军刀、长矛和棍棒，涌入开罗的街头。落单的士兵被屠杀，被斩首。起义的街区筑起了路障。这场起义酝酿了三个星期，却在一个上午爆发。

波拿巴被枪声惊醒。他命令所有可用的部队逐个街区夺回这座城市。

“这场叛乱必须毫不迟疑地镇压下去，”他对将军们喊道，“只要我们露出一丝软弱，天黑之前就会被消灭。对任何敌对的聚集，不必警告，直接开火。”

炮兵轰击了起义的街区。土坯房屋在尘云中坍塌。步兵在街巷里搜剿。爱资哈尔清真寺被攻入，这一亵渎令整个埃及的穆斯林民众震惊不已。

镇压持续了三天。波拿巴下令处决所有被活捉的起义首领。一连数夜，他们在开罗城堡被斩首，尸体被抛入尼罗河。

德农没有等到镇压结束就出了门。他的埃及仆人惊慌失措，劝他回去，他没有理会。

他在所住街区的各条大路上看到的一切，将永远刻在他的记忆里。成群的武装男子。燃烧的店铺。烟的气味，以及烟底下另一种气味，他认得出，却没有说出名字。一名法国士兵倒在小巷里，已经死了。女人们在窗口尖叫。一个孩子在奔跑。法国军队猝不及防，组织反应花了不少时间。

“看在老天的份上，回去吧！”一名军官看见他拿着素描本，喊道，“这不是画画的时候。”

“恰恰相反，现在正是时候。五十年后，如果没有人记下来，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

一个钟头后，他终于回去了，在二楼的窗前观看后来的情形。法国士兵在一条小巷里包围了一伙起义者。一座清真寺打开大门，收容逃难的人。

德农关上窗。街上，枪声仍在继续。在几百米外的研究院里，其他学者以另一种方式度过着同一个夜晚。

学者们被困住了。并非出自军事决定。战斗仓促，波拿巴无暇顾及他们的行动。他们是出于必要被困住的：两百米外有法国士兵遭到屠杀，每个街区都有手持武器的暴动者，从黎明起枪声就没有停过。

傅里叶带着他的笔记本在研究院的大厅里坐下，演算他的方程。他想的是热在物体中如何传播，虽然尚未形成理论。热依精确而不变的规律传播，暴乱却不遵循这样的规律。这又是偏爱物理学的一条理由。

午夜前后，若马尔提着灯笼来与他会合。

凌晨三点左右，贝托莱未经通报就走了进来。他坐下，看着另外两人干了一会儿活。

“您在算什么？”他问傅里叶。

“热在非均匀介质中的传播方式。方程我还没有得出。”

“有用。左边那栋楼从今天早晨起一直在烧。运气好的话，您的思考能预测我们这栋天亮前会不会被波及。”

“继续工作，”他走出去时补充了一句，“这是我们在的存在有别于寻常占领的唯一之处。”

他们沉默地工作到清晨，各人埋头于各自的演算，而城市在窗外燃烧着。

蒙日则给他的妻子写了一封信。自阿布基尔之后，已没有正常的邮路。他还是写了。信里写了什么，德农永远不会知道。人们只知道，他把信仔细封好，此后一直揣在上衣里，直到一年后离开埃及。

10月25日，学者们小心翼翼地走出研究院。三天来，他们一直闭门设障，听着外面的枪声。整片整片的街区只剩下冒烟的废墟。

德农走进满目疮痍的街道，开始作画。

至少，他试着去画。眼前是一座坍塌的房屋，墙面被炮弹轰飞，烧焦的木梁横在街上，尘土里有一只孩子的鞋。他描出了尚存部分的屋脊线。在吉萨，他画过金字塔，前景是死者。在马耳他，他画过被运走的和被留下的艺术品。德农一向认为，绘画就是见证，而见证是中立的。铅笔没有立场。曾经存在的东西被固定下来，仅此而已。

可这座房子，是法国士兵毁掉的，是他随行的这支军队的炮兵毁掉的。他吃饭、行走、工作都要依靠这支军队。他画下这些废墟，所留下的将是一份镇压的文献，而他

在此地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等于为这场镇压作了背书。这与画金字塔不是一回事。

德农还是画了。不是出于信念，而是出于本能。画页渐渐填满。合上画册时，他仍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是必要的事，还是可耻的事。也许两者兼是。

小巷更深处，一扇雕花木门被从铰链上扯下，倒在地上。一间市集的店铺被洗劫一空，货架翻倒，一只铜箱敞开着，空空如也。在这个被毁街区的巷弄里，有着与哈桑·卡希夫宫中专员们填写清单时同样的基本动作：只是简单地拿，没有标准，没有分辨。军队抢劫，如同研究院采集。叫法不同，动作却是一脉相承。

那天早晨，他穿行在被毁的街道上，哈桑走在德农前面开路。在伊本·图伦清真寺附近，他们发现两名法国士兵正在搬空一间织工的店铺。布匹一包一包从门里运出，堆在一辆木头独轮车上：丝绸，染色棉布，留着节庆时用的白麻布。其中一名士兵正把一台织机从墙上的支架上摘下来。

店主站在里间的门框里，是一个穿黑衣的女人。她望着，一言不发。没有哀求，也没有喊叫，只有一双眼睛，跟着每一个包裹移动。士兵推着车从她身旁经过，她恰好后退了一步，不多也不少。

哈桑留在街上。无须翻译，没有什么可翻译的。但德农看了他片刻：哈桑看着那个注视着士兵的女人，德农明白了，这位中间人也看见了。而看见却无力作为，会在一张脸上留下一一种特别的颜色。没有记录。有些脸是写不进笔记本的。

当天晚上，哈桑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在科普特人聚居的街区，军队在那里为他租了一间房。他既不站在士兵一边，也不站在起义者一边。他站在语言一边。他是译者，

立在一条自己无法跨越的界线两侧。法语的命令被翻译，阿拉伯语的哀求被翻译。有些日子，他已不知道自己用哪种语言在思考。今晚，他什么语言也没有想。

德农画下了被搬空的店铺。墙上曾挂过布匹的钉子，地上织机放了多年而留下的较深的印痕，门框里那个注视着黑衣女人。画得很快，没有说明，没有日期。画完时，士兵们已推着车走了。女人回到店里，关上了里面的门。

镇压结束后，波拿巴召集了幸存的显贵和没有积极参与起义的乌里玛，向他们明确说明今后再有任何叛乱企图将招致的可怕后果。

“你们看到了所发生的事：你们的街区被毁，你们的首领被处决，爱资哈尔遭到炮击。如果你们再次造反，我就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

“这场起义暴露出我们处境根本上的不可能，”蒙日在镇压之后的会议上对波拿巴说，“我们不能永远只靠军事力量统治这个国家。民众对我们怀有敌意，只要我们还以外来占领者的身份待在这里，这种敌意就会持续下去。”

那次会议结束得很晚。第二天早晨，波拿巴召见蒙日。不在宫中，而在艾兹白基耶广场附近一座被征用房屋的内院里，远离军官们。那里有咖啡和两只凳子。波拿巴站着。

“您说过，我们不能单靠武力来统治。您说得对。您有什么建议？”

蒙日没有想到在这一点上会被征询意见。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要有制度，不是宣言。真正的制度。依照人所共知的规则运作的法庭。学校。保护费拉不受专断之害的土地所有权制度。就是大革命在法国所做的事，只是放在这里做。”

“需要多久？”

“至少一代人的时间。”

“我们没有一代人的时间。我们或许只有两年。”

“那么您就无法统治这个国家，不是真正地统治。您可以占领它。这是两回事。”

波拿巴久久地注视着他。

“占领就够了。对于我想做的事来说。”

蒙日没有问波拿巴想做什么。

当晚，蒙日在日记里写道：“波拿巴知道他并没有在统治。占领是被管理的。这个区别他不太在意，我却很在意。我仍不知道，埃及人在不在意。”

镇压之后的几个星期里，一种脆弱的常态重新建立起来。市场重新开张。清真寺再次迎来信众，唯有爱资哈尔依然关闭。法国士兵恢复了巡逻。学者们带着笔记本和仪器，重新在城里出入。

起义之后，学者们对自己身在开罗有了不同的体会。与民众和平共处的幻想已经破灭。他们继续工作，出入市集，与几位开罗的显贵保持往来。但一种潜伏的暴力随时可能再度涌现。

在开罗人眼中，德农一如他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一个法国人，因而是占领者，因而是潜在的敌人。

大多数店铺已重新开张。工匠们在干活。生活恢复了。

在爱资哈尔后面的一条小巷里，德农发现一所古兰经学校，学生们正在重新上课。孩子们围成一圈坐在一位老

先生身边，老先生大声朗读，让他们跟着重复。他经过时，老先生抬起眼睛看了看他，然后继续朗读，神情丝毫未变。

孩子们的声音背诵着一篇他们多半依旧不懂的文字，用的是一种他们的父母或许已不再识读的语言。长期在近东和北非商埠工作的东方学家旺蒂尔·德·帕拉迪曾对他说，传承先于理解。词语先进入身体，意义随后才来。这个举动是明白的：传下去，延续下去，不让中断变成断裂。

这座城市受了伤。它将以自己的方式愈合，按照法国人无法掌控、也不会完全理解的节奏。这不是英雄意义上的坚韧，只是一个活的机体，纵有中断，仍能继续其基本功能。市场重新开张，因为人们饿了。清真寺迎来信众，因为祈祷不会中断。孩子们背诵功课，因为传承不会等占领者打完仗。

VII - 狮身人面像与墓地

11月，德农组织了一次前往狮身人面像的考察。他们在黎明前出发，为的是赶上清晨的斜射光。只有这样的光才能让石头的细节凸显出来。

狮身人面像起初只是一团庞然的影。比沙更暗，比夜更密。接着光从东方来了，头部浮现出来：鼻子已不见，凹陷的双眼恰好望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座纪念碑长七十三米，高二十米，仍被埋到肩膀。石灰岩的表面显现出各种层次：风磨光之处呈灰米色，沙子层层堆积的凹处颜色更深。裂缝爬满前额，自头顶斜向太阳穴，有的宽达数指，有的几乎看不出来。石头并不均匀。较软的石灰岩层与较硬的相间，形成一道道横线，依着开凿这座纪念碑的岩石的天然地质，在面孔上划出纹路。脸颊上仍留有工具的痕迹，是一下下凿刀的击打塑出了那些

曲线，留下规整的小面，侵蚀尚未将它们抹去。沙子一直涨到胸前，形成一道缓坡，风不停地将它重塑，一粒一粒。

右眼久久地吸引着德农的注意。石灰岩被凿成凹陷，眼球被掏空，为的是造出一个已不存在的眼光，上眼睑在风化之下依然可辨。曾有人想让这个东西拥有目光，不是装饰性的存在，而是一种有朝向的目光，投向某个确定的东西。

头朝着东方。那张脸望着的正是那里，日出的方向。

“这不是一尊雕像，”德农低声说，“这是一件仪器。他们按一座山丘的尺度，雕出了一件天文测量仪器。一个巨大的日晷，面孔就是晷针。这道在春分秋分时凝视东方的目光，不是虔诚，而是几何。沃尔内会说，这张脸鼻子宽，嘴唇厚。我不下断语。但凿出这张脸的人，是懂得测量的。”

完成这处遗址的记录之后，考察队前往萨卡拉。这片墓地在沙漠中绵延数公里，是古王国的公墓，左塞尔的阶梯金字塔是迄今所建最古老的金字塔，六级台阶拔地而起，高六十二米。他们在那里度过了好几天。德农作画。若马尔测量。若弗鲁瓦细察浮雕，想从中读出文字没有说的东西。马斯塔巴的墙壁有些地方仍保留着彩绘。埃及蓝——工匠以熔融法制成的铜钙颜料——留存在避光的凹处。男性身体用赭红，女性身体用黄色，这些绘画的惯例在数公里的墓室墙壁上不断重复。象形文字先刻成阴文，再上色，每个符号都在石头里凿深几毫米，然后才涂上颜色。抄写员沿这些竖列自右向左书写，他们的错误有时依然看得见：某个符号被抹掉，又略微错位地重刻。日常生活的场景以层层叠叠的栏带展开：上方是高贵的活动，如接见、典礼、供奉；下方是田间劳作、

屠宰、烘焙。社会等级就刻在墙壁的垂直方向上。若弗鲁瓦蹲在一幅渔夫拉网的壁板前，那些鱼可以按种类辨认出来：尼罗河鲈、罗非鱼、鲱鱼。

若弗鲁瓦一向痴迷博物学，便把心思放在这些古老浮雕上的动物形象上。

“朱鹭，鳄鱼，河马，狮子，鸵鸟。其中有些物种在埃及已经绝迹。在法老时代它们还在。气候变了，或者是狩猎的缘故。”

他们举着火把下到竖井里。沙漠之下二十米，三十米。下行靠的是岩石上凿出的台阶，参差不齐，被数千年的往来磨得光滑。井壁随着下降而逐渐收拢，头顶的日光圆圈越来越小，最后只成了黑暗中的一个白点。空气变得浓稠。火把的火焰在地表与这些深室之间仍在流动的微弱气流里摇曳。气味很特别：硝石，矿物的尘土，还有某种动物性的东西，无法确切说清。井壁保留着开凿的痕迹，竖直的凿击，一道道平行的条带向下延伸。开凿这些竖井要花上数月，也许数年。一队队工人在黑暗中劳作，一筐一筐地把碎石运上去。墓室并不大，至多三米乘四米，刚够放石棺和供品。低矮的顶迫使人低下头。陶器碎片散落在地，是盗墓者留下的残渣。最深处是墓室，有象形文字，有壁画，死者的旅程刻画在岩石上。

在萨卡拉的几次探查之间，德农回到开罗。他在科普特人街区认识几家织工作坊，经常去走动。

技术既简单又古老。一台手动织机，两片交替的综片，梭子在经线之间穿行。织机的声响充满作坊：笄打紧纬线时有节律的啪嗒声，织工踩动踏板时综片的吱嘎声。羊毛即使洗过也还带着油脂的气味，那股腥膻与靠墙一排罐子里晾着的植物染料混在一起。绞纱挂在天花板的

梁上，按颜色分类：靛蓝的深蓝，茜草的胭脂红，番泻叶的黄绿。角落里，一个学徒在准备媒染浴，把明矾溶在热水里，好让颜色固着在纤维上。这道工序未曾改变：浸入媒染剂，拧干，浸入染料，用尼罗河水漂洗。与法老时代一模一样的动作，世代父子相传。羊毛与亚麻织成几何图案：菱形、人字形、端头十字、风格化的花卉纹样。

德农曾拿一件当代科普特织物，与人家给他看的贝尼·哈桑壁画的摹本作对照，那是中埃及总督们的陵墓。菱形套在圆圈里的图案完全相同，羊毛与亚麻混合的织法也一样，布幅宽度同样约六十厘米。

织工的一个动作，延续了四千年。

他买了好几件。一些科普特织物的残片，其中几块边缘还留有狩猎或捕鱼的图案。僵直的剪影，分明的侧面，埃及民间艺术那种程式化的风格，历经基督教与阿拉伯征服而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还有陶器。双耳罐、窄颈瓶、高足杯，用同样的尼罗河黏土仿制，在同样的窑里烧成。工匠们复制着父辈教给他们的器形，而父辈又是从自己的父辈那里学来的。传承的链条从未断裂。

贝托莱从萨卡拉得到了四具人类木乃伊。

他感兴趣的不是尸体，那是医学去研究的事。他感兴趣的是防腐树脂的化学。那些浸透亚麻裹布的黑色发亮的物质，是一套有机物质的组合，他想弄清它们的成分。

他把刮下的样品溶在酒精里加热熔化，分析蒸气，记录熔点。工作台上排列着各种仪器：威尼斯玻璃的蒸馏器，水银温度计，罩在钟形罩下的精密天平。他在摆成方形的四支蜡烛的光线下工作，那光稳定，在他测量时不会颤动。树脂样品按木乃伊分类，用拉丁文贴上标签，装

在蜡封的瓶子里。有些是深黑色，有些是红褐色，还有些近乎透明。他用刮刀取一小块，放入坩埚，缓缓加热，同时记下材料在什么温度改变状态。树脂先软化，然后熔化，继而冒烟，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烧木头气味，混着一种树脂的味道。蒸气被收集到一根冷却的管子里，凝成油状的小滴。黄连木树脂、动物脂肪、蜂蜡、泡碱、犹地亚沥青。组合因木乃伊而异，但逻辑始终如一：造出一个不利于细菌分解的环境。

凌晨三点，他放下笔，望着摆在桌上的四具尸体。

这些人死于数千年前。他们的名字或许就刻在棺木的铭文上。留下来的，是他们保存完好的躯体。

这种恒久之中有某种东西令他不安。并非形而上学的不安，贝托莱是唯物主义者，而是科学上的不安。这些防腐师解决了一个有机化学的问题，靠观察，靠试验，靠技艺世代相传。实践比理论早了两千五百年。

他在报告中写道：“埃及的防腐技术构成了一套经验化学知识，精密程度非同寻常，对其作系统研究，或许能提供有关某些保存特性的信息，而这些特性我们至今了解得还很不够。”

在萨卡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与德农一同探查了圣兽墓地的周边，据说卜塔的阿比斯神牛就安息在那里。瓦砾中可见花岗岩碎块。他们在一块黑色花岗岩的碎片前停了下来。

德农写道：“古时的盗墓者留下了这些石块。这是唯一的相似之处。他们拿走他们以为是财宝的东西，我们拿走我们以为是知识的东西。两千年后，如果有人提着灯笼下到这里，他会看见那些盖子仍然是破裂的。他会和我此刻一样问自己：在一条幽暗的甬道里，盗墓者与学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

脚边，散落在尘土里的碎片中，有一块上头仍刻着两个阴刻的象形符号，一只鸟，一道折线。捡起，塞进口袋。这动作是自动的，未经任何决定，他刚写下的那个问题还来不及传到手上，手已经动了。

那天夜里，在德农回到营地之前，萨卡拉的市集仍在黑暗中继续。只有两盏灯笼，放在摊位之间的沙地上。邻近村庄的费拉蹲在席子后面等候。士兵们三三两两地来，没带武器，双手插在口袋里。他们掂量，走动，揣着用上衣裹好的东西离去。夜里的空气在白天的炎热之后显得清凉。沙子还留着一点暖意，但沙漠的风已经带来深夜的寒气。交谈都压低了声音，讨价还价用的是蹩脚的阿拉伯语，或者干脆打手势。一个士兵掂着一只圣甲虫，凑近灯笼，查看底面刻的象形文字。另一个在为一件釉砂护身符议价，那是一尊小小的绿松石色阿努比斯像，长着胡狼的头。

贝托莱也在那里，坐在一张从亚历山大一路带来的折叠椅上。他面前是一张小小的野战桌，上面摊着委员会的表格，哈桑拿着灯，把物件一件件递给他看。贝托莱逐一检视，在登记册上记下编号、拉丁文描述、在古迹中的位置和保存状况。今晚是六件：三枚王室圣甲虫，一块埃及无花果木的书吏调色板，一尊花岗岩小像，一只连盖的雪花石膏卡诺卜罐。他记下：“颈部有黑色树脂的痕迹。”随后他停下笔，抬起头望向哈桑。

“另一只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就是盖子做成胡狼的那只？”

“胃。”哈桑说。

“啊。这个我也记下来。”

贝托莱曾要萨卡拉的人给他弄些动物木乃伊来。费拉们给他送来了六具：两只圣朱鹭，两只猫，一条幼鳄，一

只齁齁。他把它们安置在研究院分给他当实验室的大房间里。

他分析了裹布：亚麻质地，浸着一种褐色物质，经鉴定是沥青掺植物树脂。体腔填充物也取了样，有泡碱、岩盐、矿物粉末。最让他费神的是泡碱。含水碳酸钠，天然存在于开罗以西沙漠的湖泊中。不久前，他曾与研究院的其他几位成员去那里考察过。那是纳特龙湖。一片片白色的湖滨，湖边天然结晶出这种碱性粉末，埃及人采集这种粉末，用来保存逝者的遗体。

在分析泡碱溶解于湖中咸水的过程时，他观察到了意想不到的现象：海盐与碳酸钙之间的反应，可以随温度和浓度而逆转。当时的化学家认为反应总是朝一个方向进行，较强的酸驱逐较弱的酸。贝托莱开始意识到这是错的，那其实是平衡。

巴黎将收到这些笔记。他还需要四年的思考，才能阐明完整的理论。其成果便是《化学静力学论》，1803 年问世。但种子就在这里，在埃及沙漠的白色湖泊中，在对一种天然化学反应的静观之中，那是埃及的自然已重复了数千年的反应。

至于动物木乃伊，则向贝托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这些做成木乃伊的朱鹭，和今天的朱鹭一模一样，”若弗鲁瓦说，“您还记得我们在尼罗河边说过的话吗？说埃及人崇拜它们，是因为他们观察自然？这就是证据：三千年间毫无变化。”

“应该说是完全相同。”贝托莱纠正道。

“居维叶就是这么说的。物种自创世以来就是固定的。木乃伊证明了这一点：没有任何变化。”

“那拉马克呢？”

“拉马克说，三千年太短，看不出什么变化来，需要的是无比漫长的时间。”

贝托莱双手捧起一具朱鹭木乃伊。那只鸟身躯僵直，保存得完好无损，透过裹尸布条，羽毛依然依稀可辨。

“两个人谁也无法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贝托莱说，“我们活不到那一天。”他把朱鹭木乃伊放了回去。

他们在萨卡拉整整待了两夜，睡在一座马斯塔巴的废墟里，以便天一亮就能守在现场。这片墓地在沙漠中绵延数公里，是古王国时代的巨大陵园，国王与贵族们曾在此修建自己的陵墓。左塞尔的阶梯金字塔矗立在这片肃穆的葬地中央。

“这座金字塔比吉萨的那几座早了一个世纪，”若马尔补充道。他是依据学者们手头关于埃及王朝年表的零星资料，推算出大致年代的。“它代表着建筑史上的一个时刻，那时的埃及人还在摸索各种形制。吉萨光滑的金字塔，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过程的终点。”

层层叠起的台阶有几分像美索不达米亚的山岳台，仿佛两个文明各自独立地走到了同一种建筑直觉：层层堆叠，以升向天空。

贝托莱把第二夜用来抄录一座高官马斯塔巴里的铭文。那些浮雕再现了日常生活的种种活动：捕鱼、狩猎、农事、屠宰、酿造啤酒，细节之精确，宛如文献，既令委员会里的博物学家们着迷，也令艺术家们倾倒。

从萨卡拉回开罗的路上，德农在黄昏时绕道去了尼罗河畔。这个钟点的光线与别时不同，橙红而浓稠，仿佛太阳在隐没之前，想把自己浸进石头里。他坐在水边一块石灰岩上，试图逆光描绘河流。这很难。光线变得太快了。

若马尔在他身旁坐下，等他画完。别人作画时，不要说话。

“今天早晨我算了一件事，”德农合上画本时，若马尔又说道。“左塞尔的陵墓约建于公元前 2600 年，胡夫金字塔约在公元前 2500 年。这两座建筑只相隔一个世纪。可一个是建筑上的尝试，另一个却已臻完美。怎么可能进步得这样快？”

“我不确定问题是不是出在速度上。我想，埃及人对时间有另一种想法。对我们来说，一个世纪很长；对他们来说，那也许只是学会一样东西所需的时间。”

他们在黑暗中返回开罗，由宣礼塔的灯火引路。沙漠里的野狗在远处吠叫。科普特区的某条小巷深处，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时辰。

VIII - 科学论争

12 月 15 日的会议上，蒙日与傅里叶针锋相对：测量对意义。蒙日要的是体积和角度，傅里叶要的是背景和含义。波拿巴主持会议并作出裁决：两者兼顾，不作取舍。

“真正的科学就是测量，”蒙日开场说道，“金字塔的尺寸，它的体积，它的比例，而不是围绕它的那些神话。描述与意义是两门学问，我们来此是为了前一门。”

“金字塔不仅仅是等待计算的体积，蒙日，”傅里叶答道，“它们是王家陵墓，是对永生的信仰之举。如果您只留下尺寸，那您描述的是箱子，而不是箱中之物。更严重的是：您可能会因为数过了，就以为自己理解了。”

波拿巴出席了会议，一直在听辩论，此时出面，试图调和这两种表面上互相矛盾的取向。

“你们两位在一点上都有道理，”波拿巴轮流看着蒙日和傅里叶说，“《埃及志》将兼容二者：蒙日的测量，以及傅里叶将从中发现的意义。缺了任何一方，都是不完整的。”

同一次会议上，贝托莱宣读了一篇关于埃及沙漠泡碱湖化学成分的论文。他对多处湖泊采集的样品做了化学分析，确定了它们的准确成分。

“泡碱是多种盐的混合物：碳酸盐、碳酸氢盐、氯化钠。在这种粉末状混合物里放七十天，水分就被吸尽了，尸体干燥而不腐烂。极其简单，极其有效。”

随后，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报告了他对朱鹭木乃伊的观察。这些木乃伊成千上万地出土于萨卡拉附近的圣兽墓地。

“朱鹭有两种。一种是我们所熟知的黑白相间的圣朱鹭，另一种更小，呈褐色，似乎已经绝迹。如果它在法老时代还存在而今天不复存在，那就说明有什么东西变了。至于是什么，我不知道。”

会议最后由让-约瑟夫·马塞尔作报告，他是东方学家，也是开罗国家印刷所的所长，报告谈的是阿拉伯文字印刷的进展。《埃及信使报》如今用法文印行，只有公告用阿拉伯文印刷。

“我们已有能力以令人满意的印刷质量排印古典阿拉伯文，”他宣布，“公告、法令、告示，民众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读到我们。”

当晚，傅里叶提交了一篇关于埃及沙漠气温分布的研究，这个题目源于他在行军途中的观察。他对非均匀介质中热流的分析，预示了他日后在法国开展的热学研究。在场的学者们听得十分专注：这样一场清晰的报告，讲的又是他们人人都亲身承受过的现象，自然值得这份专注。

“沙漠的炎热并不只关乎周围的气温，”傅里叶解释道，“那是地面、空气与暴露其中的物体之间热流和交换的现象。我还没有方程，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人们能够预测这种热量如何随时间和空间传播。”

波拿巴对埃及研究院更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件事：出身背景迥然不同的人——数学家、化学家、博物学家、艺术家、工程师——如何围绕一个共同的对象，也就是埃及，建立起共同的科学对话。

“这对我们了解古埃及人有什么帮助？”他问。

“直接来说，没有，”傅里叶承认，“但它告诉我们他们的环境是如何运转的。要弄明白他们为什么以某种方式建造房屋，按某些轴线安置神庙，把陵墓挖到某种深度，就必须理解他们所承受的热力条件。他们那个世界的物理，就是打开他们建筑的钥匙。”

散会时，波拿巴热情地祝贺了每一位报告人，并鼓励他们加紧研究。

“诸位的工作十分出色，”波拿巴面向全体与会者，接着说，“很快就要去上埃及了。底比斯的神庙。德农将为大家开路。”

傅里叶在哈桑·卡希夫宫的走廊里拦住了德农，腋下夹着一叠测绘稿，是委员会自抵达开罗以来绘制的全部成果：大金字塔的测量图、狮身人面像的平面图、萨卡拉陵墓的剖面图，共八十三张。

“这些测绘稿，”傅里叶说，“您打算带走吗？”

“这正是这次远征的目的，”德农说。“《埃及志》不会在这里完成。”

“我说的是实物。您在萨卡拉集市上买的那些小雕像，行李里的那些护身符。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理解埃及，不是为了把它的遗存搬空。”

德农看着傅里叶手里那叠测绘稿。尺寸，平面图，角度，这一切都会留在此地，留在石头之中，任何在他们之后前来测量的人都可以得到。而他夏天就买下的那尊彩绘木雕像，双臂交叉于胸前，是奥西里斯的姿势，三十年后，谁也别想在这里再找到它。它会在巴黎，或者就此失落。

“您和我的区别就在这里，傅里叶：您认为理解就足够了，我却认为有些东西必须被看见才能被理解，而要被看见，它们就必须远行。”

傅里叶收回那叠稿子，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那间房在二楼走廊上，隔着两扇门。德农独自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他睡得很晚。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以为收在行李里的那尊彩绘木质沙布提侖，竟立在工作台上，摆在显眼处，脸朝着他。想必是傅里叶夜里进来过。方程出不来的时候，他习惯在不合常理的钟点在宫中走动。可是在地上，就在桌子前面，有一粒沙子。只有一粒，在抛光的地砖上清晰可见。仿佛傅里叶想对他说：“这沙子是从某个地方来的。”

又或许，那不过就是一粒沙子。对傅里叶这个人，你永远分不清是意图在先，还是举动在先，抑或恰好相反。那尊沙布提侖在他桌上放了一整天。

1798年12月的这次会议，在正式议程之外，还迎来了旺蒂尔·德·帕拉迪的一场非正式报告。他是远征军的首席译员，说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希伯来语，流利得如同母语者，白天为波拿巴翻译，夜里编写一部阿拉伯语-法语词典，而这部词典他永远也无法完成。

他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发了言。

“我想向研究院提出一点观察。我们来埃及五个月了，我发现了一件事，我觉得对理解这个国家很重要。今天埃及人所说的阿拉伯语，与《古兰经》的古典阿拉伯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是方言之别，而是两套截然不同的体系，彼此的距离，就像西塞罗的拉丁语与莫里哀的法语。三角洲的一个费拉听不懂他所诵读的古兰经文。他只是照着音念诵，并不领会其意。”

“这意味着什么？”蒙日问。

“这意味着，埃及的伊斯兰教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一种宗教：信徒并不理解原初形式的圣典。信仰是凭乌里玛的权威、口头传统和仪式传承下来的，而不是通过直接阅读经文。这与路德之前天主教会里的拉丁语相去不远。”

波拿巴一直听着，没有插话，这时提了一个问题。

“那么乌里玛本人，他们懂古典文本吗？”

“最博学的人懂。其余的人也只是背诵。这是一条传承的链条，每一环传下去的是自己所接受的东西，而不一定是自己所理解的东西。”

德农把这番观察记进了笔记本。这番话与他在起义之后于古兰经学校的小巷里所见的情景相印证：孩子们念诵着一些句子，多半仍不知其义，然而那声音与节奏在他们身上已经是一种知识。他想到了自己的画。金字塔是在读懂之前就临摹下来的，狮身人面像是在知道它的天文朝向之前就在黄昏中画下的。也许他就是这样工作的：先有线条，后有意义。

“您所描述的，”傅里叶对旺蒂尔·德·帕拉迪说，“是一个传承先于理解的体系。人们先把文本背下来，意义随后才来，或者永远不来。这难道不像我们对待象形文字的

做法吗？我们抄录着自己并不理解的符号，也许我们的后人会读懂它们的含义。”

“不同之处在于，”旺蒂尔·德·帕拉迪说，“象形文字已经没有活着的使用者了，而古典阿拉伯语还有。在口头与书面之间，在乌里玛与费拉之间，在文本与仪式之间，这门语言存活着。它存活的方式不同于它被创造时的方式，但它存活着。”

会议结束得很晚。灯已烧得很低。学者们走进研究院的庭院，十二月的空气终于有了凉意，这是他们抵达埃及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寒冷。德农在院中停了一会儿，抬眼望去。开罗上空的星辰，与七个月前土伦上空的是同一批，只是在地平线上升得更高了。

会后，波拿巴与贝托莱一同离开研究院。他们在宫中花园里并肩走了一阵，没有说话。随后波拿巴开了口：

“蒙日有一次对我说，科学追求的是真，与有用与否无关。您相信这话吗？”

贝托莱思索起来。这是他整个职业生涯里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

“我认为这两者的界限，没有他说的那么分明。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是真实的：若马尔的测量，木乃伊的化学分析，德农的素描。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也是有用的，对法国有用，对欧洲认识埃及有用，对您在政治上也有用。真与用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结伴而行，很少走向同一个方向，但终究是结伴而行。”他迟疑了一下，又补充道：

“我唯一不肯说的，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无害。这不是事实，而蒙日和我一样清楚。”

波拿巴点了点头。

“傅里叶今晚对我说，他关于热的研究没有任何眼前的军事用途。他似乎还为此自豪。”

“傅里叶有理由自豪。二十年后，他的研究会有他今天想象不到的用途。这就是科学：它走在应用的前面，而这段距离，事先是无法丈量的。”

“就像一名斥候，至今还不知道自己是在为哪一支军队探路。”

“正是如此。”

他们在庭院的水池边停下脚步。月亮映在静止的水面上。

“继续工作吧，”波拿巴说，“无论发生什么，你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都会比这次远征活得更久。这是我眼下唯一的把握。”

贝托莱回到实验室，继续他的分析。

那天晚上回去之前，他对波拿巴说过一句话。语调几乎毫无起伏，像化学家在谈论沉淀物的颜色。

“1796 年在意大利，运往卢浮宫的东西是我们挑选的。蒙日挑，我确认。我们有时间，有清单，有专员。在这里，这些统统没有。等到我们离开的时候，一定是仓促的。装进箱子里的，就是能走的；其余的，就留下。不必再对自己说别的。”

德农想到了意大利。1796 年，带走东西的是法国。在这里，却未必还是我们。

凌晨三点，德农重新点亮灯，又拿起了他的笔记本。

书页缓缓翻过，他并没有真正在重读。画一幅幅掠过：土伦港湾里舰队的风帆，“朱诺号”甲板上望见的瓦莱塔港，亚历山大的庞培柱，沙漠中士兵的背影，从步兵方阵内部望出去的战场硝烟，暮色中的金字塔，前景是死者。

他还有另一份清单，从未写下。那是他做过却没有记录的事：他画下了无法带走的古迹，他看见一个士兵一声不吭地把一只圣甲虫塞进口袋，他看见一个费拉望着自己的沙布提俑被带走，宁可不把那句话记下来。这份清单比那二百四十三幅画还要长，没有尽头。

他停在了旅程中的第一幅速写上。

画的是波拿巴。右侧面像，在土伦码头上被晨光照亮，那是登船前的几分钟。他画得很快，将军浑然不觉。寥寥十来笔炭条。瘦削的侧脸，高高的前额，下巴向前探出，那姿态像是一个正望着尚未存在之物的人。

他拿过一张空白的纸，凭记忆画波拿巴。就是八月阿布基尔的消息传来之后那次会议上他所见到的样子。同样的侧面，同样的基本轮廓。但有些东西变了，他无法用言语说出，便用炭笔去寻找。

不是皱纹。七个月不会让一个二十九岁的人变老。也不是消瘦，波拿巴向来就瘦。也许是在脖颈的紧绷里，或是下颌咬紧的方式里。土伦的那个人望着某样尚不存在的東西，阿布基尔之后的这个人望着某样他已经失去的东西。

德农把两张纸并排放在工作台上。

两幅画很相似。一个匆匆的观察者看不出差别：同样的侧面，同样的姿态，同样是画家的手笔。但依次细看，就不可能看不出，第一幅画的是一个正在出发的人，第二幅画的是一个不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人。

这是自土伦以来，他第一次在将军不在场时画他。此前，他画的将军速写都是文献：统帅的姿态，权威的手势，在转瞬即逝之前必须定格的历史场景。这幅夜间的速写却是另一回事：一幅没有取得模特同意、没有任何见证的肖像，取自记忆，而非眼前之景。

他把两张纸先后夹进同一本笔记本里。先是土伦，然后是阿布基尔：已经开始的事，与它后来变成的样子。

这些笔记本里所装的东西，值得什么吗？这个问题现在在他看来，不像起初那样不言自明。在土伦登上“朱诺号”时，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为何在此：为了记录一次历史性的远征，为了赶在其他欧洲人之前看见埃及，为了给法国带回一个尚属未知的世界的图像。那个计划简单而清楚。

七个月后，他看事情的眼光不同了。他见过沙漠里士兵们的困苦，见过亚历山大的居民望着法军时那种认命的神情，那是见过太多军队因而不复动容的人的神情；见过开罗的起义和对它的镇压。他以对待金字塔与浮雕同样的专注，把这一切都画了下来。而此刻，他在问自己，这些画是否不论他情愿与否，既是一次科学发现的档案，也是一场殖民占领的文献。

那一夜，他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他的《上下埃及游记》日后也不会解决它。

他合上笔记本，吹灭灯，躺进黑暗里。窗外开罗上空的星辰，与希罗多德在尼罗河畔所见的是同一批，与法老时代的天文学家用来为纪念建筑定向的是同一批，与法国水手们自土伦出海横渡时所观测的也是同一批。这种恒久带来一种慰藉：并非万物等值，而是万物延续，已经改变，面目难辨，却依然在那里。埃及的天空不分彼此，它以同样的漠然照亮金字塔，也照亮营地。德农闭上了眼睛。明天他还要作画。

第二章：溯尼罗河而上

I - 丹德拉

1798年12月25日，德塞的远征军离开开罗，向南进发。三千名士兵，要去重新征服上埃及。德农随行，带着他的笔记本。

留在开罗的波拿巴，在出发前一天召见了德塞。

“您的使命有两重。军事上：消灭穆拉德贝伊。科学上：让学者们得以考察上埃及。要把他们当作合作者对待。他们带回来的东西，与您的胜利同样重要。”

德塞三十岁，头脑务实，对古物没有特别的嗜好。但他有足够的智慧，懂得执行命令。

“我会像保护我的士兵一样保护这些人。不过请您提醒他们：穆拉德贝伊不会给我们喘息之机，要持续几个月，也许一直追到阿斯旺。学者们得忍受。”

德塞出去后，波拿巴把德农多留了片刻。他打开行军桌的抽屉，取出一份折起的文件，就是土伦之前给德农看过的那份四页清单，此后又有补充。

“这就是必须回到法国的东西，是法国理应从这次远征带回的东西。”

德农浏览了开头几行。一个个类别，一条条描述：可搬运的方尖碑，品质非凡的浮雕残块，有记载的纸莎草文书，王室圣甲虫，晚期埃及的青铜器，可辨认身份的显贵木乃伊。每一类都附有估价说明和去处：卢浮宫、国家图书馆、法兰西研究院。

“我们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做的，”波拿巴接着说，“蒙日和贝托莱熟悉这套办法。他们带着表格带回来的东西，归卢浮宫。士兵们塞进背包的东西，我无法阻止。您用笔

记本记录下来的，则以另一种形式留在法国。三个层次，三种不同的正当性。”

“如果这些层次混在一起呢？”

“它们总是会混在一起。所以第一个层次必须无可指摘。如果委员会工作严谨，其余的相比之下就变得可以容忍。这是文艺复兴以来一切国家征集的逻辑。法国不劫掠，它挑选、记录、保存。劫掠的是士兵。这个区别是真实的，哪怕令人不安。”

“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呢？”

“只要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就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我们输了，这场争论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德农把清单收进挎包。这不是一道劫掠的命令，而是一道挑选的命令。这个差别是真实的。他但愿这就足够了，却并不确定。可波拿巴已经打开了办公室的门，他的时间有限。于是德农走了出去，没有说出他本想说的话。

12月25日清晨，远征军沿着尼罗河西岸踏上南去的路。这个钟点空气仍然寒冷，干燥无雾，是埃及那种很快就在阳光下消退的寒意。队列扬起的尘土远远可见。炮兵沿着耕地的边缘前进。骑兵的马匹觉出了启程，嘶鸣不已。费拉们站在民居的平屋顶上，一动不动地看着队伍经过。

德农与德塞并骑而行。

“这些神庙，我们只是从波科克和诺登的书里知道。描述含糊，图画不准。我们终于要建立起严谨的记录了。”

“您的热情我很欣赏。不过您想离开队伍的时候，请先告诉我。穆拉德贝伊还没有死心。”

德农答应了，神情里不无几分无奈。

“明白，将军。仓促的画，总胜过一无所知。”

尽管是一月，从第二个钟头起，热气就升了上来。沿河的绿带只有几百米宽，再往外，沙漠便开始了，来得突然，又彻底。士兵们默默行进，手里攥着水壶。德农边走边画——飞快的速写，村庄的轮廓，一棵棕榈，一道石灰岩崖壁的侧影——不停步，也不乱了步伐。马穆鲁克不断袭扰，又随即消失，从不打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在贝尼·哈桑附近，他考察了开凿在俯瞰尼罗河的石灰岩崖壁里的陵墓，墓中壁画描绘着摔跤、狩猎和日常生活的场景。

色彩依然鲜明：赭红，埃及熔块的蓝，孔雀石的绿，雌黄的黄。沙漠把它们周围的空气烘得干燥。他想起了巴黎的那些画，被清漆熏黑，被几个世纪的潮气磨灭了光彩。

德塞允许他停留几个钟头，再继续行军，他便在这段时间里画下了其中好几幅场景。他的速写很快。他已学会在十分钟内抓住要义：形式上的庄严程式，叙事上的鲜活生动。

就这样，在队伍扎营的时候，他从一座岩窟墓走到另一座。

德农从不叫苦。他边走边画，歇脚时画，晚上在军帐里借着火把的光也画。他的耐力令军官们大感惊讶，起初他们都把他的随行视作累赘。

“您这位学者比我的新兵还经得住，”有一天，德塞指着部队休整时坐在一块岩石上的德农，对一名副官说。

“那是因为他有事可做，”副官答道，“凡是有理由环顾四周的人，总比旁人活得久。”

1月20日，若马尔第一个望见了丹德拉。哈托尔女神的神庙矗立在耕地中央，在上埃及干燥的空气里，远远便能望见它庞大的身影。

“您看，”停在他身后的德农说。

德塞下令休整。军队在邻近的村庄盖纳扎营。费拉们站在自家门槛上望着，不上前来。他们见过别的队伍经过。这一支带着的却是些拿测量仪器和笔记本的人，这并不更叫人放心。

若马尔第一个走了进去。在门槛处，他数了数：二十四根柱子，高约十五米，柱头上哈托尔的面孔朝着四个方向。他从套子里取出经纬仪，又放了回去。从哪里开始？在学院的八个月里，他一向知道从哪里开始。而这里，大厅自有一种逻辑，超出了他的仪器一眼所能把握的范围。太大了，太浑然一体了。必须选一个入手点，可这个选择忽然显得武断了，面对金字塔或孤立的石柱时，他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最后，他瞄准了最近的一根柱子。这至少是个开始。

“太了不起了，”德农在他身后低声说，“这些衣褶的精细。”

若马尔测了五天。每根柱子十五米，接缝细得连一片刀刃都插不进去。天花板高逾十五米。四壁满是浮雕。他记下尺寸、角度、朝向。德农在大厅的另一头作画，沾满炭粉的双手几乎不曾停歇。

“没有我们这些现代工具，他们是怎么做到的？”若马尔低声问。

“靠时间，靠人力，靠一种能数十年如一日持续用力的组织。这座神庙花了好几代人才建成。他们把这项工程父子相传，如同一份神圣的遗产。”

“埃及人对星辰的了解，比我们至今所知的还要深，”若马尔指着天花板赭色底子上用浓蓝绘成的星座说，“这个穹顶就是古埃及夜空的星图。”

第二天，若马尔注意到一个细节，没有记在公务笔记里。傍晚，他在帐篷里把它写进了自己的私人日记。

先头营的三名士兵，整个下午都泡在神庙的侧厅里。他们并不当值。回来时，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尊蓝色釉砂小像：一只蹲坐的猫，耳朵竖立，眼睛镶着黑色玻璃。他把它拿给同伴们看，他们笑了起来。

若马尔看着他们走过。那只釉砂猫已有两三千年。它是作为还愿的供品，由一位名字没有流传下来的工匠放进神庙的，为的是一桩人们连内容都已遗忘的祈祷。三年之后，它就会在马赛。这条链条很短，不留任何痕迹。若马尔想到了重力：轻的东西总是向下坠落。而在这里，下，就是北方。

同一天，在神庙的大庭院里，科斯塔兹正在忙碌。

他上午依照波拿巴清单上的类别挑出了六件东西：两只圣甲虫，一件金护身符，一尊塞赫迈特小像，都符合清单上的标准。但有两件与众不同。一件是埃及无花果木的书吏调色板，芦苇笔还插在各自的芦苇套里；木材几乎从来留存不下来，这是一件极其罕见的珍品。另一件是雪花石膏的卡诺卜罐，隼首盖子完好无损，代表肠道的守护神凯布塞努夫。六件东西在石头上一字排开，编了号，贴了标签。

若马尔从庭院入口走近。科斯塔兹在日光下填写他的表格，不慌不忙，也不遮掩。这正是他与士兵们所作所为的全部区别：表格。

“科斯塔兹公民，”若马尔走近时说，“这几件东西非同寻常。”

“确实。书吏调色板在近年各次远征所知的记录中是独一无二的。芦苇笔完好无损，极为罕见。埃及无花果木之所以保存下来，是因为它被亚麻布包裹着，那块布是我在神龛一个侧间里发现的。两千五百年，在理想的条件下保存。”

他没有抬眼，继续写着。那是科学家的笔迹：精确，简洁，毫无修饰。

“卡诺卜罐会引起化学家们的兴趣，他们可以用它分析木乃伊防腐用的树脂，”他接着说，“我从内层的树脂上取了一块碎片。这份取样的编号，您可以在委员会登记册上找到，参见一百一十四-B。”

他把第六个编号记在表格上，签了名，撕下存根，递给若马尔。

“委员会目录，正式征集部分。如果您想为自己所在部门的档案留一份副本的话。”

若马尔接过那张纸，看了看。形式无可挑剔。他一言不发，把它收进了自己的挎包。

村里有个人来看若马尔测量。译员哈桑站在一旁。那人看了一会儿便走了。这次相遇很短暂。

次日，那人又来了，靠着一根柱子坐了两个钟头，一言不发，看着若马尔工作，然后离去。第三天，他带来了一样东西：一只陶制的小罐，盛满清凉的水。他把它放在若马尔的仪器旁边。

若马尔喝了。水很凉，带着一点矿物质的味道。他用阿拉伯语说了谢谢，那是他学会的寥寥几个词之一。通过哈桑，他们交谈了几句。

那人知道这些柱子的名字。不是学者们所用的希腊式名字，哈托尔、努特、伊西斯，而是世代父传子的阿拉伯

语名字。东北角的那根柱子，村里叫它“涨水时流血的柱子”，因为石灰岩上有一道裂缝，尼罗河涨水时，有时会渗出含铁的红色水流。中央那根叫“声音之柱”，因为用张开的手掌在某个高度拍击它，它会发出一种低沉的声响，传遍整座大厅。

若马尔把这两个名字记了下来。他知道它们不会出现在《埃及志》里。它们没有可以测量的价值。但它们说出了他自己的测量所说不出的东西：这座神庙长久以来一直活在村子的记忆里。它不是一处废墟，而是一位邻居。三天后，德农独自回到神庙，带着一支蜡烛和他的笔记本。他想画上层礼拜堂里的黄道带。

奥西里斯礼拜堂在神庙的屋顶上，是一间小厅，要由一道外部楼梯上去。天花板很低。蜡烛投下的橙黄光亮远远不够。他躺在冰凉的石头上。头顶上，刻在砂岩里的，是天空的星图：一个直径两米半的圆盘。中央是拱极星座。大熊座化作一条公牛的前腿，还有一位手持鱼叉的河马女神。圆周上是希腊黄道十二宫，与埃及的图像交织在一起：白羊，金牛，还有宝瓶，被表现为泛滥之神哈比，手持两只瓶子，尼罗河自瓶中流出。

这块天花板无法原样搬走。数吨重的砂岩嵌在穹顶里。但德农两天前已把这个难题提给了库泰勒上尉，他是远征军的气球部队长官，当年在弗勒吕斯放飞过观察气球的那一位。库泰勒是军中最富创造力的工程师。他前一天来看过黄道带，用的是技师而非艺术家的眼光。

“可以办到，”他一边查看接缝一边说，“但不能用我们现有的东西。需要淬火钢齿的锯子，螺旋千斤顶，生石灰，一座二十米高的起重木架。至少六周的工期，要二十个人。还要一艘专门改装的船来运这块石头。几吨重，普通的船舱不够用。”

“结果值得这番努力吗？”

库泰勒又看了看黄道带，目光沿着圆盘，从一个星座移到另一个星座。

“这是我所见过的、对古代天空最完整的表现。是的，值得付出这番努力。但不是现在。也许三十年后，要是有人带着器材和时间回来的话。”

德农把这次谈话记入了一份呈交科学参谋部的备忘录。这是第一份提到有可能取下丹德拉黄道带的正式文件。这份备忘录将被送往开罗，在一只箱子里沉睡，等待军队所没有的条件。

他仰面躺着画了两个钟头。蜡烛熄了，他又点了一支。等他下来的时候，夜色已降，士兵们已不耐烦地等了一个钟头。

“您拿到想要的东西了吗？”一名少尉问他。

“一幅初稿。不精确。要认真测绘，得有好几个人。”

德农已请科学参谋部派工程师来补全他的工作。两名年轻的综合理工学院出身者，若卢瓦和德维利耶，将在他之后三周赶到，用他们的精密仪器完成测绘。

第二天晚上，若马尔要解决一个征用口粮的问题。他去找军士长奥贝尔，此人掌管德塞营的军需。他在离主营地稍远的一顶帐篷里找到了他，奥贝尔坐在一张小桌前，面前有一盏灯和一本册子。

奥贝尔拿着一份分成三栏的清单：物品，连队，士兵。行距很密。若马尔站在原地，不动声色地读了起来：“蓝石小像，第二连，拉辛。浮雕残块，第三连，迪普莱西。釉砂圣甲虫，第一连，马兰。彩绘陶罐，第四连，勒菲弗。”至少有二十行。

奥贝尔抬起头来。他似乎并不意外自己被人看着。

“学者公民，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我是来找测量杂役用的额外口粮的，不是什么急事。”

若马尔没有问起那份清单。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一份非正式的清点，没有谁下令，也没有谁禁止，由一名士官记录在案，他察觉自己营里有东西在流转，便决意弄个明白。这份清单不是纪律上的管控，而是一种预防。如果日后有人追问，奥贝尔答得上来。而如果没有人问——这更有可能——这份清单就留在他的册子里，成为一份没有收件人的文件。

他三言两语解决了口粮的事，转身走了。

出发前的那一夜，若马尔没有整理他的测量数据，而是着手做另一件事。

他从自己确知的事实开始。军士长奥贝尔的清单上，仅第二连一个连，两天里就有二十三件物品。德塞营里有四个连。轮流驻留在这处遗址的有两个步兵营。再加上军官们，他们的取法不同：更讲挑选，数量较少，但件件价值更高。再加上科斯塔兹的正式征集：六件有记录的，或许还有别的没有正式记录的。

他做了一个估算。保守起见：每个连每个驻留日二十件。四个连，五天，两个营。结果：仅这一座神庙，至少八百件。再加上向商贩的购买，以及军官们悄悄收集的，就超过了一千件。

一千件东西离开丹德拉。他端详着这个数字，又望向神庙。它在黑暗中隐约可见，离营地两百米。神庙无比庞大，这一千件不过是它仍藏之物的一小部分。但正确的算法是：多少座神庙里驻留多少次，再乘以一千。

丹德拉与阿斯旺之间，至少有十二处重要遗址。他在页底写道：“全程估计总数：数量级一万件。区间下限。无法核实。”

随后，他停在了自己刚写下的字上。一万。这个数字看上去很抽象，其实不然。它对应的是一万件东西，它们已在埃及的神庙或陵墓里待了许多世纪，半年之后便将不复在此。

装骡子的时候，他用目光寻找那个手里拿着釉砂猫的士兵。在数百张面孔中，他没有找到。那个人是存在的。那只猫是存在的。就在这一万之中的某处。

离开丹德拉之前，若马尔去找了科斯塔兹。

科斯塔兹正在监督人钉他的箱子。他抬起头来。

“科斯塔兹公民，我对这座神庙被取走物品的总量做了个估算。”

他把笔记本翻到计算的那一页递过去。科斯塔兹读了。他花时间核对了各项假设，在心里把算术重做了一遍。

“您的低位区间是合理的，”他终于说，“军官那一块略有低估。”

“您不觉得这个数字有问题吗？”

科斯塔兹把笔记本还给了他。

“我觉得这个数字准确，或者接近实情。对谁有问题？对委员会？没有，我们的征集都有记录。对军队？那要由德塞来判断。对这座神庙的历史？当然有。但这座神庙的历史，从罗马人和希腊人起就一直有人取走东西。我们不是第一批。而埃及熬过了此前所有的人。”

“这不是理由。”

“是的，这不是理由。但这是一种背景。而在这种背景下，需要确定的是，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委员会所做的，是

否站得住脚。我认为站得住。至于其他，我既不是警察，也不是法官。”

“您是数学家。数学家不会说一个计算站得住脚，他只会说它准不准确。”

“我们的账是准确的，”科斯塔兹没有抬眼，答道，“档案，描述，给卢浮宫的物品。”

“这是波拿巴要求的。换了我，我不会这样要求。”

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德塞示意动身。若马尔收起经纬仪。德农满怀真切的惋惜，才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撕开。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和平时期重返这个国家，”若马尔说，“光是这座神庙，就值得研究半年。”

他们不会再回来了。他们的画会留下。

通往底比斯的路沿着尼罗河延伸了两天。晚上在营地，军官们开始谈论他们即将看到的神庙。卡尔纳克。卢克索。这些名字在人群中传开，带着那种兴奋，仿佛人们正走近一件一辈子听人说起、却从未亲眼见过的事物。

II - 底比斯

1月27日傍晚，远征军在底比斯废墟对岸扎营。

若马尔在河岸上停住脚步，就那样站着，什么也不做，望着尼罗河对岸落日余晖中黝黑的塔门。

卡尔纳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阿蒙-拉神庙的多柱厅：一百三十四根巨柱，居中的十二根高达二十一米。他跨过门槛，怔在原地好几分钟。这座大厅占地约五千二百平方米，是古代世界最大的有顶空间之一。

“天哪，”德农低声说道，“任何描述都无法还原它的万一。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明白。”

在卡尔纳克度过第一天之后的那个夜里，若马尔提着灯笼坐在神庙的庭院里，开始整理那些数据。这座大厅之所以宏大，并非因为某位法老想要炫耀权势，而是因为它承担着一种功能：容纳一场游行、一群人、一场仪式。每一处尺寸都对应着声学、光照和礼仪上的某种要求。埃及人建造从不虚耗，他们建造得恰如其分。

他记道：“这座大厅比例的规整表明，当时存在一套历经数代传承、精确无误的度量体系。大厅的长度约为宽度的两倍。中央各柱之间的间距等于柱身的直径。这些比例绝非偶然。”

外面，沙漠的某处，一只胡狼在嚎叫。若马尔抬起头。柱群上方的星辰格外明亮。

忽然，就在他转动经纬仪、测记一颗参照星的方位角时，他领悟了一件他原本无意去领悟的事。这种领悟并不像一场论证水到渠成地终结，而是骤然降临，先在身体里，后在头脑中。那是一种肉体上的确信，近乎眩晕，就像一个冗长的计算得出了一个整数，人还没有验算，便已知道它是对的。

神庙的主轴线——连接入口与最深处圣殿的那条轴线——朝向东偏南二十六度。他把计算核对了两遍。二十六度。这个数字从早晨起就在他的测绘记录里，被他不假思索地记下，与别的数据无异。可此刻，在黑暗中，头顶是满天星辰，他明白了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那是底比斯纬度上冬至日日出的方位角。

他守着这一发现，静立了好几秒钟。他手中握着的，是一个从未有人这样表述过的结果，他想先确认它是真实的，再落笔写下。

卡尔纳克不只是一座神庙，它是一架天文仪器，朝向经过精心设定，使一年中白昼最短的那天清晨，初升太阳

的光线能够进入圣殿，沿着轴线一路推进，直抵宏大的多柱厅。营造的精确正在于此。埃及人早已算定，并据此施工。

他在日记里急切地写下一篇长达数页的笔记，详述计算、测量与结论。他打算第二天就把这篇笔记寄给傅里叶。傅里叶是委员会里最严谨的数学家，他有能力验证。三周后，傅里叶的回信到了，只有寥寥两行：“您的计算无误。请记入《埃及志》。”

凌晨两点，若马尔回到营地。从他离开帐篷到现在，已过去五个小时。他卷起笔记本的纸页时，双手微微发颤。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某种他找不到词语来命名的东西。他早已习惯那种印证假说的发现。而这一夜，他遇到的却是另一种东西：一个从发现本身中诞生的假说，而他从未刻意寻求。这样的事，他以前从未遇到过。

此后几天，德农把时间都用来踏遍卡尔纳克建筑群，每天十个小时，深知留给他的时间所剩无几。四十米高的塔门上刻着法老时代战争的浮雕。粉红色花岗岩的方尖碑笔直耸立，是自南面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运来的整块巨石。其中一座由第十八王朝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所立，高二十九米半。碑面上布满纵向排列、刻工精细的象形文字，无人能够释读。

所有人都看见铭文无处不在——柱子上、墙壁上、石棺上——却无法读出其中一个字。埃及的全部历史就在那里，缄默无言。

在卡尔纳克的大庭院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站在一排浮雕前，上面刻的是作为贡品献上的动物：狮子、长颈鹿、猴子、羚羊。他以博物学家的严谨逐一抄录这些物种，并标出如今埃及已不复存在的那些。每一种消失的动物，

都是自古代以来气候变迁的一项数据。别人当作装饰来看的东西，他读作动物区系的清单。

“这头浮雕上的狮子，”他对恰好路过的若卢瓦说，“头骨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狮子不一样。侧面轮廓更平，鬃毛更长。要么是画师画错了，要么古埃及的狮子是一个独立的种群。我倾向于后一种假设。”

若卢瓦看了看浮雕，又看了看若弗鲁瓦，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若弗鲁瓦并不需要回答，他有自己的问题就够了。

那夜稍晚些时候，若马尔正在整理他在卡尔纳克的测量结果，忽然听见了声响。

不是战斗的声响，而是劳作的声响。沉闷而有节奏的敲击声，还有重物在石板上拖曳的刮擦声。他拿起灯笼。

大厅里，三名士兵借着两支火把的光在干活。他们清空了一个壁龛，里面存放着雕像的碎块——神像的头、手、半身像——此刻正在石板上分拣：值得搬走的放在一边，太重的放在另一边。其中一人双手捧着一颗黑色花岗岩的隼首，大概是荷鲁斯，眼睛嵌着某种深色的物质，火把的光下辨认不出是什么。他翻转着它，试图掂出分量。

若马尔留在大厅入口。他本可以出面干预。委员会成员的权威足以让他禁止未经许可的搬运。他没有这样做。这些士兵只有三个人，而德塞的各营里有两千人。一个孤身提灯的人拦不住的事，犯不着为了原则去试。

次日，在建筑群北面的庭院里，若卢瓦有了一个发现。散落在瓦砾之间的第十二王朝浮雕残块，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尺度更小，更显亲切，国王的形象不那么庄严刻板，而更有人情味。其中一位国王的脸上带着倦意，那是任何一位鼎盛王朝的法老都不会容许出现在自己纪念碑上的神情。

“这块浮雕想必是我所见过的、对一位法老心理刻画得最为真切的作品，”若卢瓦对已经画了一个小时的德农说，“您看那双眼睛。这里有倦怠，是权力的倦怠，而非权力的辉煌。”

德农停下了笔。若卢瓦说得对。那张脸望向的并不是永恒。

在卡尔纳克待了三天后，远征军转往南面三公里的卢克索。那里有阿蒙霍特普三世与拉美西斯二世的神庙。连接两座神庙的狮身人面像大道，早已被黄沙和建在其上的村庄房屋掩埋。

德农勾画了那条自入口庭院通往内殿圣所的大柱廊。十四根纸莎草式立柱，高十九米，造型优雅，见证了第十八王朝的审美趣味之精致。墙壁上刻着奥佩特节的游行浮雕，描绘阿蒙神像每年乘圣船从卡尔纳克运往卢克索的情景。他把这一场景抄绘了好几页。

入口塔门上还有另一些浮雕，表现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人之间的卡迭石之战。浮雕绵延六十米，自地面起覆盖到十米高处，场面雕刻得极富动感。这场战役的结局本有争议，拉美西斯险些被合围，之后才得以突围。但卢克索的塔门上展现的只有凯旋。法老的宣传就是这样运作的：把官方的说法刻进石头里，刻在无人能够更正事实的高度。

塔门前矗立着两座方尖碑。后来，穆罕默德·阿里于 1830 年把其中一座赠给了法国，正是这两座中的一座。那一座将在 1833 年乘一艘专门设计的船驶抵巴黎，并于 1836 年竖立在协和广场。1799 年的德农注视着它，却不知道它最终会落脚在那里。他记下了它的尺寸、铭文，以及在四个面上反复出现的王名圈。

一天下午，德塞来看方尖碑。他抬头望向第一座碑的尖顶，它高悬在他头顶二十五米之上，随后又转向身旁作画的德农。

“这些竖着的石柱，能把它们运走吗？”

“这是方尖碑，花岗岩的，每座大约两百三十吨。”

“有河在下面，再加上杠杆，埃及人不就办到了吗。”

“那是三千年前的事了。而且他们是借着洪水，把碑从南方顺流运到北方的。要把它运回法国，就得装上一艘专门建造的船。我们在地中海的任何船只都做不到。”

德塞又看了一眼方尖碑。

“总会有人想出办法的，只是不会马上。”

他转身回参谋部去了。

在卢克索神庙的侧厅里，盗掘者早在他们之前就动过手，德农在那里找到了匆忙的掘宝人所遗漏的东西：青铜小雕像的残片，脚，手，还有一张完整的奥西里斯鎏金青铜面像，高十五厘米。那张脸带着晚期埃及青铜像特有的安详。杏仁形的眼睛微微上斜，嘴唇薄，戴着编结的假胡须。金属是用失蜡法浇铸，再经凿刀加工而成。眉毛和眼眶的轮廓镶着细金，瞳孔用黑色玻璃制成。

这一类青铜像自公元前7世纪起便成批量地生产。成千上万尊还愿的小像，由信徒献入神庙，换取神明的庇佑。这些物件从来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们是献给神的礼物，是神庙的财产。盗掘者清空库房时，拿走的是阿蒙的遗产，而不是某个人的。这个细节并没有让所有权问题变得简单，反而使它更复杂了。神明无法提出索还。

德农拾起奥西里斯的面像，翻过来。背面用凿刀刻着一行象形文字，大概是献祭者的名字。他抄下那些符号，随后把这件东西收进挎包。收的时候，他想到了波拿巴

的清单。这张鎏金青铜的奥西里斯面像毫无疑问是头等的精品。他本应把它报告给贝托莱或蒙日，归入官方的收藏。他没有这么做。自从丹德拉以来，他为委员会取走的和为自己取走的之间的界线，已渐渐模糊。他个人的清单里已有三十来条记录。这些物件在半年前，还不存在于欧洲人的藏品名录之中。

这和偷窃不是一回事。他几乎说服了自己。

那天晚上，若马尔又在神庙正面前待了一个小时。这座神庙的建造延续了两千年，每一位法老都添上一座塔门、一条大道、一间殿堂。两千年的持续营造，风格没有断裂，计划也从未动摇。埃及完成了欧洲从未解决的一件事：一项建筑工程得以跨越世代传承下去，而无人决定过它的终点。

而此刻，士兵们却把这项工程的碎块装进了行囊。他们并非为了毁坏，也无意做破坏者。但结果是一样的。那些运往巴黎，或进入军官们私人收藏的碎片，不再处在那个自洽的体系之中。它们成了孤立的物件，成了稀罕玩意，成了纪念品。

回帐篷之前，若马尔写道：“卡尔纳克是一个体系。每一个构件在整体中都有它的位置。挪走一个构件并不会毁掉卡尔纳克，却毁掉了这个构件作为体系一部分的存在。它在别处将成为另一种东西——一件器物，一件藏品——而不再是此地某种确定的东西。”

那天晚上离开卢克索时，德农看见神庙入口坐着一位老人。他穿着白色的加拉比亚长袍，望着士兵们把石块搬进院子。他看上去并不愤怒。那是一张看着早已见过之事的脸。

德农停下了脚步。哈桑向那人打了招呼。两人交谈了几句。

“他说他父亲是这座神庙的守护人，祖父也是，曾祖父也是。他不知道已经传了多少代。他说奥斯曼人来过，马穆鲁克人来过，现在法国人也来了。每一回，他们都要拿走石头。”

德农请哈桑转达一句回答：法国人来此是为了研究，不是为了破坏。哈桑翻译了。那人回敬说，奥斯曼人当年也说他们来是为了别的缘故，结果还是照拿不误。

德农无言以对。他画下了那个老人的背影。白色的加拉比亚长袍，花岗岩石块，以及他身后院子里的士兵。

德农没有看见的，是这一幕背后的情形：官方工作时间结束之后，哈桑都在做些什么。

哈桑是委员会的正式翻译。他是开罗人，早已明白自己的位置让他得以在两个世界里通行无阻。他把学者们的问题译给费拉听。至于费拉们私下议论学者们究竟想要什么，他并不总是照实转译。

若马尔在头一个星期之后就看明白了。哈桑是个牟利的中间人，帮学者们向当地商贩采购，并从中抽取佣金。若马尔估计是百分之十五。卖方与买方都不知道，他们各自处在一条链子的两端，而哈桑正是链子中间的那一环。

在卡尔纳克的一个夜晚，若马尔起身，远远跟在哈桑后面。哈桑穿过主营地，走向高级军官们住的那一片，在一顶帐篷前停下，低声同一名仆人说了几句。仆人进了帐篷，带着两名军官出来，一位上校，一位参谋部的上尉。哈桑打开一只帆布袋。借着油灯的光，他在一块折起的毯子上摆出四件东西。比他白天拿给士官们看的要精美得多。一枚青金石的王室圣甲虫，稀有而沉重。一只半透明雪花石膏的杯子。一尊十厘米高、蓝色釉砂的卜塔小像。一件纯金护身符，是一尊端坐的巴斯特。

军官们查看了这些物件。上校讨价还价。哈桑在价钱上让得那样轻松，足见他一开始就把利润空间算进去了。四件东西易了主。哈桑收起钱，数也不数。

若马尔未被察觉，回到了营地。第二天清晨，他直截了当地质问哈桑，不绕弯子。

“我看见了，”若马尔说，“夜里同军官们的那桩买卖。”

哈桑点了点头，毫无窘色。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是古尔纳的一个人，夜里渡过尼罗河带来的。他知道一些法国人至今还没去过的墓。这些年来，他找到什么就卖什么。”

“那您抽的佣金呢？”

“售价的百分之十。军官比士兵付得多，参谋部的军官又比连队军官付得多。这合情合理。”

“那么白天您卖给学者们的呢？”

“百分之十五。以量补价。我是在为想卖的人和想买的人撮合交易。盗掠，在我之前就有了，在我之后也还会有。墓不是我挖的，墙不是我砸的。我只是翻译价钱。”

哈桑走开了。该说的他都说了。事实很简单：他是开罗人，父亲是宗教法庭的抄写员，精通阿拉伯文，法语也足以为这些人效力。他接下这份差事，是因为报酬优厚，也因为法国人从来待不长。军队来来去去，神庙却一直留着。

哈桑没有对若马尔说的是：两天前的拂晓，在学者们起身之前，他独自一人走进了卡尔纳克神庙的大厅。

在这次远征之前，他从未见过卡尔纳克。他的祖先并没有建造这一切。对这些象形文字，他手里也没有比德农

更多的钥匙。但没有人要求他去释读它们。要他做的，是翻译价钱。

III - 国王谷

1月30日，若马尔第一个渡过尼罗河，前往西岸。他请求天亮之前就出发，好在军队开动之前，独自占有这片遗址。

底比斯的墓地在多山的沙漠中绵延数公里。若马尔是从波科克和诺登的游记里知道它的，但这些叙述并未让他那双制图者的眼睛对眼前的实景有所准备：一道石灰岩的山谷，凿在悬崖之中，离河五公里，岩壁上的每一个开口都标志着一座墓的入口。可见的开口有几十个。沙下肯定还有更多。

他爬上一处俯瞰山谷入口的岩石平台。从这个位置，他一览无余：悬崖上的墓口，采石工人踩出的小径，以及古人开采这片岩石的遗痕。法老们放弃了金字塔，改在此处凿墓，据说是为了更隐秘。盗墓者还是找到了它们。几乎所有的墓在古代就已被洗劫一空。若马尔测量的，是无人能够偷走的东西。

他施行的是他所称的“实地三角测量”。

从一个中心点出发，用经纬仪依次瞄准所有可辨认的标志，记下角度，再根据地面上量得的基线推算距离。那天早晨，他从拂晓起一刻不停地工作。七点左右，一名士兵带着他的口粮来找他。若马尔向他道了谢。若卢瓦的工作方式则不同。若马尔追求的是角度与距离，而若卢瓦追求的是关系。一个尺寸透露出另一个尺寸的什么，一种比例又泄露了怎样的意图。若卢瓦的笔记本里没有若马尔那样成列的数字，只有加了批注的草图、以分数

表示的比例，以及不同遗址之间的比较。两位工程师出自同一所学校，却用不同的眼睛看着同样的石头。

若马尔在他的岩石平台上看不见的，是古尔纳的向导们把他们领进墓中之后所做的事。

古尔纳的费拉几代人以来对国王谷的每一个入口了如指掌。他们的村子就建在墓穴之上。房屋坐落在地下墓室上方，孩子们在历代王朝的亡者头顶长大。数百年来，他们悄悄地从这些墓中营生，卖给开罗的商人，卖给少数敢于涉足此地的欧洲旅行者。这门生意规模不大，细水长流，又因怕惹来奥斯曼当局的注意而保持着分寸。

法国人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衡。

学者们想把一切都看个遍，而且立刻就要看。他们要求向导带路，去那些凭自己永远找不到的墓。古尔纳的人为德农和若卢瓦引路时，暴露了他们一向小心翼翼不让当局知道的入口。法国人走过之后，这些墓便被“发现”了，为人所知，并被绘入地图。盗墓者们保持了几百年的隐秘，几天之内便荡然无存。

“我们是在制造我们自己的市场，”若卢瓦说，“带着一支军队和一堆笔记本来到这里，我们正在大大加速自己初来时所见的那种盗掠。”

“盗掠的不是我们。”德农说。

“不，不是我们。可是为这件事快上十倍创造条件的，正是我们。”

德农和若卢瓦跟着向导们下到墓里。甬道陡峭地向下倾斜，窄得有些地方不得不匍匐前进，手肘磨在石灰岩的粉尘里。火把在凿平的岩壁上投下晃动的影子。空气先是变冷，继而变沉，最后凝滞不动。那是数百年来纹丝

未动的空气，似乎在抗拒着闯入者。他们来到一间前室，四壁绘满了壁画，色彩鲜艳得令人惊叹。

若卢瓦猜出了那些日后被称作《阿姆杜阿特》和《门之书》的场景。出发前他读过基歇尔。夜里的每一个时辰对应一道考验，每一道考验对应一位守护神。他画着，却并不明白。他把这些对应关系记在测量数据的页边。

“这些壁画美极了，可我不懂，”若卢瓦放下灯说，“胡狼头的阿努比斯，这个我认得。展开双翼的伊西斯。可其余的——这些仪式的姿势，这些符号——是一部我们没有钥匙的百科全书。”

两天里他们参观了七座墓。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拉美西斯三世的墓，布鲁斯三十年前曾到访过：漫长的廊道深深地通向地下。每一间厅室对应着太阳在冥界夜间旅程中的一个时辰。建筑师是把这个空间当作一部丧葬历书来构想的。

这座墓里的壁画让德农当场怔住。他见过西斯廷的壁画，见过意大利的拉斐尔。这些画并不逊色。它们只是不同。线条优雅，笔触笃定，只用六种颜色的调色板，却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印象。

“这些壁画与我们在欧洲见过的最美的壁画不相上下，甚至更胜一筹，”若卢瓦说，“而且笔触比巴黎挂着的许多作品都要稳当。”

墓室里仍留着红色花岗岩的石棺，上面雕着宗教场景。太重了，古代的盗墓者搬不动。

“象形文字的精确，”德农的目光没有离开石棺，“每一个符号都像出自珠宝匠之手。他们知道，这将是亡者在进入永恒之前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

“这些埃及人对死亡的理解有着真正的复杂性。死亡不是终结，而是一段旅程，一连串的考验。这样的神学，其精密程度不亚于任何一种欧洲的神学。”

“我们今天读不懂的，”若卢瓦回答，“以后会有别人读懂。那时，我们的摹本将成为核对释读的珍贵文献。”

这一天的第三座墓——一间简朴的墓室，大概是某位中级官员的——德农在地上发现了一卷展开了一部分的纸莎草纸。盗墓者把它留下了：既没有黄金，也没有眼前可换的市价。他小心地将它拾起。纸莎草纸干燥，边缘发脆，但卷芯保存了下来。他把它摊在膝头上展开。

文献高四十厘米，长逾两米。上面布满黑色的象形文字纵列，配着红色和赭色墨水绘成的插图：一架天平，一边的秤盘上放着一根羽毛，另一边是一颗人心；一个人跪在四十二位审判官面前；胡狼头的阿努比斯手握一柄瓦斯权杖。这便是后来被称作《亡灵书》第一百二十五章的内容。称量灵魂，即灵魂的审判。

两人都不会读这篇文章。然而德农认得那些插图。他在别的墓里见过类似的场景。他小心地把纸莎草纸卷起，用手帕的亚麻布包好。到了巴黎，马塞尔会研究它。这并不是这卷纸莎草纸被制作出来的用途。但这是它所遭遇的命运。

这一天的第四座墓里，德农发现了第二卷纸莎草纸。这一卷比头一卷更大。他俯身去取。

护卫的士兵比他先到。也不完全是比他先到。他们是同时看见那卷纸莎草纸的。但德农还在盘算的时候，士兵已迈出一步。士兵的手已经压在上面。两人对视了一秒钟。然后德农从士兵手里拿过了纸莎草纸。不是粗暴地夺，但也毫不迟疑。他说：“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士兵松了手。他实在拿不出什么理由来争。

科学与艺术委员会是合法的权威，德农有权征取科学文献。这与士兵即将要做的事不同。

士兵已经离开了墓室。德农独自留在那里，面对着他的火把和空空的壁龛。他所做的事是合法的。他所做的事迅速，果断，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他所做的事和士兵的举动是同一个动作。伸向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手，对价值的瞬间估算，攫取。唯一的区别，在于这个动作由谁做出，便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德农明白自己刚才做了什么——不是动作本身，动作在几秒钟前就已完成——而是这个动作的含义：他援引了一种权威，使他得以抢在士兵之前取走。而结果是一样的。他没有回头，走出了墓室。他在私人日记里用一行字记下：“抢在士兵之前拿了纸莎草纸。”

至于那个士兵，他也没有空手而归。他回到墓室，捡起了德农留下的东西：地上三枚碎裂的釉砂护身符，一块镀金的亚麻硬壳残片，一块彩绘石灰岩碎片，上面有一只清晰可辨的荷鲁斯之眼。这些是德农觉得不配放进挎包的次等物件。士兵却觉得配得上自己。两人都做了一番挑选。不同的只是标准。

中午，若马尔从他的岩石平台上下来，找到了德农。

“您那座墓在我测定为悬崖顶点的那个位置以东一百三十二米处。”

“那有用吗？”德农问道，一边擦着沾满石灰岩粉尘的双手。

“等到有人想系统地发掘这座山谷时，我的地图会告诉他从哪里开始。眼下，没有人知道沙下还藏着多少座墓。我的测量会告诉他往哪里挖。”

他望着若马尔笔记本里那一列列数字，却看不懂那些演算。

“您已经在为我们之后的人着想了。”

“我从一开始就在为他们着想。我们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完。但我们可以做到，让后来的人能从我们停下的地方接着往下走。”

回到营地，若马尔思索着在国王谷的这两天教给他的东西。不是关于墓，而是关于盗掠。

自从来到山谷，他同时看到四种不同的逻辑在起作用：古尔纳的向导们，利用学者们所揭示的墓穴，在新的需求推动下，使一门古老的生意加速运转；士兵们，能扛多少就捡多少，毫无组织，毫无标准；军官们，悄悄地、用干净的钱购买；而专员们，则凭借权威、方法与文献记录来取走。还有他自己，带着他的测量。还有德农，带着他的笔记本和挎包。

这四种方式产生同一个结果：曾经在埃及的东西，不再在埃及了。令他不安的并不是数量，而是在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缺乏一条清晰的分界线。委员会有收集科学标本的官方权力。但这种权力没有精确的界定。它没有说：这个可以拿，那个不可以。它只是说：你们到这里来是为了科学。由科学来裁决。

他在日记里写道：“收藏与盗掠的区别，是去向的区别，而非行为的区别。我们为巴黎而收藏，他们为自己而盗掠。国王谷分不出这两者的不同。”他合上了日记。这不是他想与人分享的结论。

在悬崖脚下的平原上，德塞在拉美西斯二世倒塌的巨像前停住了脚步。那张安详的面孔望着天空。胸前刻着宣示他头衔的铭文。宇宙之主，两地之主。

“这位拉美西斯曾统率数以万计的人，”德塞望着倒下的巨像说，“他建造的纪念碑，本是为了永恒。可如今他躺在沙里，鼻子也断了。”

若卢瓦放下测量链，以工程师的眼光审视着这座雕像。

“这花岗岩来自南面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他们开采出整块毛料，借着洪水漂到底比斯，再在这里雕琢。是山来到了神庙，而不是神庙去就山。”

次日天亮之前，若马尔和德农就守在门农巨像前，等待太阳升起。第一缕阳光触到了石头。什么也没有发生。这座巨像已有近十六个世纪不再歌唱。两人对视了一眼。

“它不再歌唱了，”若马尔补充道，“据说是一位罗马皇帝下令修缮它之后，它就沉默了。多半是石头在清晨骤然的热气下膨胀，使裂缝发生了震动。一种纯粹的物理现象。”

“当然。可是想想看，古代的朝圣者在没有您那套热学解释的情况下听见这声音，会是什么感受。对他们来说，雕像是真的在说话。这种信仰有一种宗教的力量，您的解释无论多么正确，都无法取代。”

德塞在清晨时分来看了巨像，抬头望向那两张毫无表情的面孔，转身离去。

“令人印象深刻。不过眼下，马穆鲁克人更让我们操心。你们完事了就跟上来。”

德塞走后，若马尔仍留在门农巨像前。他望着那尊坐在平原上、高十八米的石英岩巨像，周围没有神庙，也看不到任何建筑背景。士兵们和古尔纳的商人搬不走的，正是这个。一尊十八米高的巨像，矗立在底比斯平原上，五公里外就能望见，四周空无一物。这是一个无人能够

挪动的空间事实。这座雕像只有在那里，在那一片特定的景观之中，才有意义。

那些可以携带的物件，从被取走的那一刻起，便切断了这种联系。国王谷一座墓里的一尊釉砂沙布提俑，是在它应在的位置上。它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在那里，陪伴那一位特定的亡者，走那一段特定的旅程。

然后他收起笔记本，拿起仪器，向营地走去。巨像留在他身后，岿然不动，立在它们的平原上。这是它们胜过一切被带走之物的地方。它们走不了。而正因为走不了，它们依然是它们一向的模样。

IV - 阿斯旺

2月2日，德塞下令继续行军。底比斯被抛在身后，出发一个小时之后仍能望见那些塔门。

纵队继续南行，前往两百公里外的阿斯旺。地貌渐渐收窄：先是沿尼罗河的一条绿带，再是紧邻的沙漠，多岩的山丘离河越来越近。费拉的村庄变得越发稀疏。山谷在收缩。

越往南走，居民也在变化。肤色更深的努比亚人逐渐取代了阿拉伯费拉。作物也不同了。杜拉，一种非洲高粱，取代了小麦。房屋变得更低矮，用土坯砌成，正面不开窗。法国军队穿行在一片久无欧洲人涉足的地区。

村子里的居民站在平屋顶上，看着纵队经过。他们没有逃跑。他们只是观望。若卢瓦把这一区别记在了笔记本里。上埃及的费拉数百年来早已学会等军队过去。他们知道抵抗要付出什么代价，合作又值多少。抵抗也好，合作也罢，他们一概不给。他们只是等待。

纵队从一开始就在带走东西。若卢瓦是通过观察驮畜才渐渐明白这一点的。离开底比斯时，骡子驮的是口粮、宿营器材和弹药箱。几天之后，同样的骡子驮上了额外的货物。帆布袋，临时拼钉的木箱，被超载地绑在驮鞍上。那是士兵们夜晚在宿营地亲手做的。

一天下午，若卢瓦在一头载得格外沉重的骡子旁停了下来。帆布袋没有扎紧。露出一角雕刻过的石灰岩，是一块浮雕残片，大约六十厘米乘四十厘米，表现一个行进中的人像的下半部分。长袍的下摆，双脚，权杖的底端。他认出了风格。托勒密时代的，很可能是遗址上的再利用构件。

牵骡子的士兵察觉到他的目光。他一言不发地把袋口扎紧。他们继续赶路。

“埃及正在骡背上向北走，”若卢瓦从神庙回来时对德农说。

“埃及的一部分。最轻的那一部分。”

“也是最便于携带的那一部分。决定什么走、什么留的，就是这个。不是价值，不是历史意义，而是重量。”

若马尔思索了片刻。

“这就是说，巴黎将要看到的埃及历史，将是那些重量不到二十公斤之物的历史。其余的一切都会留在这里。”

那天夜里，若马尔坐在尼罗河边，望着河水。他下意识地目测了河道的宽度：约三百米。水流和缓。

尼罗河向北流去。他们带走的東西也一样。军队有自己的补给线、河运船队，以及载着报告、信件和物资顺流驶往开罗的船只。同样在这些船上顺流而下的，还有搜集来的物品：委员会的正式箱子，军官们的私下包裹，沿岸尾随的驮畜身上绑着的袋子。

四千年来，尼罗河一直是运输的通道。法老们曾借它的水，把阿斯旺的花岗岩运往底比斯。罗马人曾顺着水流，把方尖碑运往亚历山大。如今，法国人把几个世纪留在上埃及的东西运往开罗。不再走水路，而是压在牲口的脊背上。河流并不区分货物。人们托付给它什么，它就载走什么。

若马尔想到了数字。自开罗出发以来，军队已在十来处遗址驻留过。每一次停驻都产生它那一份物件。凡能搬动的东西，都在向北滑去，被巴黎的市场、私人收藏、卢浮宫所吸引。没有哪一个人该独负其责。只有一道坡，物件顺着坡往下滑。

2月12日，在康翁波休整。

若卢瓦还没下马，就已辨认出那座神庙。它几乎被沙子整个埋住了。

若卢瓦在休整的两天里，带着他的测量链在神庙已清出的部分忙碌。浮雕异常清晰。埃及艺术保持其视觉语言的时间，比任何一个欧洲流派都更为长久。

“墙上的这些器械，”若卢瓦在内殿的一道浮雕前停下来，说，“手术刀，镊子，探针。埃及的医生是做外科手术的。没有一位古代作家这样精确地提到过这一点。”

德农把那些器械一件件抄进笔记本，记下尺寸和可能的用途。

营里的军医——一位名叫布吕扬的，曾就读于巴黎外科学学校——来看德农的摹本。他默默端详那些图样，良久不语。

“这把弯曲的手术刀，”他终于指着墙上的一件器械说，“我们用它做深部腹腔切口。弯度使它能滑到脏器下面而不会刺穿。我原以为这是近十年才有的新发明。”

“这些带橄榄头的探针，”德农指着另一件器械说，“您认得吗？”

“用于尿道导管插入。同样的形状，同样的大小。金属不同——是青铜，不是钢——但器械是一样的。这里有人解决了同一个解剖学上的难题，彼此独立，相隔两千年。”

他又在那些图样前待了一个小时，逐件辨认器械，讲解它们的用法。德农把讲解记在草图的页边。这样的双重解读——画家的图样，外科医生的注解——产生了二者单独都做不到的东西：通过对功能的了解来理解一件器物。

“您明天早上该来，”德农说，“后面的厅里还有别的医学浮雕。”

第二天早上，布吕扬与德农一同走遍神庙的内厅，外科医生辨认器械、口述用法，德农则边画边抄。这项为期两天的工作，将产生出《埃及志》中被引用最多的图版之一：康翁波神庙医疗器械图录，附有一位当代执业医师所作的功能注解。

与此同时，若卢瓦测量着神庙，思考它得以幸存意味着什么。答案很简单：是沙子保护了它。埋住它的东西，也保全了它。休息时，他向德塞谈起了这件事。

“如果我们真想保护这座神庙，”若卢瓦说，“就该让它保持原样。什么也不清理，什么也不碰。沙子保护它，比我们做得更好。”

“您是建议我什么也不做？”德塞说，语气里带着一丝笑意。

“我建议您考虑到，我们在这里的存在，对我们前来研究的对象，未必是有益的。”

德塞没有回答。他有一支军队要养活，有一场战争要结束。若卢瓦那些考古上的顾虑，在他的决策中毫无分量。若卢瓦留意着从神庙里流出去的东西：从内厅里钻出来、袋子沉甸甸的士兵；向专程赶来的伊斯纳商人买东西的军官；还有德农本人，经哈桑居间谈判之后，买下了两件。

他在这里所见的，在丹德拉、在底比斯都发生过，在阿斯旺还会再发生。结构总是一样：直接取走的士兵，供货的本地商人，牵线搭桥的中间人，以及凭正当权威购买的学者。

这座神庙供奉两位神——索贝克与哈罗埃里斯——布局严格对称：两个入口，两座多柱厅，两间圣所。若卢瓦注意到两条轴线稍有错开。建筑以此解决了两位神明平起平坐而又不分高下的难题。

“这些场景同我们在罗马凯旋门上看到的并没有太大不同，”德农指着囚徒跪在得胜法老面前的那几层浮雕，对若马尔说，“各个文明表现自己的军事胜利，用的都是同样的方式。”

“也许因为这是传达力量对比最直观易懂的方式。王室艺术从来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

在康翁波的最后一天，德农看见两名士官正用大锤砸开圣所内壁上的一块浮雕。那块石板上刻着外科手术器械，与布吕扬辨认过的相似。一个人就能扛走。

“住手。”德农说。

“我们有许可。拉谢兹上尉说可以。”

德农去找德塞。德塞传唤拉谢兹上尉。后者没有否认。他在底比斯、在丹德拉见过别的军官也这样做。他不知道这是禁止的。

“这些古迹属于委员会。没有我的书面命令，你们什么也不许碰。”

拉谢兹退下了。石板的底部已经断裂，大锤的几下敲击早已造成了破坏，无法再把它安回原处。德农用双手托住它，平放在地上。这并没有好多少，但总比任它摔落要好些。

晚上，他去找德塞。

“这种事常有吗？”

“比我知道的还要频繁。一个行军了两个月的士兵，看见一块块刻满难以理解的符号的石头，就拿他搬得动的。这是人之常情。我没法盯着每一座神庙。”

“那么，您无法监管的东西，和委员会正式收集的东西，二者的区别，您如何表述？”

“你们有表格。你们的专员有委任状。士兵们有袋子。这不是一回事。”

他看着德农。

“我知道这不够。您也知道。但我能给您的区分，就只有这个。”

他继续往前走，又最后一次停下。

“那边那座神庙。有一夜我独自走了进去。我在黑暗中望着那些柱子，足足二十分钟。我不知道自己领会了什么。但我不会忘记。晚安。”

次日清晨，德农回去查看那块断裂的石板。它在夜里不见了。有人——不是拉谢兹，这位受了处分的军官正受到监视——还是把它带走了。他向德塞写了一份书面陈述。德塞不予立案，不了了之。没有证人，没有姓名，没有证据。那块石板，此刻就在康翁波与阿斯旺之间某个人的行李里。

第二天，离康翁波一小时路程处，若卢瓦拨转马头，朝一座离大路五十米远就能望见的砂岩小礼拜堂而去。先头营经过时，它已被部分清出了沙子。

墙壁还立着。木头屋顶已经塌了。里面，三面墙上的壁画清晰可见。行进的队列，乘船的神明，象形文字的铭文分两层横排延伸。壁龛里原先供着小雕像，如今空空如也。地面上散落着釉砂碎片，那是原先的小像在被人从底座上硬扯下来时折断的残片。

后队营的士兵天亮时来过。若卢瓦从痕迹中推断出这一点：沙地上新鲜的靴印，被掏空的壁龛边缘，灰浆还泛着白。干得很快，毫不犹豫。这些人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他开始在笔记本里描述那些壁画。只有它们没有被动过，位置太高，不容易够到。随后有样东西吸引了他的注意。在上层横排，第三块嵌板的右侧，有一段世俗体的铭文，共四行。他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抄下来，精确得近乎偏执，在清晨的热气中花了四十五分钟。

这将是唯一存世的摹本。这座礼拜堂会在随后的几年里坍塌。他的摹本将留在档案中，等待一位读者。

若卢瓦重新上路，去追赶纵队。

过了康翁波，前往阿斯旺的行进几乎没有留出歇脚的时间。若卢瓦在马背上能画什么就画什么，速写着从大路上瞥见的神庙的轮廓。这些匆匆的草图带着实测图并不总具备的生动。某一特定时刻的光线，一座古迹与它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

“您画画像个行军的士兵，”一位年轻军官看着若卢瓦作画，说道，“不停歇。”

“埃及不等人。必须在它运动的时候抓住它。”

2月16日，远征军抵达阿斯旺。第一瀑布使南向的航行无法进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埃及天然的边界。德塞安营扎寨，让学者们自去勘察。

“请给我几天时间去菲莱。诺登 1737 年去过。画得不准确。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在阿斯旺，动身去菲莱之前，古董市场是若卢瓦出征以来见过的最为活跃的。军队即将北返的消息已传遍当地的各个村庄。卖家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他们天一亮就在营地周边摆开，带着袋子和小匣。这已不再是某一个中间人的隐秘买卖，而是一场热闹的交易，价格随买家和卖家而异。

若卢瓦观察了一个小时的交易。他看见一件件东西在人们手中传递：彩绘木质的沙布提俑，表现荷鲁斯、伊西斯、阿努比斯的釉砂小像，各种大小的圣甲虫，石质护身符，一块大概出自某口棺材的镀金亚麻硬壳残片，两尊带有古旧包浆的青铜小像，若干只方解石雪花石膏花瓶，其中一件还带着盖子。

价钱很高。比丹德拉或底比斯的都高。卖家们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法国人走后，就得等下一回有人经过。他们把这种稀缺折进了价钱里。

古董市场与任何市场遵循同样的规则：供给、需求，以及双方都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卖家想卖，买家想买。三千年的历史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伴着清点皮亚斯特的叮当声。

V - 菲莱

2月17日，德农和若卢瓦乘一艘三角帆船前往菲莱。穿越瀑布的航行十分凶险。暗礁露出水面，漩涡处处。努比亚的船夫熟悉每一条水道。小岛从汹涌的水流中浮现出

来。长四百米，宽一百五十米，几乎整个被托勒密时代的神庙占满。

“天哪，”德农低声说。

“这些浮雕是埃及仪式的一部视觉百科全书，”若卢瓦一边量完一间侧厅，一边说，“如果能把配套的文字释读出来，我们就会知道每一个动作、每一件供品的含义。”

“这座亭子是阴柔的，”德农指着岛屿尽头那座带柱的小亭说，“大神庙压得人透不过气，而这一座，却令人信服。”

图拉真亭——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亭上的浮雕表现的是这位罗马皇帝以法老的形象出现——是岛上最轻盈的建筑。十四根带花卉柱头的立柱，托着一道细砂岩的檐部。内部装饰表现的是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皇帝在主持传统的法老仪式，仿佛这些形式比所有沿用它们的人都更长久。石块的尺寸不大，几个人就能搬动。浮雕却非同寻常。

德农在亭前站了很久，思索着一件他始终没能说清的事。他可以让人拆下几块带装饰的石块。护卫就在这里，士兵们能搬，哈桑可以同船夫们谈妥运到阿斯旺的事。这是合法的。他有委员会的表格。这是办得到的。每块石头不过几百公斤重。

但他决定不这样做。

并非出于道德原则。有了自丹德拉以来所取走的一切，他已不再容许自己以这种美德自居。而是因为，他不愿意菲莱在他下次经过时变得和其他遗址一样。因为这种建筑上的轻盈，这种合乎人的尺度的优雅之中，有某种东西要求保持完整。因为一旦拿走它的石块，它就不再是它原来的样子——一座亭子，柱廊与天空之间的一场对话——而只是废墟中的一处废墟。

自离开开罗以来，这是他头一回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抉择，一一说出理由，一一权衡轻重。当晚他把此事写进了日记，恰恰因为这个决定在他看来非同寻常，值得记上一笔：“菲莱。小亭。决定不取。并非出于顾忌。只是不愿毁掉触动我的东西。”

菲莱周围的岩石上刻着古代朝圣者的铭文。姓名、日期、祷词。若卢瓦抄录了其中许多，并记下它们的位置和保存状况。其余的由德农抄录，连最难辨认的也不放过，连那些被尼罗河洪水冲蚀去一半的也不放过。

“这些涂鸦比神庙更让我动容，”若卢瓦向德农吐露心声，“他们是寻常的朝圣者。他们来向伊西斯祈祷，顺手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不是为了流传后世，只是想留下一道痕迹。”

“我们的笔记本就是我们的涂鸦。我们到过这里，我们见过这些。所不同的是，我们自诩在做科学。”

“难道我们做的不是科学吗？”

他沉思了片刻。

“是的。而我们同时也留下了另一种性质的痕迹。在空空的壁龛里，在骡背上的箱子里。这些痕迹，我们不会把它们登录在《埃及志》。”

2月25日，德农离开阿斯旺，由六十名骑兵护送。回开罗的路近九百公里，沿尼罗河顺流北下。哈桑随他同行，担任翻译。若卢瓦和德维利耶当天随另一支分遣队出发。回程走了十七天。队伍沿河北下，每日行进五十公里，途经村庄便停下来取水补给。天气炎热，阴凉处也近三十度。行军从黎明走到正午，随后在帐篷的遮蔽下歇息四个小时，再继续上路。

在一个没人知道名字的村庄附近，一名士兵在行军途中倒下了。中暑。人们把他抬到一棵棕榈树的阴影下。军医长让他喝水，又用尼罗河水浸湿他的头。一个小时后，那人恢复了知觉，却无法行走。他们把他搬上一头骡子。当夜他死了。天亮时，人们把他埋在离营地一百米的沙地里。没有十字架，没有墓碑。军士在连队的登记簿上记下了他的姓名和日期。

在康翁波与埃德福之间，两名士兵为一个在集市上买的釉砂小像大打出手。一个声称自己比对方先看到，另一个却是付过钱的人。他们在军士长的帐篷前扭打起来。军士长走出来，把两人拉开，没收了小像，放进自己的背囊。两人抗议。军士说，这东西现在归连队所有，谁再提起一次，就罚十天苦役。事情就这样平息了。

几天之后，队伍穿过一座废弃的村庄。三十间土坯房，全是空的。没有战斗的痕迹。居民在军队到来之前就已离开。一名中尉命人搜查各家各户。在三个不同的院子里找到了埋在地下的陶罐。谷物，椰枣，油。这些陶罐被充作征用物资。在第四间屋子里，人们发现了一处地下的藏物：六只釉砂圣甲虫，三只铜手镯，一面青铜镜。中尉把圣甲虫交给了上尉，自己留下手镯，镜子则给了发现藏物的士兵。

傍晚时分，队伍接近埃尔卡布隘口，一名骑兵从前卫飞驰而来。他在找德塞。人们把他带到队伍的最前面。他语速很快。德塞示意军官们走近。

“路上设了路障。有持械的费拉，大约二十人。他们堵住了隘口。”

“他们提了什么要求吗？”

“他们不会说法语。翻译官没能走近他们。他们还朝天开了几枪。”

德塞思索了几秒钟。

“从东边绕过去呢？”

“不可能。那一带地形根本无法通行，得多绕整整三天的路程。”

“好。强行通过。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德农，您留在队伍中间，跟着骡队。”

队伍重新开拔。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隘口。费拉们就在那里，拿着木棍、长矛和几支老旧的火绳枪。他们横在路上，一动不动。

德塞命骑兵缓步前进。费拉们纹丝不动。在五十米处，德塞举起手。骑兵停了下来。他示意哈桑走上前。

“告诉他们，我们只想通过。我们什么也不碰。在他们的村子里，我们什么也不征用。”

哈桑徒步向前，独自一人，双手摊开在身前。他用阿拉伯语说话。其中一个费拉作了回答。哈桑回来了。

“他们说，两个星期前军队拿走了他们所有的粮食。他们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要我们还粮，要不就付钱。”

“我们两个星期前什么也没拿过。那不是我们干的。”

“他们说那是法国士兵。他们分不清各支分遣队。”

德塞沉默了片刻。随后他从马鞍上取下一只钱袋，抛给哈桑。

“三十五个皮亚斯特。告诉他们，这是我身上的全部。他们若还想要更多，也得先让我们过去。”

哈桑拿着钱袋回去了。他对同一个人说话。那人接过钱袋，掂了掂分量，与另外两人商量了一阵。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从路中央退到一旁。队伍通过了。费拉们默默地看着士兵一队队走过。最后一辆大车驶过之后，他们便回村子去了。

到了底比斯，队伍停下休整两天。德塞想让士兵们在最后一程赶往开罗之前歇一歇。营地扎在离卡尔纳克一公里处。士兵们睡在神庙的阴影下。有的爬上屋顶眺望尼罗河，另一些则待在帐篷里，累得不想动弹。

抵达当晚，营地里发生了一起事端。第二连的一名士兵在分发时偷了另一名士兵的面包口粮。失主发觉后追上小偷，一拳打掉了他两颗牙。小偷还手，拔出了刀。四名士兵把两人拉开。军士赶到，命人将两人铐起来关一夜。次日清晨，他们由上尉审判。小偷挨了二十棍。失主免于处分。

第二天晚上，德塞召集军官们到他的帐篷里。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开罗的信。消息不妙。土耳其军队正在叙利亚集结。波拿巴刚刚率领大部分军队离开开罗，开赴叙利亚。德塞须尽快把他的师带回开罗。

“过了底比斯不再停留，”德塞说，“一路走到开罗。最多十天。”

“那丹德拉呢？”一名中尉问，“学者们原本想回去的。”

“没有时间。路过它，也不停。”

在场的德农插话了。

“我需要在阿比多斯停一下。六个小时。为了阿比多斯神庙。”

“不可能。”

“六个小时。我只要求这么多。”

德塞看着他。

“在阿比多斯六个小时。多一个钟头也不行。您若是正午还没回来，我们就不等您了。”

队伍抵达阿比多斯时，德农下了马，带着哈桑和两名护卫士兵走进神庙。他径直走向主廊道尽头那间半埋在沙

中的厅室。西墙上满是成排的王名圈。几十个国王的名字，一行行按序排列。

他在墙前站了两个小时，望着那些他读不懂的铭文。哈桑坐在门口附近的地上。两名士兵在外面等候。

一个男人走进厅里，四十岁上下的费拉，白头巾，皮凉鞋，拿着一个粗布包裹。他走近德农，在他面前把布展开。那是一块边长四十厘米的石灰岩残片，上面有三个完整的王名圈。

那人指着残片。举起五根手指。

“五个皮亚斯特。”

他望向身后的墙。第十七行有一个新鲜的缺口，恰在这三个王名圈原先所在之处。石灰岩的边缘泛着白，是刚切下来的。那人是在夜里或清晨切下这块东西的。

德农从钱袋里取出五个皮亚斯特，递给他。残片进了他的皮挎包。那人收下钱，一言不发地走了。

他又在厅里待了两个小时，站在墙前。十一点半，一名士兵跑了进来。

“先生，将军已下令备马。”

他走出神庙。队伍已经列成行军队形。他上了马，策马疾驰回到队首。德塞看着他从身边经过，没有作任何评论。队伍启程了。

回开罗的路还要走八天。队伍遇到三支向南开进的分遣队。各种消息四处流传。波拿巴去了叙利亚，土耳其军队正在推进，英国人封锁了所有的港口。没有人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

三月中旬，队伍抵达开罗，士兵们被安置在城堡的营房里。德农径直前往哈桑·卡希夫宫的北侧附属建筑，委员会的行李存放在那里。

仓库锁着门。他等了一个小时，一名总管才拿着钥匙赶来。德农走了进去。他的十二只箱子都在，沿南墙排成一行，上面是他亲手写的标签。他打开第一只，匆匆查看了里面的东西，又合上。一切完好。他走出仓库，前往宫中。

迪加将军在波拿巴缺席期间统率开罗，当即接见了德农。他站在一张铺满叙利亚地图的桌旁，示意德农坐下。

“您在上埃及的行动结束了？”

“是的。从丹德拉到阿斯旺。所有主要的古迹。”

“这些图可以用于《埃及志》吗？”

“可以。五十三张图页。神庙，陵墓，巨像，浅浮雕。”

“好。仔细听我说。总司令已前去阻击土耳其军队，不让他们打到这里来。他的命令不变：您留在开罗。您与蒙日和贝托莱一起协调研究院的工作。三角洲的考察继续。萨卡拉的发掘继续。《埃及志》的编纂继续。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如果英国人趁他不在时登陆，您就把藏品撤往南方。德塞知道把它们藏在哪里。除了这些，其余的您都可以舍弃。清楚了吗？”

“清楚。”

“很好。现在出去吧。我还有事要做。”

迪加回到他的地图前。德农走出了办公室。

波拿巴一个月前已率一万三千人离开开罗，开赴叙利亚。德农留在开罗，和蒙日、贝托莱、傅里叶，以及没有随军出征的三十来位学者在一起。

波拿巴不在的日子里，德农组织研究院的工作。蒙日负责监督孟菲斯地区的考察。贝托莱主持萨卡拉的发掘。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继续在三角洲从事他的动物学研究。傅里叶则负责与各省分部的通信。

五月，德农召集了一次会议。所有在开罗的成员悉数到场。三十位学者和工程师挤在大厅里。他在十点钟宣布开会。

“诸位先生，波拿巴去叙利亚已经一个月了。我们没有确切的消息。英国人仍然控制着地中海。我建议我们准备一份运输方案，以备出现机会。”

蒙日举起了手。

“应当等波拿巴回来再说。这件事要由他来决定。”

“要是他不回来呢？”傅里叶说道。

无人作答。最后是贝托莱开了口。

“德农说得对。我们准备一个方案。这样，哪天有了船，我们就有备无患。”

提议获得通过。会议于正午散会。

波拿巴在六月回来了。他出发时带着一万三千人，带回来的不到一万。死者、病号、鼠疫患者。攻势失败了。

回来几天之后，波拿巴召德农去宫中。他瘦了。军服在肩上晃荡。他把德农领进办公室，没有一句问候。

“研究院的工作一直在继续吗？”

“是的。一切顺利。”

“很好。继续。英国人仍然封锁着海岸。局势没变之前，不得运输。”

“明白。”

波拿巴挥了挥手。会见结束了。德农走了出去。

接下来的几周很平静。考察继续。发掘也继续。《埃及志》的编纂缓慢地推进。开罗在等待，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VI - 罗塞塔石碑

1799 年 7 月 15 日，一名叫布沙尔的工兵中尉在罗塞塔附近监督土方工程。他的镐头碰到了什么东西。

布沙尔二十八岁，出身综合理工学院。他立刻明白自己发现了什么。那是一块黑色花岗闪长岩石碑，高一百一十二厘米，上面刻着三种并列的铭文。他命人把石碑运到自己的住处，并立即向开罗的埃及研究院发出一封急信。

他的住所远离军事工地。石碑放在那里是安全的。

让-约瑟夫·马塞尔和雷米·雷热被派往罗塞塔。马塞尔是东方学家，专攻闪米特语言。雷热是希腊学家，能流利地阅读古希腊文。7 月 24 日，他们从各个角度审视了这块石碑。

希腊文位于石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相对完好。雷热高声朗读，马塞尔则在一旁做着笔记。

“这是一道褒扬年轻的托勒密五世的法令。免除神庙的赋税，向祭司阶层捐赠。这类东西总要用三种文字刻出来，以确保人人皆知。”

马塞尔把一张极薄的纸打湿，用一团蘸了稀释墨汁的棉球，将它轻轻按压在刻字的表面上。结果是：每一个符号都得到一份精确的拓印，黑底白字。整块碑面拓完需要好几个小时。

马塞尔和雷热的报告于 7 月 29 日送达研究院。确认这确是同一篇文字的三种文本，其中一种还能读懂，研究院顿时一片兴奋，德农自一年前抵达亚历山大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倘若这块石碑能让象形文字得到破译，三千年的历史就将重新变得可读。王朝，战役，诸

神，姓名。两个世纪以来旅行者们抄录却不解其意的一切。

“我们或许正站在一场科学革命的黎明，”德农对紧急召集的研究院说。

蒙日提议向罗塞塔派出一支远征队。

“石膏模型，纸上拓片。趁还没有人损坏它或把它搬走。”

马塞尔和雷热制作最初几份拓片时，若马尔在场。

罗塞塔石碑高一百一十二厘米，宽七十六厘米，厚二十八厘米。重量是根据体积和花岗闪长岩的已知密度估算的，约七百六十公斤。他亲自量了这些尺寸，并非因为它们马上就有用处，而是因为测量是他与这件物品建立联系的方式。

石碑并不完整。上部缺失，在某个不确定的年代被人带走了。顶部的象形文字因此是残缺的。埃及文大约有三分之一已经佚失。这一缺口会给日后的破译者增添困难。但希腊文部分几乎完好无损。这足以着手工作了。

“下面的希腊文，我们马上就能读，”马塞尔说，“这是孟菲斯祭司会议颁布的一道法令，时在托勒密五世埃庇法尼斯在位第九年。公元前196年。”

“那象形文字呢？”若马尔问道。

“多半是同一篇文字。我们也是这么期望的。”

“若真是如此，”若马尔说，“我们就可以着手建立对应关系了。每个希腊词都有它的象形对应物。比较符号组的长度，找出其中的重复……”

“我们要做的正是这件事。不过这项工作要花上好几年。”

若马尔拿起铅笔，在笔记本上开始记录象形文字带中某些符号组出现的频率。每一个符号都要找出来，数清楚，列入表中。分布并非随机的。

“您看。这一组符号被圈在王名圈里，在象形文字保存下来的部分中出现了六次。希腊文里托勒密这个词出现了十一次，而埃及文的一部分已经缺失了。”

马塞尔停下手头的工作，看了过去。

“有可能。甚至很可能。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对应未必是直接的。象形文字多半不是字母文字。”

“是的。但这是一个起点。”

他还无从知道，这条路将通向何方。

若马尔帮马塞尔把最后一张拓印纸绷在世俗体部分上。夜已深了。油灯冒着黑烟。屋外，罗塞塔的港口沉睡着。此后的一周里，若马尔在罗塞塔又来看了那块石头三次。第一次，他带来了皮尺，把凡是能量的都量了一遍。第二次，他带来了记录频率的笔记本，数着象形文字带中的符号组，制作了一张分布表。第三次，他什么也没带。他在石头对面的一只凳子上坐下。花岗闪长岩冰冷而黯淡。没有光泽，没有色彩。一块灰扑扑的石板，按通常的说法，是丑的。他把双手平放在膝上，强迫自己不去计算。只是看。表面上，某些字母里还能看到凿子的痕迹。曾经有人把这些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刻出来，一刻就是好几个小时。那份劳作就在那里。它持续着。就像人望着一张地图，依旧不懂上面的文字，却看得出道路已被标绘其上。

他坐在那里，看出这块石头与他们一年多来收集或试图收集的所有其他物品根本不同。沙布提俑，圣甲虫，纸草，浅浮雕的残块。这些物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物质性和来源。人们拿走它们，因为它们美丽、稀有、古老。罗塞塔石碑没有审美价值。它的价值全在于它所意味的东西：三种书写系统之间的一种对应，其中一种可以读

懂，另外两种则依然读不懂。它不是一件物品。它是一种方法。而作为方法，它是可以复制的。对任何从事破译的人来说，一份罗塞塔石碑的拓片在科学上等同于罗塞塔石碑本身。

这与远征中所有其他物品恰恰相反。一尊沙布提俑一旦离开它的陵墓，便失去了与语境的联系。而罗塞塔石碑，从一条防御壕沟里出土，却什么也没有失去。它两千年前就已脱离了语境。它所承载的东西，与它身在何处无关。

“您还在这儿，”马塞尔走进来说，“这是本周第三次了。”

“我在思考。这块石头是我一年来所见一切之中的例外。被带走的东西总会失去些什么。而这一块不会失去任何东西。因为它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马塞尔在他身旁坐下。

“除了被英国人拿走。”

“是的。除了这个。但若英国人拿走了它，拓片还在。信息还在。这是整个远征中唯一一件真正无法被偷走的东西。”

马塞尔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没有告诉任何人。

除了在罗塞塔制作的官方拓片之外，他又额外制作了三十份，不是为了研究院，也不是为了《埃及志》，而是为了分发出去。他把其中五份寄给了欧洲的通信者：一份寄往伦敦，两份寄往巴黎，一份寄往柏林，一份寄往哥本哈根。五位研究古代语言的学者，也许能从中认出些什么。

另外二十五份他留作储备。倘若英国人拿走石碑，倘若破译要在伦敦完成，这些拓片也能让法国人同时开展工作。竞赛将势均力敌。

“您在打开锁之前，先把钥匙分发了出去，”德农得知此事后说。

“我分发的是钥匙的复制品。锁还留在这里。就算英国人拿走了锁，我们手里仍有复制的钥匙。”

这一发现的消息促成了研究院在8月2日召开的一次非常会议。所有在开罗的成员都赶来了。蒙日主持。德农展示了马塞尔的拓片和雷热关于希腊文的技术报告。

大厅里坐满了人。三十来位学者、工程师、博物学家。有些人已有数月没来参加过会议。罗塞塔石碑让他们离开了实验室，离开了工地，离开了在三角洲的考察任务。报告结束后，贝托莱发了言。

“如果这块石头能使破译成为可能，我们就能读到三千年的档案。王表、战争的记述、宗教的典籍。我们一年多来所描绘的所有古迹上刻着的一切，都将变得可读。”

从不参与语文学争论的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举起了手。

“要花多长时间才能破译出来？”

马塞尔从大厅后排回答。

“好几年。也许十年。也许二十年。象形文字不是字母文字。它不是简单的逐字母替换。”

“但这是做得到的，”若马尔说，“我们有了对应关系。其余的就是工作了。”

一位工程兵工程师沙布罗尔请求发言。

“一个实际的问题。如果英国人登陆，这块石头会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他们知道它的价值。我们有对策吗？”

大厅里安静了下来。还没有人把这个问题提得如此直截了当。

蒙日看着德农。

“拓片是可以带着走的，”德农说，“马塞尔已经向欧洲寄出了五份。我们这里还有二十五份备用。如果英国人拿走石碑，破译就会在巴黎凭这些拓本来进行。”

“要是连拓片也丢了呢？”

“那我们就输了。”

这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但这是唯一可能的回答。军事局势不在他们掌控之中。他们所能掌控的，只有自己在科学上的决定。

蒙日起草了一份正式决议：罗塞塔石碑应尽快运往开罗，保存在研究院并受到长期看守，按需要随时拓印复制，并由马塞尔和雷热优先研究。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散会之后，德农留了下来。他正帮着收拾椅子，傅里叶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

“您看到波拿巴的最新急报了吗？”

“没有。”

“情形不妙。波拿巴从叙利亚回来，带着一支疲惫不堪的军队。亚历山大的克莱贝尔已经要求增援好几个星期了。回音迟迟不来。”

他放下手里的椅子。

“而我们，就在军队从一场惨败的叙利亚战役中归来的时候，发现了象形文字的钥匙。”

“正是如此。远征正在崩塌，而我们在做科学。”

这话说得并无苦涩，只是陈述事实。军事远征正在走向失败。科学远征刚刚打出了最惊人的一击。两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在同一个统帅之下。

德农回到拓片前。他把它们铺在研究院的大桌子上。三条文字带：上为象形文字，中为世俗体，下为希腊文。他用手指沿着象形符号的那一行划过。鸟、蛇、眼睛、

手。这些形状他在丹德拉、底比斯、菲莱已经抄过上百遍。这些符号向来是沉默的。如今它们要开口说话了。

他想到了波拿巴。6月从叙利亚回来，7月25日在阿布基尔获胜，正秘密筹划返回法国，却不知道他的工程师们刚刚找到了两千年来无人找到的东西。

8月5日，若马尔整天都在与拓片为伴。他带来了在丹德拉和卡尔纳克做的勘测笔记本。每一页上都是他前几个月画下的王名圈的摹本。一个个椭圆形，里面是成组的象形符号。他一直假定这些王名圈里写的是名字。这是十八世纪以来旅行者们的共同假设。

现在，有了罗塞塔石碑，他可以检验这个假设了。

希腊文中十一次提到托勒密这个名字。若马尔数了象形文字带中的王名圈。他只找到六个，但这一条文字带已经残损。他在笔记本中记下了这一对应：“假设：王名圈等于专有名词。若得证实，则埃及各处古迹上的所有王名圈所载皆为法老或神祇之名。”

这是一个小小的进展。但毕竟是进展。一年前，王名圈还是神秘的形状。如今，它们有了已被辨认出的功能。

考察仍在继续。

罗塞塔石碑是一项发现。它并没有使其余的一切停下。

8月10日，一名军官来到研究院，宣布7月25日阿布基尔战役的正式战果。波拿巴在阿布基尔海滩上击溃了奥斯曼人的登陆部队。一万名耶尼切里被杀或溺亡，其余被俘。叙利亚战役失败之后，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胜利。东方军团守住了埃及。但人人都知道，叙利亚战役是一场灾难，而阿布基尔无论多么辉煌，也改变不了这支军队根本上的孤立处境。

德农是听克莱贝尔说起这个消息的，当时后者途经开罗，正要回亚历山大就任指挥之职。

“波拿巴要回来了？”

“是的。几个星期之内。也许更快。他没有发来明确的消息。但军队在后撤。这一点是确定的。”

“然后呢？”

“然后再看。要么他巩固埃及。要么他回法国去。”

克莱贝尔没有说出第三种可能，但那是显而易见的：要么他继续在无谓的战役中损兵折将，直到东方军团什么也不剩。

克莱贝尔看着摊在研究院桌子上的拓片。

“这就是你们的那块石头？”

“就是它。”

“它写的是什么呢？”

“一道关于神庙赋税的法令。与军事无关。”

克莱贝尔笑了。

“你们靠一篇讲赋税的文字，找到了古埃及的钥匙。我喜欢这个。”

他当晚便动身回亚历山大。德农再也没有见过他。

8月12日，罗塞塔传来消息：石碑已准备好运输。布沙尔监督造了一只加固的木箱。军事车队已安排妥当。预定14日出发。

德农给布沙尔写了一张便条：“尽可能走水路。避免道路的颠簸。若必须陆运，须最大限度减震。石碑不得有丝毫裂缝。”

布沙尔次日回复：“水路不可行。所有的船只都被征用来运送阿布基尔的伤员。陆运，箱底加垫稻草。路程三天。预计8月17日抵达。”

8月17日晚，车队驶入研究院的院子。十五名护送士兵，三辆大车。石碑在第二辆车上，裹着帆布，缚在一层稻草上。

德农、马塞尔、若马尔和六名士兵把它卸了下来。七百六十公斤。要用撬棍、绳索，还有一道临时搭的斜坡。整个过程花了一个小时。最后，石碑安放在研究院主厅东墙边的一个木座上。

马塞尔揭去帆布。黑色的花岗闪长岩显露出来，三条刻着文字的带子清晰可见。

“没有一道裂缝，”若马尔一边检查表面一边说。

人们把它安置在一盏长明的油灯下。两名卫兵日夜站岗。没有书面命令。人人都明白：这块石头不能消失。

次日清晨，德农又来看这块石头。他独自一人。研究院还在沉睡。灯在花岗闪长岩上投下昏黄的光。象形文字在凹槽里投下细小的阴影。

他把手放在冰凉的石面上。这个动作毫无用处。但他还是做了。触摸这块石头，就是触摸古埃及重新变得可以接近的那一刻。

总有一天，会有人像读希腊文那样读懂这篇文字。王朝将从沉默中走出。法老们将重新找回声音。

他收回了手。

VII - 谈判、胜利与克莱贝尔之死

8月18日晚上，德农偶然看见波拿巴独自穿过研究院的院子。没有副官，没有护卫。他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是一本书，不是地图。他走得很快，像是不愿被人看见的人。德农从一扇门的门框后面观察他。那个匆忙的身影中有某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一种近似逃跑的急迫。不是躲避危险的逃跑。而是逃离一种已经变得太过狭小的处境。埃及曾是他的宝匣。如今宝匣成了牢笼。

他在院子的拐角处转弯，消失了。

德农想到了波拿巴手中的那本书。想必与罗马有关，或者与亚历山大有关。一个出走的人带走的，总是那几样读物。

一个小时后，一名副官来找德农。波拿巴下午看过他的图稿，想带他一起走。德农把图稿卷进四只铜管，将自己箱子的钥匙交给若马尔，与蒙日和贝托莱一同坐进了四轮马车。那一夜，有几个人看见他们离去。另一些人听见马蹄声向北远去。

次日清晨，消息得到了证实。波拿巴已动身回法国。他派人给克莱贝尔送去一封信，把埃及军团的指挥权移交给他。蒙日、贝托莱和德农随他一同走了。他们将在8月22日至23日的夜里于亚历山大登上两艘护卫舰中的一艘，德农将于10月9日带着他的图稿在弗雷瑞斯登陆。几乎没有人事先得到通知。

那天早晨，若马尔最先想到的不是波拿巴，也不是法国。而是那些箱子。存放在哈桑·卡希夫宫附属建筑里的九十六只箱子。七十三只是官方登记的，二十三只没有标签，放在西北角，仍在那里，仍然没有名目。没有波拿巴下令军事运输，这些箱子便任凭日后任何一场军事谈判摆布。

他在日出之前把附属建筑巡视了一遍。箱子都在，堆叠着，钉好了，按他的体系贴了标签。一个字母，一个编号，一份简要的内容说明。

这些物品来自各处：萨卡拉，卡尔纳克，丹德拉，国王谷，孟菲斯的集市，塔尼斯的发掘。有些是依照既定程序取得的。另一些是在随军而行的集市上买来的。还有一些经由记录较少的途径而来。合在一起，它们代表着十三个月有组织的掠夺、偶然的掠夺、被容忍的掠夺以及科学的采集，而这几类事，从来没有人正式厘清过。

波拿巴走了，这些区分连在政治上也站不住脚了。随他一同烟消云散的，是该项国家计划所赋予的正当性，正是它让攫取显得合法。剩下的只是一些物品、一些士兵、一些学者。还有迟早要逼近的英国人。

他收好清单，在一只箱子上坐下。他周围，在半明半暗之中，是九十六只箱子。这一切都想回到法国。而眼下，什么也去不了任何地方。

克莱贝尔如今统率埃及军团。波拿巴出发之前，并不认为有必要和他谈一谈。

马塞尔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他有他的拓片，波拿巴在不在，丝毫改变不了什么。若卢瓦问傅里叶，委员会的工作是否继续。傅里叶说继续。若卢瓦便回到他的笔记本前。消息传来时，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从解剖台上抬起眼，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这不是冷漠，而是一种专注：在这样的人眼中，案头那件东西胜过其余的一切。

“波拿巴利用了我们，”若卢瓦说，“我们的图稿为他的征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如今他得到了想要的，便抽身而去。留下来的，是我们。”

波拿巴离去的消息公布三天后，傅里叶在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找到了独自一人的若卢瓦。

“您在工作吗？”

“没有。”

“他本可以先知会我们一声，”若卢瓦说，“我在巴黎有一家老小。我答应过他们只去几个月。如今已经十三个月了。而他，倒是回去了。”

他没有把话说完。这不是嫉妒。事情更简单，也更痛苦：他曾信奉过某种东西——科学服务于共和国，共和国服务于科学。波拿巴只是把这些当作布景。如今布景撤走了。

当晚，科学与艺术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无人召集。学者们仿佛出于某种集体的本能，不约而同地聚到了研究院。到场的有傅里叶、马塞尔、若马尔、若卢瓦、若弗鲁瓦·圣伊莱尔，以及其他十来入。孔泰最后一个到。

处境不难表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波拿巴走了，克莱贝尔掌权。

克莱贝尔与委员会的关系，和前任不同。两天前，若马尔曾请求接见，商谈藏品的地位问题。克莱贝尔说他会研究一下。

“说研究，就是根本没放在心上。”若马尔说。

“克莱贝尔要维持一支军队，要提防奥斯曼人，还有地中海上的英国人，”傅里叶说，“藏品不是他最要紧的事。”

“那就该成为我们最要紧的事，”若马尔答道，“我们若不决定它们的命运，别人就会替我们决定。”

桌上摆着九十六只箱子的总清单，是若马尔传阅下去的。众人默默地读着。神庙的名称，器物的类别，重量的估算。委员会第一次在同一份文件里，看到了自己所收集的全部。

没有人说出所有人心里想的：这份清单，既像一份科学目录，也像一份劫掠的账目。

“我们必须确定运输的先后次序，”若马尔说，“一旦撤离，不可能全部带走。得有个轻重缓急。”

“纸莎草文献和抄录的铭文，”马塞尔说，“无可替代。”

傅里叶迟疑了一下，才提出那个问题。

“那么，仓库西北角那二十三只没有标签的箱子呢？”

若马尔和马塞尔对视了一眼。

“我记下了它们，”若马尔说，“但我不知道它们归谁。”

“我也不知道。”马塞尔说。

会议结束了，这一点上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决定。学者们回去继续各自的工作。清单留在桌上。那二十三只无名的箱子仍留在仓库西北角的黑暗里，等着有人来决定它们究竟是什么。

克莱贝尔称他的前任为“卑鄙的阴谋家”和“怯懦的逃兵”。

军事局势已难以为继。法军控制着埃及，却与法国断了一切联系。英国舰队封锁了地中海。克莱贝尔明白，他既无法无限期地坚守，也无从指望援兵。他作出了波拿巴不敢作出的决定：谈判撤军。1799年12月，克莱贝尔派出一名使者，前往驻扎在叙利亚的奥斯曼大维齐尔处。谈判在英国旗舰“老虎号”上开始，地点在达米埃塔附近海域。英方谈判者是海军准将西德尼·史密斯，他自称是王室全权代表，这一职权不久便将遭到基思海军上将的否认。法方全权代表是德塞将军和行政官普塞尔格。法方的条件很明确：军队携带武器辎重，体面撤离。史密斯同意先处理紧迫事项：撤出伤员和学者，并在奥斯曼全权代表到来之前休战。谈判拖延不决。克莱贝尔催促

他的谈判代表尽快达成协议。然而1800年1月24日，《阿里什协定》终于签署。协定规定，法军须在三个月内全部撤离埃及，可携带武器、辎重和科学藏品。法军将逐步放弃阵地，自三角洲以东开始，至亚历山大结束。开罗至迟须在第四十五天撤空。消息于1月28日传到开罗。当天，协定正式颁布。对学者们的影响立竿见影。

“诸位先生，”克莱贝尔在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说，“我已与奥斯曼人谈妥了我们的归程。三个月后，我们就会回到法国。拥抱你们的藏品吧，你们得把它们分拣出来了。”

若卢瓦一连数日都在分拣、包装。青铜雕像，彩绘木质和釉砂的小像，护身符，纸莎草文献，钱币，珠宝。每一件都编了目，作了描述，用亚麻布裹好。他干得很快，因为知道时间有限。二十个月来，回乡第一次变得真实。箱子从库房里搬了出来。标签也写好了。罗塞塔石碑用好几层帆布包了起来。傅里叶一直密切关注着谈判，他带着协定文本回到开罗，在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高声宣读。读到保障藏品的条款时，一阵如释重负的低语传遍了会场。

“这就是说，罗塞塔石碑、纸莎草文献、拓片，我们收集的一切，都能随我们回到法国？”马塞尔问。

“协定是这样保证的，”傅里叶说，“当然，这得先假定英国人接受协定的条款。”

傅里叶已编出一份完整的清单：登记在册的器物共二百一十七件，其中一百三十八件具有直接的博物馆价值，七十九件具有科学文献价值。他按轻重缓急作了排序，因为他知道，若运力有限，就必须取舍。第一优先：若马尔的测绘图稿，无可替代，至多二百公斤，装入防水箱。若卢瓦的笔记本，装在铜管里，另加五十公斤。第

二优先：小件器物——沙布提俑、圣甲虫、护身符、纸莎草文献。体积轻，单位重量的价值高。第三优先：马塞尔的拓片。第四优先：若弗鲁瓦的博物学藏品，笨重，易碎，占地方。第五优先：研究院的大件，花岗岩雕像，中等大小的石棺。

希望只维持了五个星期。1800年3月，消息传来。英国人拒绝批准协定。英国地中海舰队司令乔治·基思·埃尔芬斯通海军上将宣称，西德尼·史密斯越权行事，协定无效。基思要求无条件投降。法军必须放下武器，成为战俘。克莱贝尔召集众将。他高声宣读了基思的信，然后把它放在桌上。

“诸位先生，对这样的狂妄，只能用胜利来回答。准备战斗吧。”

行李又拆开了。箱子重新搬回研究院的库房。有三十三只下落不明，在前几个月的混乱中遗失或毁坏了；剩下六十三只。标签仍贴在上面。这些东西不走了。暂时不走。要等到下一次启程的机会，或者等到那场把它们送给英国人的投降。英国人和奥斯曼人都认为东方军团太弱，无力抵抗。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统率一支军队向开罗进发，据估计兵力在四万到八万之间。在开罗城内，居民应他的号召起事了。

纳西夫帕夏率奥斯曼先头部队，带着五六千名耶尼切里和数千骑兵占领了马塔里耶村，并以十六门火炮加固阵地。克莱贝尔只有一万人。1800年3月19日至20日夜间，他让部队渡过尼罗河，在河的右岸布阵，小小军队的四个旅各自结成方阵。3月20日拂晓，法军在赫利奥波利斯废墟附近发起进攻，那里距开罗约十五公里。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天。法军方阵顶住了一切冲锋。法军炮火击溃

了奥斯曼的阵线。傍晚时分，奥斯曼军队土崩瓦解。大维齐尔带着残部逃往叙利亚。法军死伤八百人。奥斯曼人在战场上留下了九千具尸体。克莱贝尔回到开罗，镇压了叛乱。炮击持续了数日。数以百计的平民死于战斗。4月21日，该城投降。赫利奥波利斯的胜利巩固了法国人在埃及的地位。穆拉德贝伊麾下的马穆鲁克一直按兵不动，驻扎在沙漠中，未曾参战；4月，穆拉德贝伊与克莱贝尔签订协议，成了某种意义上的上埃及总督。埃及看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牢固地掌握在法国人手中。克莱贝尔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学者们重新开始工作。藏品仍留在库房里。谁也不知道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

“趁着还能工作，我们就多做些，”傅里叶在随后的每周例会上说，“我们在这里完成的一切，是无法抹去的。”

克莱贝尔曾与奥斯曼人谈判，试图让军队回国，失败了，又重新开战。学者们很少见到他。他偶尔来研究院，听听汇报，便回他的司令部去了。

军事局势稳定了下来，却并未好转。军队守住了埃及，却既不能前进，也无法离开。英国人封锁着地中海。法国远在天边。这场远征，已变成了一支驻军。

1800年6月14日清晨，克莱贝尔检阅了希腊军团，随后来到开罗，察看总部宫殿的工程。在去视察之前，他出席了总参谋长、他的挚友达马将军家的午宴。研究院的成员和军官们都应邀赴宴。克莱贝尔比往常更为欢快。他的努力有了成效，法国人的各项机构蒸蒸日上，居民对他表达着爱戴，这一切驱散了他平日的冷淡。他兴致勃勃，和蔼可亲，谈笑风生。在场的人，没有一个预感到，这场欢快的午宴竟是一席诀别的宴会。

下午两点，将军只由军队建筑师普罗坦陪同，前往他的宫殿。要到那里，他沿着一条长廊走去，廊上浓密的葡

萄藤投下荫凉，长廊连接着总参谋长的住所和总司令的住所。他同普罗坦谈论着自己计划的美化工程，并下达命令，要修整总部和花园，抹去上一次暴乱留下的弹痕。一个名叫苏莱曼·哈莱比的年轻叙利亚人，从早晨起就藏在宫殿的花园里。他二十四岁，在爱资哈尔清真寺研习神学，已经观察克莱贝尔的宫殿一个月了。他在吉萨弄到了一把匕首。那天早晨，他扮作乞丐，藏在一口废弃的蓄水池旁。

克莱贝尔和普罗坦走进长廊时，苏莱曼从藏身处钻出来，从背后走近，将匕首刺进了将军的心脏。

克莱贝尔倒下了，喊道：“救命，我被人暗杀了！”

普罗坦举着手里的小手杖扑向刺客。他试图挡开刺击，自己身中六刀。苏莱曼任他昏死过去，转身回到已倒在地上的克莱贝尔身边，又刺了三下。第一刀便已致命。将军几分钟后死去，没能说出一句话。

警报传开了。卫兵，军官，几个小时前还与克莱贝尔一同为共和国举杯的那些人，都围拢在他身边，想从他口中听到只言片语。他们徒劳地询问着他。人们把遗体抬进总参谋长的住所。

士兵们在宫殿和花园里四处搜查。两名卫队骑兵带来一个年轻人，他们撞见他藏在一丛茂密的仙人掌下。普罗坦不顾伤势，已经苏醒，认出了刺客。苏莱曼被投入监狱，同时入狱的还有大清真寺的三位乌里玛，他们事先知道他的计划，却没有告发这次行刺。

全军陷入深深的惊愕，很快又转为炽烈的复仇渴望。全城骚动。店铺关了门。法国士兵怒不可遏，失魂落魄，在街上游走，向四周投去威胁的目光。那一夜很难熬。

次日清晨，消息传到研究院。傅里叶立即召集会议。十六位学者在厅中聚齐，默然无语。这种沉默，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哀悼。它是一种认识：在他们的军事处境中，有些东西已经改变，而容忍他们留在埃及的那个人，已不在了。

傅里叶开门见山地说了起来。

“克莱贝尔死了。梅努将军接任指挥。我们并不了解他。克莱贝尔懂得波拿巴关于科学工作之重要性的命令。梅努与我们没有这层关系。”

若马尔补充道：

“我们的藏品已入库，我们的测绘图稿已归档。若梅努决定让它们留在埃及，或认为它们已不再具有军事意义，我们就白白损失了两年的心血。”

马塞尔缓缓开了口：

“记录工作已近完成。如今要紧的，是把一切带回法国。要是这些东西在此地散失，被拿到市场上转卖，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毫无意义了。”

傅里叶站了起来。

“我们继续。能做完的，我们都做完。”

学者们回到各自的工作中，不知道梅努将作出怎样的决定。

苏莱曼·哈莱比在酷刑下受审。他供认，自己受到了奥斯曼军队耶尼切里长官的怂恿。他曾把自己的计划告诉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四位乌里玛，他们劝阻过他，却没有告发。军事法庭判处他们全体有罪。苏莱曼的右手被火烧灼，随后被活活穿刺而死。他痛苦了四个小时才断气。三位乌里玛被斩首。第四位被缺席判决。

葬礼很快举行。傅里叶代表研究院，为这位受人哀悼的英雄致悼词。

士兵们争相抛掷柏枝与桂冠编成的花圈。公开的葬礼结束后，一小群人，大多是军官，悄悄聚集在亡者的墓旁。他们是共济会军事分会“挚友联盟”的成员。委员会的一位学者也加入了他们。他虽不是军官，同样是共济会员，隶属于巴黎的“完美联合”分会。他是在场唯一的平民。蒙日本可以在场，但他已随波拿巴逃走了。他们取出围裙，翻到专用于丧礼的黑色一面。他们拍手三下，念出仪式的套语：“悲叹吧！悲叹吧！悲叹吧！”紧接着便是传统的欢呼击掌，“但要怀抱希望！怀抱希望！怀抱希望！”一枝金合欢被放在墓上。他们的兄弟已归入了永恒东方。

副司令雅克-弗朗索瓦·梅努将军，以会长的身份主持了这场共济会仪式。他正式接掌了埃及军团的指挥权。

梅努皈依了伊斯兰教，取名阿卜杜拉，并娶了一位名叫佐贝伊达的埃及女子。军官们对他的敬重不及克莱贝尔。学者们并不了解他。他们很快就会了解。

第三章：学者的时代

I - 最后的几场战役

指挥权的更迭，丝毫没有改变研究院的工作。

考古勘察在整个三角洲和下埃及继续进行。藏品更加丰富，也整理得更有条理。发表在《埃及旬刊》上的科学论文仍按期刊出。

梅努将军的性情与前任截然不同。他自称以法阿联盟的名义治理埃及，而这种联盟在政治上并无任何现实基础。军官们追随他，出于纪律，而非信服。

对学者们来说，梅努比克莱贝尔更爱干涉，也更无用处。更爱干涉，是因为他想把他们的工作引向那些在他看来政治上有用的题目。更无用处，是因为他所看重的事，与他们的完全背道而驰。

傅里叶想出一个简单的办法，既能与梅努共处，又不使自己受牵连：让他的名字与几项小的发现和出版物联系在一起，定期呈交技术性強到无法读懂的报告，同时不动声色地继续真正重要的工作，而不让总司令知情。

“这是外交手腕。”傅里叶向若马尔解释了他的策略后，若马尔说。

“这是求生。”傅里叶答道。

学者们重新开始了他们的勘察。

埃及研究院继续举行每周例会，只是气氛已不同于头几年。发言不再那么热情，辩论也不再那么活跃。学者们承受着久居异乡的重负，对这个国家，他们既没有掌握通行的语言，也没有领会文化上的微妙之处。

傅里叶竭力保持学术上的锐气。他提出供大家共同思考的题目，组织朗读古代文献，让同事们记起自己身处怎

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些努力并非徒劳。在这些艰难岁月里提交研究院的好几篇报告，后来都成了重要的科学论文。

六月中旬的研究院例会，是自波拿巴离去、克莱贝尔身亡以来最热烈的一次。

傅里叶特意提出了一个抽象的题目——文明中的记忆观念——讨论很快便越出了学院的界限。

若马尔第一个发言。他二十二岁，带着那种年轻又总是有理的人所特有的、令人恼火的严谨。

“一个忘记了自己度量标准的文明，注定要从头再来。古埃及人三千年间都没有忘记自己的度量。这或许正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定义。不在于其纪念建筑的宏伟，而在于它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传承知识而不使之走样。”

马塞尔提出了异议。

“纪念建筑恰恰是传承得以实现的凭借。没有卡尔纳克，没有金字塔，若马尔的那些测量什么也传不下来。物质的载体与它所承载的知识是不可分的。”

“所以我们才来到这里，”若马尔反驳道，“就是要用一份更便于流传的文献来取代纪念建筑。《埃及志》可以随身携带，而神庙却不能。”

傅里叶听着，没有插话。他在想，如果军队明天投降，他们的工作会落得怎样的下场。

“如果我们不得不仓促撤离，您的测绘图稿是否处在可以复制的状态？”

“从亚历山大起，我就留着双份副本。船若沉了，至少还有一份存活。”

傅里叶默默地望着他。这个年轻人明白，随军进行的科学工作，本质上是脆弱的，唯一的对策就是冗余。

“您应该把这话讲给别人听。”

“我讲过了。多数人觉得太过头了。”

“多数人错了。”

傅里叶想起了汉密尔顿。他仍不知道此人的名字，却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在对岸，有人同样在准备着自己的清单。一个带着笔记本而来的国家，胜过只带着大炮而来的国家。若马尔的双份副本，不是工程师的谨慎。而是常识。

那天晚上，若马尔独自留下，誊抄他的测量笔记。笔在纸上匀速地划过。城市的喧嚣透过百叶窗传来。宣礼员在召唤祈祷。若马尔什么也没听见。他在抄写。他有时想，在这里，誊抄是他做的唯一可靠的事。绘图和测量可能出错，但忠实的誊抄不会错。一份准确的副本，能比原件活得更久。这才是真正的抵抗。自阿布基尔以来，他就明白，每一项测量要么有两份，要么就等于不存在。第一份在野外笔记本上，站着写成，在风中。第二份在这里，在桌前，经过复读、核对，写得清晰可辨。能留存下来的，是第二份。

1800年6月25日，若卢瓦与若马尔、若弗鲁瓦和两名绘图员再度出发，前往三角洲东北部的塔尼斯，勘察第二十一王朝法老古都的遗迹。

他们发现了一片辽阔的废墟。零散的土丘之下，沉睡着层层叠压的数个世纪的城市。花岗岩石块。雕像的碎片。上埃及的沙土保存下来的东西，在三角洲却被吞噬了。这里没有一处像卡尔纳克。没有一处像丹德拉。这是褪去了布景的埃及。只有物质本身，散落着，看不出秩序，却依照一种唯有发掘才能揭示的逻辑组织着。若卢瓦提醒说，自希腊人以来，还没有人尝试过对此地作系统的

测绘：希罗多德提到过这个遗址，斯特拉波也提到过。“那是因为谁也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可看的東西。”若马尔补充道。若卢瓦一连画了三天，直到夜幕降临才停笔，并绘制了整个遗址的地图，标明每一块重要石块的位置。遗址入口处，一名古董商背着褡裢在等候。那人名叫苏莱曼·盖巴尼，从开罗而来，听说委员会将前往塔尼斯，前一天便上了路。他并不特意等谁，只等一个懂得该买什么的人。

若卢瓦在那些物件前停下脚步。其中两件沙布提俑是真品，从包浆和铭文上看得出来。他买下了一件。

离开塔尼斯，探险队转向布巴斯提斯，向西两天的路程。那是猫女神巴斯特的圣城。神庙遗迹的规模令人叹服。希罗多德曾把它描述为埃及最壮丽的神庙之一，每年的节庆吸引着大批人群，看到遗址之广阔，这话是可信的。十米高的粉红色花岗岩柱横卧在沙地上，圆柱的柱身在坍塌时断成了数截。浮雕的残片散落一地，有祭司的行列，有节庆的场面，有程式化的神祇。晚期埃及的风格。神庙四周，是一片圣猫的墓地。石灰岩的廊道里有数以千计的木乃伊。与对待人类一样精心，泡碱，裹布，木制或青铜的棺。

若弗鲁瓦打开其中一具木乃伊，发现遗体保存得极好，皮，毛，骨，筋腱，在埋葬两千年之后仍完好无损。是一只体型寻常的家猫。

盗墓者早已来过。墓坑被掏开，木乃伊四散，裹布的碎片撒在石灰质的地面上，宛如一层褐色的雪。

盗墓者在猫的墓地里要找的，是随木乃伊一同放入的釉砂或金制护身符，以及青铜的小棺——那是蹲坐的猫的形状，耳朵竖起，眼睛镶着玻璃。这些棺即刻就能卖出

价钱。亚历山大的商人们一个世纪以来都把它们转卖给欧洲的旅行者。盗墓者留下了木乃伊本身，护身符被剥去之后它们便一文不值；也留下了普通的石灰岩棺，太重也太常见，不值得搬运。

若鲁瓦挑了六具保存完好的猫木乃伊。他用干净的亚麻布把它们包好，作了标记。对他而言，这是动物学标本，是古代埃及的动物群，可与自然史博物馆动物园里的活体相比较。他想到居维叶见到它们时会说什么：物种固定不变的证据，两千年来猫毫无改变。又想到拉马克会说什么：两千年在变化的尺度上算不得什么。同样的木乃伊，却为两种对立的论点所用。科学就有这样的特性，事实并不选择阵营。对留下它们的盗墓者来说，它们是取走护身符后的废物。对埋葬它们的巴斯特祭司来说，它们是献给女神的供品，注定要永远留在那里。同一件东西，有三段互不相交的历史。

若卢瓦在墓地里发现了一具半埋在土中的小青铜棺，是蹲坐的猫的形状。高二十厘米。尾巴盘回到前爪上，是埃及猫特有的姿势。在傍晚的斜照下，面部的轮廓清晰浮现，锈蚀也遮不住它的精确：两颊的肌肉，鼻梁的棱线，紧闭双唇的线条。

棺是空的。若卢瓦把青铜在手里翻转。底座上用凿子刻着一行象形文字。大概是献祭者的名字，那位把这只猫献给巴斯特的女子或男子，或为求一份恩典，或出于寻常的虔诚。一个日后会有人读出的名字，倘若这件青铜器能到达巴黎的话。一个自第二十六王朝以来便一直在泥土中等待的名字。

他把它放进了挎包。重量：三百克。在亚历山大的市价：大约二十皮亚斯特，前提是找到一个喜欢埃及青铜器的英国买家。科学价值：不可估量，倘若这件青铜器上刻

着献祭者的名字，而这个名字有朝一日能被读出。这两种价值并不重合。对考古学家宝贵的，对商人并不宝贵。而若卢瓦既是考古学家，又把自己找到的东西放进挎包，这一事实并没有消解这一矛盾。它是矛盾的化身。

傍晚，若弗鲁瓦带着装有六具木乃伊的箱子，回到营地与若卢瓦会合。夜幕降得很快。他们坐在火堆前，把各自的发现摆在两人之间。六具木乃伊。那件青铜器。若弗鲁瓦在合上箱子之前又检查了一遍木乃伊。他一整天都在决定哪些可以带走，哪些必须留下。

“你打算拿它怎么办？”若弗鲁瓦望着青铜器问。

“带走。画下来。作描述。等卢浮宫有了埃及部，就交给它。”

“如果投降时英国人把它拿走呢？”

若卢瓦把青铜器放进挎包，压在他的笔记本下面。他没有回答。他们两人都知道。若投降真的来临，这件青铜器就会去伦敦。进大英博物馆的一个展柜。

探险队于 8 月 12 日回到开罗，在三角洲共待了七个星期，带回了塔尼斯、布巴斯提斯的图稿——这些遗址在考古上令人失望，却都已有了文献记录。

“孔泰把埃及变成了他的实验室，”若卢瓦对傅里叶说，“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观察、实验、改进到哪里。这次远征最持久的实际收益，或许要由他来获得。”

尼古拉-雅克·孔泰已成为远征军中公认的发明家。气球，磨坊，制造工场。这位前气球飞行员不画神庙，他解决的是勘察神庙时遇到的难题。

另一些学者，抵御沮丧的能力较弱，把活动压缩到了最低限度。有几位病倒了。慢性痢疾、热病，以及沙尘和

烈日引起的眼炎，在委员会的队伍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好几个人没等到回国就死在了埃及。

1800 年秋，若卢瓦组织了新的勘察，前往东部沙漠。这些地点与他之前走过的各处不同。这一次，他想探访隐没在沙漠悬崖间、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科普特修道院。

1800 年 9 月 15 日，若卢瓦与若马尔和三十名骑兵护卫一同向东出发。东部沙漠干旱而多石，行了三天。

9 月 18 日清晨，探险队抵达圣安东尼修道院，自四世纪起便有人居住于此。

科普特修士们带着戒备与好奇迎接来客。约五十名身着黑袍的隐修士，过着极度清贫的苦行生活，他们望着这些巴黎来的学者，就像望着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生灵。

“神父，”若卢瓦通过哈桑转告修道院长，“我们不是来拿走你们的手稿的。我们只想抄录它们。一切都会留在这里。”

院长听完，退下去一个小时。回来时带着一个条件。他们可以参观图书馆，但未经他的许可，修道院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得带出。

修道院的图书馆占着一间拱顶的小厅。科普特手稿——有些已有数百年之久——保存在木箱里。院长允许他们查看，但不许带走。

“看这一份，”若马尔低声说，“一部双语的诗篇，左边是希腊文，右边是科普特文。一行对一行。若能对照这两栏，就开始能读了。”

他翻阅着手稿。科普特字母——圆润，源自希腊文，另外从世俗体借来七个符号——诉说着关于这一文明的某种东西。既非希腊的，亦非法老的，而是两者兼有。这种语言承载着这段历史。

“您愿意把它卖给我们吗？”若卢瓦说，“或者允许我们抄录？”

院长摇了摇头。

“这份手稿属于我们修道院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的神父们世代代把它保存下来。它不会离开这里。”

院长说这话时，有着那种无需提高嗓门之人的平静。

若卢瓦接受了条件，花了三天抄录这部科普特文与希腊文对照的诗篇。工作细致入微，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抄，而文本的两种语言，他只懂一种。他带着抄本离开，并确信日后总有人知道该拿它做什么。

若卢瓦抄写诗篇的时候，若马尔在周围的悬崖间勘察。他发现了一些洞穴，曾是最初几个世纪隐修士的居所，洞壁上布满了用尖物刻出的涂鸦，有名字，有日期，有祈祷文。

“这些洞穴让我不安，”若马尔补充道，“有人在这里独自生活了好些年，只是祈祷。别的什么也没有。这是怎样的一种生命观啊……”

他把铅笔搁下片刻。他想着那些涂鸦，那些隐修士刻在岩石上的名字，他们并没指望有人来读。若马尔花了三年记录测量数据。动机的差异是绝对的。举动的差异，则小得多。

“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一贯性。他们的苦修不是疯狂。那是对永恒的一次押注。我们对科学下的也是同样的赌注。手段不同，热忱不减。”

9月21日，探险队启程前往圣保罗修道院，在南面约三十公里处。图书馆更大。若卢瓦抄录。若马尔测量。

探险队于 9 月 29 日返回开罗，带回了科普特手稿的抄本，以及修士们同意出售的几件基督教艺术品：木板圣像，青铜十字架，银制香炉。若卢瓦将它们登记造册。

“这些科普特器物是缺失的一环。科普特人直接源自古代埃及人。他们的语言来自法老时代的埃及语。研究科普特语，就是从下面靠近象形文字。”

II - 沙漠中的远征

梅努在表面上对学者们显得更为友善。克莱贝尔之死，在宫殿的走廊里留下了一个空缺，学者们的忙碌至少在表面上填补了它。梅努提供护卫，拨付经费，偶尔还出席研究院的会议。

德塞在马伦哥阵亡的消息，八月传到了开罗。若卢瓦是在办公室里得知的。德塞曾是这次远征中最好的同伴。是他让学者们安心工作而不去催逼，也是他亲自带着一种若卢瓦在其他任何将军身上都没见过的专注，端详过那些神庙。

消息是由一名奥斯曼信使带来的，事发两个月之后。德塞于 1800 年 6 月 14 日在马伦哥阵亡。与克莱贝尔同一天，相隔数百公里，他率领自己的师发起冲锋，要扭转一场波拿巴以为已经败了的战役。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他当场死去，年仅三十一岁。

若卢瓦在办公桌前坐了很久，没有点灯。光线渐渐暗下去。他任它暗下去。窗外，开罗依旧传来傍晚时分的喧闹。小贩的吆喝，远处的宣礼员，园子里转动的萨基耶水车规律的声响。他在笔记本里翻找随德塞远征上埃及时记下的笔记。两本半笔记本，两面都写满了。丹德拉，底比斯，国王谷，菲莱。页边上，德塞偶尔也有批注。不是审美的评语，而是实际的问题。发掘这个遗址要多

久，挪动这块石头要多少人，这种砂岩抗潮湿的能力如何。

这些批注当时曾惹恼过若卢瓦。一位将军站在丹德拉面前问的是后勤问题，他觉得这是把事情看窄了。他借着灯光重读这几页，纸页在敞开的窗口吹来的穿堂风里微微作响。德塞的字迹很小，整齐，向右倾斜。如今他换了一种方式重读。德塞看的是和他同样的东西，用的是同样的眼睛，而且问过自己这些东西在物质上的未来。这些石头该怎么办。如何保护它们。若什么也不做，它们还能撑多久。

他还想到了德塞的私人笔记本。将军自土伦出发以来，一直写着一本战地日记。若卢瓦好几个晚上都见他在宿营之后，借着一盏提灯，手里拿着它。他不知道德塞在里面写了什么。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死者的笔记本属于死者。这些笔记本想必已随他的遗物回到了法国。或者留在了战场上。或者被某个人拿走了。若卢瓦自己的行李里，有一把德塞 1798 年 12 月借给他的折刀，他从没想过要还。一把普通的刀，木柄，短刃。一年半来，一直用它削铅笔。他现在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留着，似乎是对的。扔掉，似乎不可能。

没有人知道，一个战死之人的笔记本会被如何处置。德塞没有收藏。没有装满沙布提俑和圣甲虫的挎包。德塞的笔记本将追随其他物件的命运。被找回，被遗失，被卖掉，被烧毁。战争分不清一个军官的文书与一座神庙的象形文字。

若卢瓦继续筹划新的勘察。这一次是三角洲西部的遗址，与初夏时走过的各处不同。塞易斯，布托。平坦的土丘，几乎没有什么可见的遗迹。

8月15日，他与若马尔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出发。十二天里穿行在耕作的平原上，寻找北方法老大城的遗迹，也寻找浮雕上所表现的动物物种。他有博物学家的方法：绝不在书斋里凭空假设。先看。其余的都在其后。

行了两天，他们抵达塞易斯。这里的空气不同，更湿，更重，带着被水淹的田野的气味，光线是白色的，没有沙漠的干燥。第二十六王朝法老们的大都城，已什么也没有留下。几块花岗岩石块散落在田野里，被当地农民重新用作水渠的垫石。

“这座土丘占地两平方公里，”若马尔说，“两千年层层叠压的居住。这不是一个被发掘过的遗址。这是整座城市被压缩进了一座山丘。”

没有什么可画的。没有可见的纪念建筑，没有矗立的神庙，没有方尖碑。只有山丘的表面，它的尺寸，用气压计测得的高度。而在四周的田野里，水渠中，村舍的墙壁里，到处都是被重新利用的花岗岩石块。柱子的残片，雕花门楣的碎块，一段段的檐梁。村里的费拉们世代代用它们盖房子、引水灌田。

若马尔在一道水渠边停了下来。石块是阿斯旺的粉红色花岗岩，一面经过打磨，其余几面是粗糙的。

“这些石块我们带不走，”若卢瓦看着自己的速写说，“它们已成了人家房子的一部分。总不能为了取石头把一座村子拆了。”

“这些费拉才是塞易斯真正的守护者。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可要是没有他们的房子，这些石块早就消失了。他们通过再利用，保护了它们。”

他看着自己的速写。墙里的石块。一行一行抄下的铭文。他做的和费拉们是一回事——从塞易斯取走他所能取的，装进适合他的载体。他们用的是花岗岩。他用的是纸。

探险队于 8 月 27 日回到开罗。十二天。遗址令人失望，但都有了文献记录。

十月和十一月，若卢瓦为藏品编目。两年间积累起数千件器物。雕像，护身符，纸莎草文献，钱币，珠宝，自然标本。他制作卡片，核对描述，订正归属。数月野外工作之后，干的是档案员的活计。

若卢瓦偶然发现旧开罗街区里有一间科普特作坊，据说那里仍按古法制造纸莎草纸。一位老人和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制作的纸张卖给商人，商人再把它们当作真品转售给委员会的学者。若卢瓦在那里买过好几批。

一天早晨，他请求留下来观看制作过程。

纸莎草纸的制作遵循一套熟练的工序。把茎秆切成细长的条，排成交叉的数层，润湿，捶打，压上数日。若卢瓦把手指按在一张新纸的表面——略显粗糙，尚带暖意，散发着他在别处从未闻到的植物气味。成品——一张柔韧的乳白色纸张——毫不逊色于欧洲最好的纸。这门技艺，若卢瓦自认在萨卡拉的浮雕上见到过，据说可上溯四千年，一个动作也未曾改变。

他画着老工匠的双手。那双手从孩提时代起就熟悉这项工作。是他父亲教的，他父亲又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学来的。他无需解释。他的手知道。

“这门技艺，”若卢瓦对翻译说，“他们做了多久了？”

翻译转述了问题。老工匠没有抬眼，作了回答。

“他说是他父亲教他的。而他父亲是从一个自称得自古人的人那里学的。”

“在这里，您所说的古人，指的是法老吗？”

又一个问题。简短的回答。

“他说他不知道。他说这并不重要。要紧的是，手知道该怎么做。”

若卢瓦记下了这句话。手所知道的。身体的传承，先于言语的动作，先于理论的技艺。这位科普特工匠不知道纸莎草纸的发明者叫什么。他无需知道。他会做。若卢瓦望着自己的双手，指节褶皱里的墨渍，右拇指上多年握炭笔磨出的茧。他的手也知道一些他的笔记本没有记下的事情。

这是一种记忆，是《埃及志》无法复制的。雕版的图版能展现纸莎草的形状。但手的动作——确切的压力，纸条的角度，凭肉眼判断的晾干时间——这些哪儿也去不了。它们将随着这个人和他的儿子们一同消亡，除非他的儿子们也有愿意学艺的儿子。

他端详长子的双手。那双手做着与父亲的手完全相同的动作。传承已经发生了。

他带着三张新纸，以及那幅手的画离开了，日后他要把画装框，挂在圣多米尼克街的寓所里。他想起汗·哈利利那位老书法商人，在他到开罗的第一晚，送了他第四张纸作为见面礼。那个举动也是一种传承。把东西送给一个初来的人。这两个人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他们却有着同样的举动。

梅努对委员会的科学工作表现出与日俱增的个人兴趣。他的下属有时觉得这种兴趣碍事，因为它表现为对工作安排的干预，以及自以为有权决定什么值得研究。

“梅努将军希望我们多花些时间在伊斯兰时期的古迹上，而不是法老时代的古迹，”若卢瓦向傅里叶转述，“他声称，伊斯兰的埃及在政治上对我们与当地居民的关系更有意义。”

“就实质而言，他也不是全无道理，”傅里叶说，“但科学上的优先次序，该由我们来定，而不是由他。”

他们找到了折中的办法：包括沙布罗尔和朗克雷在内的几位学者，拿出一部分时间研究伊斯兰时期，记录开罗的中世纪清真寺和阿拉伯石匠的建筑技术。这些研究收入《埃及志》，使之成为欧洲最早一批严肃研究中东伊斯兰建筑的著作之一。

与此同时，若卢瓦继续记录法老时代的古迹。多年下来，他形成了一套精细的工作方法：先画一幅总体草图，把握大体比例，再对重要部分作详细测绘，最后抄录象形文字铭文，保留所有可见的瑕疵，以便日后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版本进行比较。

“你抄下来的象形文字，带着裂缝和缺损，比你理想化的象形文字更宝贵，”他对年轻的助手们解释说，“你所见的才是现实。你想象它应当是的样子，不过是你自己的重构。不要把两者混在一起。”

三月的一个早晨，若卢瓦走在旧开罗的伊斯兰区，描绘中世纪房屋的立面，看见了一个让他难忘的细节。一名法国士兵——二十来岁，军服已旧，枪斜挎在肩上——停在科普特区一户人家外墙的壁龛前。壁龛里是一尊青铜小像，大约二十厘米，一尊端坐的伊西斯。显然很古老。包浆厚而不均匀。

士兵看了看它。然后拿了起来。毫不犹豫，也没有四下张望。他把它塞进子弹盒，转身走进小巷。前后一共十五秒。壁龛空了。

若卢瓦待在原地，一言未发。他对这名士兵没有权威，他自己也不是军官。即便他是军官，又能说什么呢？说这件东西属于这座房子？说主人会回来？他不知道谁住在那里，也不知道这房子是否还有人住。他只知道，这

尊小像在壁龛里放了足够久，以致它的底座在石面上留下了一圈比其余部分更干净的印痕。

他掏出笔记本，画下了空空的壁龛。缺席的轮廓。那圈较浅的痕迹，是小像的底座多年来所压之处。他所能做的只有这些。记录刚刚消失的东西。《埃及志》中也许会有—幅类似的伊西斯的图，取自委员会的藏品。但不会是这一尊。那一尊会在士兵的子弹盒里一直到亚历山大，然后进入某个集市，再然后，若有人在港口买下它，就进入马赛某间客厅。

他又在那里待了一会儿，笔记本摊开在空壁龛的画上。随后他穿过科普特区的小巷回到宫中。尚未开门的铺子前，孩子们在门槛上玩耍。他一路走着，没有取出笔记本，没有画。有时候，必须什么也不带走地走过去。

III - 农业与灌溉

1800 年至 1801 年的冬天，委员会的工程师和农学家们投入了对埃及农业的研究，这个领域此前一直被对古迹的迷恋所遮蔽。令他们震撼的，是这套体系运转得多么出色。孔泰在入冬后的第一次例会上，就向研究院提交了他的水利研究。

“埃及的农业一句话就能说完：每年夏天，尼罗河的泛滥使田地肥沃。其余的一切——渠道，水池，机械装置——不过是对这一自然事实的有组织的管理。”

他描述了灌溉的装置：桔槔，一种带配重的简易杠杆，用来提水；萨基耶水车，由一头牛驱动的轮子，用于更大的水量。这两种机械，任何一位费拉都会用当地的木料和绳索制造和修理。

“桔槔和萨基耶水车看上去原始。其实不然。本地的木材，植物纤维的绳索，黏土。这是为实际条件而造的工程，不是为我们的教科书而造的。”

孔泰从经验中领悟到的是，一台设计得当的简单机器，胜过一百台不合用的复杂机器。埃及人在他之前一千年就已懂得了这一点。

他展示了渠网的技术图纸，这张渠网把尼罗河的水分送到整个可耕谷地。一棵在数百公里间分枝的水利之树，由数十个村庄共同维护。

“不清淤的渠道，三年就会死掉。淤泥会把它堵住。在这里，那是冬天的劳作。数百人腰部以下泡在水里。一个村子单独养护不了一条大渠。恰恰因此，埃及人才发展出集权的国家。是水利造就了法老的官僚体制，而不是相反。”

在灌溉之外，好几位学者研究栽培植物和农业习俗。若卢瓦整日泡在田野里，观察季节的循环，耕作的技术，当地的品种。

“如今埃及的农业，与古王国时期几乎一模一样，”若卢瓦总结道，“同样的作物，同样的农具，同样的动作。四千年下来，根本的东西丝毫未变。”

“埃及人不需要肥料，”孔泰说，“尼罗河每年都从埃塞俄比亚的群山中为他们送来。他们把水引向田地，等淤泥沉积下来，再让水在播种之前退去。”

马塞尔并不是工程师，却从这番解释中悟出了理解法老神庙建筑的一把钥匙。大神殿几乎总是垂直于尼罗河而建，主轴或指向河流，或依农事历法指向四方基点。埃及的宗教天文学与农事历法密不可分，而农事历法本身又以尼罗河的涨落周期为准。

“您瞧，神庙并不是脱离自然世界的独立建筑。它融入了农业与水利的景观。朝向河流的方位，道出了生命的源头。太阳落在沙漠一侧，那里正是安葬死者的地方。埃及的宗教，是一种水利的宇宙论。”

“如果把这套体系移用到其他多淤泥的河流上——比如尼日尔河，或者印度河——效果应当不相上下。这并非某一地独有的技术，而是一种普世的技术，只是唯有埃及人拥有足够的时间将它臻于完善。”

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担任吉萨运河的 *wakil* 已有十六年。他负责监督七公里长的主渠及其支渠每年的疏浚，统筹十四个村庄的劳作，并在费拉之间裁断用水分配的纠纷。那天早晨，委员会的两名工程师在他的主渠岸边安顿下来。一个是带着仪器的高瘦个子，另一个手上沾着墨迹。他们画图，测量，彼此交谈。他们带来的翻译不太高明，只译得出字面，译不出意思。阿卜杜拉从他在技术术语上的迟疑便看得出来。好的翻译是不必费力找词的。

他从对岸的芦苇丛中隐身望着他们干活，看了一个钟头。他想弄明白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测量渠宽、堤高、渠底的坡度。他是从那高瘦个子摆弄瞄准仪器的动作看出来的。这些人不是兵。兵会四下张望，而不是盯着水渠。这些人只看水渠。

那高瘦个子朝他走了过来。他通过翻译问：每年疏浚需要多少个工日，多少人手，各村之间如何编组。那都是 *wakil* 会问的问题。

阿卜杜拉答得很仔细。他知道这些法国人什么都要记下来。那高瘦个子记录他的回答，速度之快，说明他听得懂人家说的话，哪怕翻译有些吃力。当阿卜杜拉讲到轮流疏浚的制度——每个村子负责一段，三年一轮——那

高瘦个子点了点头，那是工程师们在某件事印证了自己早先的猜想时才有的点头。

让阿卜杜拉不安的，并不是法国人的好奇，而是他们把水渠当作一件物品。当作一样可以测量、描述、写进书里、然后便算是弄懂了的东西。阿卜杜拉用十六年学会的，恰恰是水渠不会被化约为它的数据。它有脾气。大水之年，它会在从未漫溢过的地方溢出水来；枯水之年，它又露出三十年来无人见过的险处。要驾驭这一切，靠的是记忆——父亲传给他、他又将传给儿子的记忆——而不是什么瞄准仪器。

他任他们干活。他们什么也不拿，什么也不动。上午将尽时，那高瘦个子给他看了自己画的水渠图，一幅精确的横剖面图，标满了数字。阿卜杜拉默默地看着。画得没错，那就是这条水渠。可图上说不出，为什么第三公里处的左岸比右岸更脆弱，也说不出怎样从水色里就觉出今年的淤泥是肥沃还是沙多。图画出了水渠，而他是懂得水渠的。

他通过翻译，给他们指了水渠上的两处地方，说在那里测量会更有意思。那是父亲带他看过的地方，其中的要紧之处他自己也说不明白。他只是感觉得到，如此而已。那高瘦个子毫不迟疑地去了。他想必有所发现，因为他在每一处都耗了两个钟头。

傍晚临走之前，那高瘦个子又问他——仍是通过翻译——学做一个 *wakil* 要多久。阿卜杜拉回答说：一辈子。翻译照话译了。阿卜杜拉本想再补充一句：学徒期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水渠也永远变个不停；而一个 *wakil* 的智慧，就在于知道自己仍不懂的，比自己所懂的更多。

若卢瓦带着七十二袋淤泥和几页水文记录回到了开罗。他想着那位运河的 *wakil*，想着他从对岸望着他们干活的

神情，想着他回答问题时的精确，想着他指出的那两处地点。这不是一个任法国人摆布的人，而是一个在盘算的人。他想到了自己看待这个国家的方式：用数据，用标高，用横剖面。其实也并没有那么不同。

“那位管了这条水渠十六年的人，他对您说了什么？”一天之后，在成果汇报会上，孔泰问道。

“他说学徒期是一辈子。还说他仍不懂的，比他所懂的更多。”

孔泰放下了铅笔。他望着桌上排成一行的淤泥袋。七十二份样本，取自四十公里的范围，贴了标签，编了号，就要运往巴黎。埃及的泥土，装在法国的帆布袋里。他想起若卢瓦取每一份样本时的样子：跪在水渠边，手指插进尚且湿润的淤泥里，先用指头感受质地，然后才去测量。这种触感不会装进袋子里。它会留在这里，留在水渠边，留在做过那个动作的双手里。

“我们对他们的土地，和对他们的雕像做的是同一回事，”他说，“我们拿走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然后称之为科学。”

若卢瓦没有作答。取走淤泥与取走一尊沙布提侖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希望的那样分明。两种情形里，都有东西离开了埃及。

“区别在于，”他终于说，“拿走淤泥，不会使田地变贫瘠。每年涨水都会补回来。可雕像，尼罗河是不会补回来的。”

“这条界线是实用的，不是道德的。”

他们沉默下来。屋外院子里，听得见埃及仆役们的声响，春臼单调的捣击声，阿拉伯语的说话声，空气里还飘着

孜然的气味。这些人也是从父辈那里学来的手艺。他们不会装在帆布袋里去巴黎。

主渠的疏浚在十二月的第三个星期开始。若卢瓦问阿卜杜拉能否前去观看。阿卜杜拉答应了，脸上的神情什么也没透露。

各队按村子分工，每村负责分给自己的一段。人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用宽大的木锹从渠底铲起淤泥，装进编织的筐里，由另一些人抬到堤岸上。堆在堤岸上的淤泥将被分到各处田里。一点也没有浪费。

若卢瓦一连看了五个钟头。他数着人数，测算每小时挖出的淤泥量，记下各段疏浚前后的深度。劳作的效率始终平稳，没有多余的动作，各队之间也不见混乱。这些人从小就干这个。他们的动作流畅自如，那是学得过早、早已与做事的身体融为一体的东西才有的流畅。

晌午时分，阿卜杜拉过来在他身旁的堤岸上坐下。他看着若卢瓦记录数字，几分钟里一言不发。随后他开了口，翻译用简短的句子转述。

“他说，他祖父曾带他看过下游的一处地方，那里的渠底是整块的岩石。渠底是岩石的话，遇上大水之年，水渠更经得住。他父亲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他想知道您是否知道。”

若卢瓦看了看翻译，又看了看阿卜杜拉。这个问题并不寻常。在字面之后，它还带着另一个问题：您知道自己在测量的是什么吗？

“不，”他说，“我先前不知道。请带我去那个地方。”

阿卜杜拉不慌不忙地站起身。他们沿着水渠一同走了二十分钟。阿卜杜拉在一段渠底露出地面的地方停下。那是一块暗色的岩石，被世代代的水流磨得光滑，上面

布满矿物沉积的条纹。若卢瓦跪下身，掏出小刀，轻轻刮着岩面。是致密的石灰岩。水渠在这里是顺着天然的岩层露头开凿的。三千年前，曾有人正是出于这个缘故选定了这个位置。

若卢瓦记下了位置，又把带条纹的岩石画了一幅草图。阿卜杜拉看着他做。待若卢瓦完成，他说了句话，翻译过了好一会儿才译出来。

“他说，法国人把埃及人从来就在做的事写了下来。也许有用。但写下来，代替不了亲手做了一千年。”

若卢瓦合上了笔记本。这话说得对。他找不出话来回答。傍晚，阿卜杜拉送若卢瓦回到法军纵队扎营的村边。两人并肩走着，一句话也没说，翻译在几步之后跟着。太阳低低地挂在西面的沙漠上，长长的黄色光线洒在已因退水而露出的田野上。

阿卜杜拉停了下来。他望着田野看了片刻，然后说了句话，翻译是这样转述的：最近的那块田角里——他伸手指了指——有一堆石灰岩块，是他去年冬天疏浚水渠时发现的。石块上刻着字。他不识得那些符号。他把它们堆在那里，只因为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

若卢瓦过去查看。四块白色的石灰岩，大小如甜瓜，堆在堤岸的一个角落里。每块上都刻着浮雕的象形文字，做工精良。多半是一段行政铭文，或是一条供奉的祝词，属于新王国时期。它们来自一座被拆毁的神庙，曾被重新砌进某道墙里，后来又掉进了水渠。

若卢瓦把它们画了下来。随后又把它们登记在册，写明确切的位置和对铭文符号的描述。他拿起四块中最小的一块——三公斤重，一面有铭文，另外三面是粗糙的毛面——放进了野外背包。

阿卜杜拉看着他做。他一言不发。他指出这些石块，是因为它们在他看来很重要，并不是指望有人把它们带走。不过，这个法国人是先画的图。这已经不同于那些上来就拿的士兵了。

“即便石块丢了，图还会留下，”若卢瓦通过翻译说，“我带走石块，是为了到巴黎去研究它。我若不带走，明年水渠就会把它冲走，到那时石块和图都不会留下。”

阿卜杜拉听完翻译，耸了耸肩——那是一个并未被说服、却又没有力气争辩的人所共有的动作——然后转身朝村子走去。

IV - 时间渐紧

1801年3月8日，约一万六千名英国士兵在阿布基尔登陆，向亚历山大进发。原以为已被阿里什协定了结的战争，又重新打响了。聚集在开罗的委员会学者们明白，他们能否离开埃及，此后将取决于一场军事上的投降。

梅努调集了他的部队。但他的人马分散在亚历山大、开罗和上埃及之间，要及时集结已不可能。3月21日，在亚历山大附近发生了一场胜负未分的战役。法军打得很好。可英国人有一万六千人，还有战舰。这场战争不是一天之内输掉的。它从1798年8月1日起就已经在输了。

北方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支奥斯曼大军正在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的统率下推进。两万奥斯曼士兵，又有马穆鲁克相助。钳形之势正在合拢。学者们明白，投降已不可避免。问题不再是会不会，而是何时，以及他们的藏品能在什么条件下保全下来。

3月14日晚，傅里叶召集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所有在开罗的学者都到了。二十来个人围坐在研究院图书馆的大桌旁。屋外传来商贩们收摊关铺的吆喝声。

“诸位先生，”傅里叶开口道，“我们必须为保护我们的藏品做好准备。投降条约通常规定，胜利者可以没收战败国国家所有的财物。倘若我们的藏品被视为法国国家的财产，英国人就有权提出索要。”

一阵沉默。随后若马尔发了言。

“我们必须让它们被承认为国际性的科学财产，而不是法国的军事财产。我们的成果属于普世的科学，而不属于某一个政府。”

“英国人也有博物学家，”若弗鲁瓦说，“有位名叫汉密尔顿的专员精通古物。他们会确切知道我们手里有什么。”

马塞尔插话了。

“机构财产与个人财产的区分，将是至关重要的。凡是我们自掏腰包买下的，可以作为私人财物来辩护。而以委员会的名义收集的，就更难保护了。”

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学者们议定了策略的大纲。他们不会以武力对抗查没。他们既无此手段，也无此权力。但他们会在英国专员面前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将陈述理由。必要的话，还会逐件交涉。

3月15日整夜，他们都在编制一份平行的清单。一份是委员会所有物品的正式清单，另一份是每位学者以个人名义持有之物的私人清单。马塞尔一直工作到清晨五点。他翻开自己的登记簿，翻到第八十七页，重读最近的几条记录。一尊青铜阿努比斯小像，高二十二厘米，1799年9月3日在汗·哈利利以八皮亚斯特向商人优素福·伊本·哈利勒买下。一卷残缺的丧葬纸草，十五厘米乘二十厘米，1799年11月17日以三皮亚斯特购自萨卡拉的一名费拉。一枚绿色皂石的圣甲虫，托勒密时代，1800年2月2日在艾兹白基耶集市以一个半皮亚斯特购得。每件物品

都有它的来历。每一笔交易都可以核实。这便是他的保障。

他的购置登记簿共一百一十二页，一百六十二条记录，自将近三年前亚历山大的第一笔交易算起。凡以他个人名义购得的每件物品，都登记在册，注明日期、地点、所付价款，若知道卖主的姓名，也一并写上。这本簿子从一开始就以公证人般的严谨记录着，因为马塞尔早在亚历山大时就明白，这一区分终有一天会变得要紧。

“这本簿子站得住脚吗？”傅里叶从他肩后看着问道。

“对确凿无疑的部分，站得住。至于其余的，只要汉密尔顿不逼得太紧，也站得住。一个想把一切都拿走的专员，总能找到借口。一个愿意讲道理的专员，会接受这本簿子作为充分的证据。”

“那么一切都取决于汉密尔顿了。”

“是的，一切都取决于汉密尔顿。”

罗塞塔石碑的问题尤其让学者们忧心。它是他们发现的最重要的物品。倘若它去了伦敦，破译象形文字就会成为英国人的胜利。不过，马塞尔已有防备。一年前，他把自己在罗塞塔制作的拓片描成线图摹本，寄往了巴黎。这些摹本已经到达。法国研究东方文献的大家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手里已经有了它们。即便石碑去了伦敦，拓片仍会留在巴黎。破译可以凭这些摹本进行。

“信息和实物不是一回事，”马塞尔说，“信息能够旅行，实物却不能。这一仗，我们已经赢了。”

在随后的几周里，学者们专心致志地系统复制自己的成果。研究院的图书馆变成了誊抄的作坊。沿墙摆开了桌子，每张桌子负责一类文件。一张用来描摹图稿。一张

用来誊录地形测量数据。一张用来誊录科普特文献的转写稿。一张用来抄写植物学和动物学的描述。

工作细致而又令人精疲力竭。若卢瓦监督着一百八十三张最重要图稿的描摹。上埃及的神庙，吉萨和萨卡拉的金字塔，国王谷的陵墓。他从军队里招来三个年轻的绘图员，会握笔，也会循着线条走。他给他们看一张原图，要他们快速描一张，只要轮廓，不要阴影，也不要多余的细节。建筑信息的要点必须保留，其余的可以为速度而舍弃。

这些摹本被卷进竹筒，交给一位希腊商人，他答应搭乘第一艘中立国船只把它们送往巴黎。若卢瓦预付了他五十皮亚斯特，并许诺竹筒若能送到，再付五十。

“您信得过他吗？”若马尔望着商队远去，问道。

“信不过。可我别无选择。唯一的保护，就是多寄几次。一份若丢了，也许另一份会到。”

若马尔那边，则把全部地形测量数据抄在第二套纸上。这活计花了他九天。他晚上干，借着灯光，逐个数字、逐个角度地誊抄。每一项测量都核对两遍。只要错一个数字，就可能使一整组演算作废。他的笔记本上渐渐写满了一列列数字、几何草图和页边的批注。这些抄本将与原件分开保存。一只箱子若丢了，另一只还能留存。

若弗鲁瓦没法复制他那些装鱼的玻璃罐。泡在酒精里的标本是不可能有多副本的。但他把每件标本都画了下来，精确到足以让博物学家仅凭图画就能辨认物种。两百四十个物种，一个接一个，附有关于产地、尺寸和区别性解剖特征的详细注释。这些画算不得艺术，是科学文献，冷静，精准，毫无表情。但它们包含了辨认物种所需的全部信息。万一罐子被毁，这些图画至少能保住其中的知识。

3月25日，一则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开罗。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的奥斯曼军队正从叙利亚推进。它与在阿布基尔登陆的英军会师已近在眼前。开罗很快就要被包围了。傅里叶当晚就召集了学者们。

“诸位先生，我们必须加快复制的进度。凡是能抄的，都要尽快抄下来。过后就太晚了。”

节奏加快了。人们从黎明干到午夜。油灯日夜不熄。墨水和纸张的气味充满了走廊。学者们两人一组，一个口述，一个书写。

4月8日，一桩意外打断了工作。若马尔正在誊抄在丹德拉测得的一组角度数据，手肘碰翻了墨水瓶。墨水泼在纸上。三个钟头的工夫白费了。他望着那页毁掉的纸，黑色吞没了数字。随后他取来一张新纸，重新开始。逐个数字，逐个角度。邻桌的若弗鲁瓦抬起了头。两人对视了一眼。没有言语。只是明白，无论发生什么，工作都将继续。军中的文书被征调来，协助抄写行政文件。

图书馆宛如一间中世纪的缮写室。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翻页的窸窣声，抄写员之间的低语声。有时，一团墨迹毁了一页快要写完的纸，便会传来一声压低的咒骂。那就只得全部重来。

4月间，若卢瓦通过一支前往亚历山大的商队寄出了第二批摹本。他又预付了商队首领五十皮亚斯特。这是谨慎，不是多疑。船会沉。箱子会从车上掉下来。火灾会毁掉货栈。盗贼在路上出没。唯一的保护，就是复制，以及增加运送的路线。

在复制工作的同时，学者们也在为同英国专员的交锋制定法律策略。他们列出了一份将优先捍卫的物品清单。罗塞塔石碑居首，其后是大石棺、巨型雕像、若弗鲁瓦的博物学藏品、若马尔的地图测绘成果、若卢瓦的笔记

本。针对每一类，他们都备好了论据，依据的是机构财产与个人财产之分，以及被搜集之物与被创造之作之别。马塞尔提出了将指导他们辩护的原则：绘图簿并不是什么珍奇古玩，而是工作的工具。拓片并不是古物，而是学者们自己亲手制作出来的纸和墨。科学仪器是专业人员使用的工具，而不是战争中的战利品。博物学标本属于自然界，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

“条约里写明，胜利者可以没收天然的和人造的珍奇之物，”马塞尔说，“我们要做的，是证明我们的成果不是珍奇之物，而是科学的产物。”

“英国人会想把一切都拿走，”若马尔答道，“我们的论据不会够用的。”

“我们的论据会造出一些灰色地带，”傅里叶说，“在这些灰色地带里，谈判就有可能了。一个讲理的专员会同意留下某些东西。我们该把力气集中在那里。”

“要是汉密尔顿不讲理呢？”若弗鲁瓦问。

“那我们就会失去一切。但至少我们试过了。而且副本会留下来。”

关于掠夺的道德问题，也被拿出来讨论过。4月的一次会议上，若马尔提出了那个令所有人都忧心、却没有人敢明说的问题。

“我们收集的东西有三种不同的性质。第一，科学观察。我们自己做出的测量、图画、笔记。这些观察无可争议地属于我们。第二，我们在自然中采集的博物学标本。鱼类、植物、矿物。这些标本不专属于任何人，我们的采集也没有剥夺任何人。第三，从考古遗址中取出的物品。陵墓、神庙、墓地。这些东西属于埃及。我们把它拿走了。”

若弗鲁瓦插话了。

“这个区分在理论上很清楚。实际上要复杂些。那些为了卖东西给我们而盗掘陵墓的费拉，不管有没有我们，他们本来也是要去盗掘的。我们的到来，只是加速了一个原本就存在的过程。”

“这不是正当理由，”若马尔答道，“这只是减轻罪责。两者不是一回事。”

整场争论中一直沉默不语的若卢瓦，终于开口了。

“问题不单是道德上的，也是现实的。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东西属于埃及，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对英国人捍卫它们。如果我们主张它们是我们的，那就必须直面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拿了它们。我们会留着它们。而且我们要发表我们的成果，来为这次取走辩护。这是我们唯一可能的自洽。”

傅里叶表示赞同。

“问题，”傅里叶说，“不在于我们拿这些东西是对是错。那样的讨论是学院式的。问题在于：我们现在怎么办？这些东西在我们手里。英国人会来索要。诸位之中，有谁认为我们应当以道德原则之名，主动把它们让给英国人吗？”

无人应声。问题是提出了，答案却是明摆着的。这间屋子里没有一位学者愿意主动放弃三年的心血。

“那么我们意见一致了，”傅里叶说，“我们将捍卫我们的藏品。但要明白我们为何这样做。不单因为这是我们的藏品，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国的科学会比英国的军人更好地利用它们。”

马塞尔补充了关键的一点。

“那要是英国人比我们用得更好呢？大英博物馆是一所严肃的机构。他们的学者也很称职。我们科学上更胜一筹的论点，只有在我们真正发表成果时才站得住脚。倘若我们的藏品在巴黎的箱子里一躺就是二十年，那英国人拿走它们便是拿对了。”

“这一点很重要，”傅里叶承认道，“《埃及志》必须出版。它将为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作出辩护。”

5月12日，亚历山大来了一名信使。一位休假的法国军官带来了消息：英国人已正式要求梅努将军交出埃及研究院所搜集古物的完整清单。傅里叶把信读了两遍。这已不再是假设。英国专员们将带着明确的要求而来。汉密尔顿很可能早已备好了他的清单。

5月里，军事消息渐渐明朗。英国人在亚历山大巩固阵地之后，正缓缓向内陆推进。奥斯曼人从东北方向挺进。两军向开罗合围已不可避免。只是几个星期的事了。

学者们更是加倍用功。时间的确在一点点收紧。每一天都带来新的限制，新的紧迫，新的必须作出的抉择。先抄什么？留下什么？有限的资源——纸、墨、时间、精力——该怎样分配给那些看起来同样紧急的项目？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学者之间的差别显露了出来。有的人慌了神，想把一切都救下来，同时开了十个抄写项目，却没有一个干完。另一些人，比如若马尔，则保持着自己的方法，定下清晰的先后次序，并始终如一、不分散精力。

傅里叶以特别的专注观察着这一切。他做着笔记。记的不是物品，而是人。每个人如何应对压力。谁保持着清醒，谁失去了清醒。这些笔记永远不会用在《埃及志》里。可多年之后，它们将帮助他精准地写出《埃及志》

的序言：他不仅测量了埃及，还观察了那些测量埃及的人。

5月底，傅里叶在午夜之后走进了作坊。灯还亮着。三名抄写员默默地工作，伏在纸页上。一个在誊抄地形测量数据，一个在描摹一幅神庙的图，第三个在转录植物学的描述。傅里叶在门框里停住了脚步。他想到这间屋子里正在上演的事。倘若英国人把一切都拿走，这些副本便是留下的东西。信息将比实物长存。或许，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6月初，最后一次会议被召集起来。敌人的军队离开罗只剩下几天的行程。投降已迫在眉睫。学者们必须作出他们最后的安排。

6月20日，若卢瓦对他的图筒做了最后的清点。二十三个铜筒，装着两千零八十七幅图。两百三十七本笔记。一百八十三张摹本已经寄出。他把清单列在一张纸上，折成四折，塞进外衣里。

“诸位先生，”傅里叶说，“我们已尽了所能。我们的成果已经复制。我们的清单已经齐全。我们的论据已经备好。英国人会带着他们的清单来，我们有我们的。接下来会怎样，取决于谈判。但我们的准备，已经做到了所能做到的最充分。”

若卢瓦发了言。

“我们将把藏品捍卫到底。不是出于骄傲，而是因为三年的心血，不能还没有为科学效力，就消失在某座英国博物馆的库房里。”

气氛紧张得几乎可以触摸。学者们知道，接下来的几天将决定他们藏品的命运。但他们也知道，为保护它们，自己已尽了全力。

6月的最后几天，开罗是一座悬而未决的城。法军在等待。学者们在等待。居民们在等待。人人都知道有事将要发生，却没有确切知道是什么，又在何时。

V - 开罗的败局

1801年6月27日，军事形势已无法维持。被困在亚历山大的梅努无力救援开罗。统率守军的贝利亚尔将军，与大维齐尔优素福帕夏展开了投降谈判。

一份协定谈妥了。其中一款，起初夹在英国人的草案里，却有可能涵盖委员会的全部藏品。它将于9月在亚历山大签署，编号为第十六条。

这一条很简短，一句话就说完了：阿拉伯文手稿、雕像以及为法兰西共和国所做的其他收藏，将被视为公共财产，由盟军将领处置。这句话，是傅里叶在1801年6月28日的紧急会议上，从英国人转来的草案中首次高声宣读的。宣读过后是一阵沉默，若卢瓦后来在日记里将这沉默比作宣布一个人死讯之后的沉默。接着所有人同时开了口。若弗鲁瓦。马塞尔。若马尔。声音叠着声音。傅里叶举起了手。沉默又回来了。

“其他收藏，”若弗鲁瓦说，“这就包括我的罐子。三年的博物学藏品。尼罗河完整的动物群。两百四十个还没有人描述过的物种。”

“其他收藏包括我的笔记本，”若卢瓦说，“两百三十七本。那是有史以来对上埃及神庙仅有的完整测绘。”

“雕像包括罗塞塔石碑，”马塞尔说，“三千年来我们找到的唯一一把破译象形文字的钥匙。”

傅里叶把这一条重读了一遍。阿拉伯文手稿、雕像以及其他收藏。他在措辞里寻找漏洞。雕像涵盖了巨像和石

棺。收藏涵盖了纸草、钱币、若弗鲁瓦的罐子、植物标本集、骨骼。绘图簿算不算为共和国所做的收藏？一位艺术家的工作笔记，能不能被视为投降条约意义上的收藏？傅里叶放下文本，又重读了一遍。

罗塞塔石碑：无可争辩。马塞尔的拓片——由马塞尔亲手制作的纸和墨——是收藏，还是智力成果？

“这一条是有意含糊的，”傅里叶说，“他们写‘其他收藏’，为的是什么都拿。我们要做的，是找出这几个字没有涵盖的东西。”

此后五天里，学者们的全部心思都耗在一套法律策略上，而这便是它的开端。不是军事抵抗。他们没有武器，也不会使用。而是文本上的抵抗。在协定的字句中找出缝隙，好让他们的藏品从中穿过。笔记本不是古玩。拓片不是古物。科学仪器是专业的工具，不是战利品。每一类物品都有它的防线。

此条宣读之后的日子里，研究院周围的小巷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汗·哈利利的商人们开始靠拢过来。不是那些寻常的布匹和香料商人，而是另外一些人，那些多年来经营古物的人，那些能从欧洲顾客的举止里，在他们自己尚未明白之前就读出他们想买什么的人。

苏莱曼·盖巴尼——就是一年前背着帆布挎包来到塔尼斯的那个人——6月30日早晨提着一只木箱出现在研究院门口。箱里有二十二尊彩绘石灰岩的*沙布提俑*，五枚蓝色釉砂的圣甲虫，三件晚期埃及的金护身符。他把箱子放在门房的桌上，通过一个充当翻译的男孩说：“照常价钱。趁英国人还没把东西都拿走。”

碰巧路过的马塞尔看了看箱里的东西。这些*沙布提俑*是真品，属底比斯时期，第十八或第十九王朝，彩绘石灰

岩，颜料依然鲜亮。圣甲虫是上乘的釉砂。金护身符也是真的。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他问。

男孩翻译了。苏莱曼·盖巴尼毫不迟疑地答道：来自底比斯，是去年冬天几个费拉为扩大地窖往下挖时发现的一座官吏墓。他买下了它们。现在他转手卖掉，因为他知道委员会就要离开埃及，而英国人不那么内行，出的价钱会更低。

马塞尔买下了整箱东西。价钱：四十皮亚斯特。他在自己的私人登记簿里写了一张注明 6 月 30 日的收据。这二十二尊沙布提俑进了马塞尔的个人清单——而不是研究院的藏品——因此在理论上可以逃过第十六条的约束。当地的市场就是这样运转的：条约的漏洞尚未为人所知，它便已预先料到，并早早适应。

若弗鲁瓦的回应则不同。他不寻找法律上的缝隙，而是寻找一种力量的对比。

若弗鲁瓦写了一封致贝利亚尔将军的信，只有一页。克制，毫无抒情。他在信中说明，他的博物学藏品代表着三年无与伦比的实地工作，尼罗河与三角洲动物群中的两百四十个物种，欧洲科学界迄今尚未描述过；若英国专员们要查没它们，他宁可将其销毁，也不会交出。

“这不是感情用事的威胁，”傅里叶读草稿时，他说道，“这是一则信息。我是在告诉他们，如果这一条严格地适用于我的藏品，会发生什么。”

“他们会相信您吗？”

“在他们决定信不信我之前，我早已把它们烧了。”

傅里叶把草稿折了起来。若弗鲁瓦不是爱虚张声势的人。他在这个国家待了三年，膝行着从坑道里爬出来，双手

沾满泥浆，亲自在酷热中搬运他那些盛酒精的罐子。他是想过这个威胁才写下来的。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决定。倘若这些罐子去了伦敦，它们将在某个地下室里沉睡，被某个不明白为何一条 *Polypterus bichir* 要紧的人打开。那还不如它们不存在。若他的藏品被夺走，他就烧了它们。因为只有这样，才与他对自己工作的看法相一致：这工作属于他，而不属于出钱资助它的那支军队。

“把信送出去吧，”傅里叶说。

自从法国舰队在阿布基尔被焚毁击沉的那一夜起，学者们就知道自己已与巴黎隔绝。港口里没有法国的船。信使取道陆路，路线不可靠，经君士坦丁堡和维也纳，要走六个月才能到。

早在 1799 年，就有人开始通过中立国的船只寄送包裹——丹麦、瑞典、美国的船，它们为粮食贸易在亚历山大停靠。这些船不受英国人检查，英国人虽控制着海面，却始终无权查没中立国的船只。

傅里叶就曾在 1799 年 10 月，通过一艘丹麦双桅船寄出过一卷纸，里面有三十页关于科普特语的语言学笔记。那是他的第一篇语法尝试。1801 年他回到巴黎时，这三十页正在研究院等着他，略微发了霉，但仍可辨读。

马塞尔的做法则不同。1800 年 3 月，他请一位相熟的马耳他人，为罗塞塔石碑的拓片做了两份线描摹本。不是拓片原件，原件他不肯放走，而是依照拓片描出的线描底图。这些摹本于 1800 年 7 月抵达巴黎，当即被西尔韦斯特·德·萨西查阅。这是欧洲的东方学家第一次见到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忠实复制品。

若卢瓦曾在 1800 年 1 月试着通过一艘美国船寄出一捆图稿。那艘船在克里特岛外海被一艘英国护卫舰截住并被搜查。若卢瓦的文稿被扣下、检查，随后又归还了。英

国人断定那是不具军事价值的艺术性测绘。但教训很清楚：交给中立国船只的邮件靠不住。

于是若卢瓦采用了另一种办法。所有要紧的文件——他最重要的图稿、马塞尔的测绘、若马尔的测量数据——一律复制成双份。原件留在学者身边。副本搭第一个能搭上的机会寄走。副本若到了，很好。若被截获，原件还在。

若马尔在给傅里叶的一份便笺里概括了其中的逻辑：委员会就像那些在战斗之前把弹药埋在几处不同地方的士兵。第一处储藏若被端掉，还剩下另一处。文件就是他们的弹药。一次被截的代价，是损失一年的工作，而不是全部。

复制的办法对大部分邮件奏了效。但不是全部。若卢瓦于 1800 年通过一艘瑞典船寄出的两本笔记，始终没有到达巴黎。它们的副本留存了下来。原件的下落无人知晓。沉了海，被扣押，或是在黎凡特商贸的周转中遗失了。

这两本失落的笔记，约有两百幅三角洲地区的图。塞易斯、布巴斯提斯、塔尼斯这几处遗址，是若卢瓦在 1800 年夏天走访过的，此后再也不会重见。它们的副本，虽然不那么精细，将出现在《埃及志》中，并附一句不显眼的说明：据副本绘制，原件已佚。

这是这些损失仅有的公开痕迹。若卢瓦在他的回忆录里从未提起过。

傅里叶看得分明：法国人从埃及拿走的东西，与英国人将从法国人手中拿走的东西，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法国人拿的是实物——石头、青铜器、纸草——以及这些实物的副本。英国人在投降之时将拿走实物，却拿不走副本。副本不过是纸和墨。在和约的清单

里，它们没有价值。它们不会装点博物馆的展厅。它们不会陈放在玻璃柜里。

这种不对称，傅里叶在研究院的一次会议上曾说得很清楚：

“他们会拿走原件。我们保住副本。副本才是真正的战利品。”

他是站着、面对着那些箱子，毫不迟疑地说出这话的。他没有说出口的——几年后，他才在为《埃及志》所作的笔记中写下来——是这种不对称并非偶然。这是战败者的预防，在战败之前就已经施行。这也许是学者们自始至终真正运用过的唯一一种战略智慧。但随后坐下来时，他自问这是否真实，还是只是人们为了承受自己无力阻止的事而对自己讲的故事。

他们只有五天。

从投降签字到纵队出发，只有五天。不够，却没有人说出来。

这些人在这五天里所做的，与他们所准备的并不相像。他们准备的是论据——清单、备忘录、关于珍奇之物与作品之间、个人财产与研究院藏品之间的法律区分。而他们真正做的，是不说话地干活。没有会议。没有讨论。每个人守在自己的库房里，守着自己的箱子。偶有的交谈也简短而技术：用哪种绳索，每个轮子承多少重量，罐子要裹几层布。

那是整个远征期间最为寂静的五天。

一天晚上，傅里叶去找若卢瓦，同他谈起那条贯穿历史的长链。把埃及的方尖碑搬空的罗马人，劫掠拜占庭的十字军，用珍奇之物填满自己陈列室的国王们。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理由。而受害者，却始终如一。若卢瓦听

着。他没有作出什么实质的回答。傅里叶走了。这场谈话发生，是因为它必须发生。它什么也没有改变。

真正改变了点什么的是，第五天的早晨，当车辆备好之时，没有人下达命令。人们自己走到院子里，自己排好队，自己站进纵队的位置，无需任何人吩咐。三年来，这是学者们头一回表现得像士兵。

纵队开始在院中集结的时候，研究院的走廊里飘着木头、胶水和酒精的气味。若卢瓦最后一次走过各个厅室。墙上还留着三年来占据桌案的藏品的痕迹。罐子曾放过的地方，有一圈圈尘土的印子；若马尔曾钉过测量图纸的地方，有粉笔划的线。梁上留着钉孔，那里曾悬挂过木乃伊，以供解剖绘图。

若卢瓦走进院子。纵队在等候。车辆已经装好。驮畜在清晨的热气中喷着鼻息。

若卢瓦又一次检查，确认他的挎包已牢牢系在分给他的那匹马的侧腹上。

法国将保有的那个埃及，不过是一个人在马鞍上带得走的那么一点。它从埃及拿走的东西，仍留在这里，在那些英国人两个月后将要打开的箱子里。他把挎包的带子挂上肩头。他不打算等纵队的信号，第一个走出了院子。

VI - 向亚历山大进军

7月2日，开始撤离开罗。一万三千名士兵，两百名平民，委员会的全体学者，列成纵队走出城去。有几个人回头望。大多数人望着前方。

傍晚时分，一支奥斯曼巡逻队拦住了纵队的去路。二十名身穿军服的土耳其骑兵，由一位会说法语的贝伊统率。他们来自大维齐尔的营地。

达马将军独自上前交涉。贝伊翻身下马。交谈持续了十分钟。聚在纵队中央的学者们听不见，却看得见手势。贝伊指着北方。达马出示一份文件，大概是与英国人签署的投降协定。

傅里叶走近到能听见的距离。他听见贝伊用法语说：“你们离开开罗。这很好。但你们的箱子留在埃及。”

达马回答了句什么，傅里叶没听清。贝伊坚持道：“这些东西属于埃及。你们是从我们的神庙里、我们的陵墓里拿走的。它们不会离开。”

“先生，我们与英国当局签署了一项协定。这些问题，您应当与他们去谈。”

他朝自己的骑兵做了个手势。二十支长矛举了起来。达马纹丝不动。

“您若试图拦住这支纵队，就等于同时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我想君士坦丁堡并没有这样命令过您。”

贝伊犹豫了。他望着车上的箱子，望着列成战斗队形的一万三千名法国士兵，然后又望向身后空荡荡的地平线。看不到任何奥斯曼援军。

他重新上了马。

“我们陪你们到亚历山大。以便监视。”

“悉听尊便。”

土耳其巡逻队远远地跟在纵队后面，相距一百米，一连跟了两天。骑兵们不同任何人说话。7月5日黎明，他们消失了。达马猜想，他们是回去向大维齐尔复命了。

当晚，若卢瓦问傅里叶：

“您认为他们还会回来吗？”

“奥斯曼人吗？不会。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埃及。他们想知道的是，我们是否真把它搬空了。现在他们知道了。”

“然后呢？”

“然后他们会等着英国人拿走我们的箱子。之后，他们会向英国人讨要同样的东西。这比从我们手里夺要简单得多。”

若卢瓦点了点头。这逻辑无可辩驳。

学者们走在纵队中间，行李放在车上。他们庆幸逃脱了危险，又为离开埃及而悲伤，更为那些藏品担忧。

队伍走得不快。一万三千名士兵带着大车在沙地里行进，本就缓慢，还要时时停下歇息，每当有牲口跛了脚、车轮陷进沙里，便得重新分配负载。

若卢瓦大部分时候步行，以免累着自己的马。每当那匹马在石头上或沙窝里绊一下，他便听见铜筒在挎包里发出沉闷的碰撞声，于是回过头去。

若弗鲁瓦最担心的，是酷热对那些盛酒精的罐子的影响。玻璃遇热膨胀，酒精也是，但两者的速率不同。倘若膨胀造成了细微的裂缝，酒精就会挥发，标本几天之内便会腐坏。他把每个罐子都裹了两层湿布，助手们每逢歇脚就换一次，用的是自己储备的水。

“您在浪费水，”一名发现了这一举动的军官对他说。

“这些标本是无法替代的。水可以。”

军官没有坚持，走开了。七月的酷热里，士兵们正受着干渴的折磨，这个理由并不能令人信服。但若弗鲁瓦继续这样做。

第四天，若马尔的一只箱子在翻越沙丘时从车上滑落，在沙地里裂开了一道口子。人们停了下来。若马尔从马上跳下，推开想来帮忙的士兵，一卷一卷地检查。其中三卷的油布褶皱里沾了一点沙。没有任何东西渗进纸里。若马尔把箱子重新钉好，让人换了种方式装上车，平放着，多加了一道绳子。

“您运气好，”一直看着这一切的傅里叶说。

“这不是什么运气，这是绳子的功劳。”

7月6日黄昏，两名卫兵把一个逃兵带回了营地。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听口音是里昂人，在撤离开罗的三天前逃走的。他们发现他藏在一片棕榈林里，饥肠辘辘，双脚流着血。

达马将军让人把他带进帐中。傅里叶恰好路过，听到了审问。

“你为什么当逃兵？”

“我想留在埃及，将军。我不想回法国去。”

“留下来做什么？”

“干活。也许成个家。在这儿，我能活下去。在法国，我又得回工厂去。”

达马看了他很久，一言不发。

“你知道逃兵会有什么下场吗？”

“知道，将军。”

“你明明知道，却还是逃了吗？”

“我二十三岁。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我学会了阿拉伯语。如今我熟悉开罗，胜过熟悉里昂。回到法国，我能做什么呢？”

达马让逃兵退下，召来了副官。傅里叶听见了判决：鞭笞三十下，然后编回队伍。不处决。逃兵被绑在一只车轮上。鞭子抽响了三十下。那人没有叫喊。

第二天清晨，他随连队行进，衬衫下的脊背布满红色的鞭痕。懂些医术的若弗鲁瓦给了他一罐药膏。

“今晚敷上。这样可以防止感染。”

“谢谢您，先生。”

“您究竟为什么要逃跑？”

士兵迟疑了一下。随后说道：

“因为我不愿看到亚历山大将要发生的事。我们要把自己的发现交给英国人。我曾替若马尔先生把箱子扛到底比斯。我见过我们测量了什么，描绘了什么。而现在，一切都要交出去。我宁愿留在这里。”

若弗鲁瓦没有作答。士兵回到了自己的连队。

当晚，若弗鲁瓦把这番交谈讲给了马塞尔听。

“这个小伙子明白了许多军官至今还没明白的事。我们不是作为胜利者回去的。我们是作为被剥夺者回去的。”

“他明白了。也为此挨了三十鞭。”

“是的。这也是一种明白。”

逃兵随纵队一路走到亚历山大。傅里叶后来得知，投降之后，他加入了英国殖民地步兵。他再也没有回过法国。

7月7日，纵队在三角洲的一个村庄停下歇脚，一场沙暴骤然袭来。士兵们能躲哪儿就躲哪儿，或钻进废弃的房屋，或蜷在翻倒的大车下。沙子并非来自一个方向，而是从四面八方同时涌来，绕着天边旋卷，搜寻每一道缝隙、每一张张开的嘴、每一双半睁的眼。人们用大衣蒙

住脸，隔着布料呼吸。马匹把臀部转向风，紧闭双眼，鼻孔收拢。骆驼跪下身子等待，耐心而漠然，仿佛它们自古以来就一直在等沙暴过去——事实上，也差不多如此。

学者们用毯子和临时搭起的帐篷盖住箱子，花了两个小时顶着风维持这些遮护，十指紧攥着被狂风拽扯的带子。沙子无孔不入。钻进衣服，钻进眼睛，钻进软木塞底下。若卢瓦一手牵着马，另一手按住盖在挎包上的毯子，脸贴着马颈，借此呼吸。

若弗鲁瓦在箱子之间来回奔走，喊出一道道指令，可还没传到该听的人耳中，就被风卷走了。行军之初他就明白，酒精标本罐是他这批收藏的软肋。仅此一处，一次物理上的失守，就足以将三年的心血毁于一旦。若卢瓦的铜筒进了水，不过是图稿模糊；若马尔的卷轴落了沙，那些测量数据费些功夫尚可挽回；可一只玻璃罐在箱中碎裂，酒精淌到其他罐子上，再遇上一盏提灯，整个尼罗河动物群的收藏便要化为烟尘。他下令五十米之内的提灯一律熄灭。众人在绝对的黑暗中摸索着干活，凭箱子的形状，凭它们在拳头敲击下的回响来辨认。

他的两名助手——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两个年轻学生，一路上一直受不了沙漠的酷热——那一夜毫无怨言地干活。每只箱子检查一遍，每条带子勒紧一次，每个瓶塞在黑暗中查验一回。凌晨四点左右，沙暴平息时，若弗鲁瓦的双手仍僵硬地攥着最后一只箱子的带子。

清晨清点损失：若卢瓦的一只铜筒掉了塞子，三张纸上的墨迹略有晕开，一只装鱼的玻璃罐底部出现了细微的裂纹。标本被转移到备用罐中，那是若弗鲁瓦专为这种情形随身带上的。

这不是偶然。这是预见。

7月9日正午前后，纵队遇上一队逃往亚历山大的科普特难民。约三十户人家，驴背上驮满包裹，孩子们赤脚走在沙地里，老人躺在临时扎成的担架上被人抬着。

他们的首领是一位会说法语的神甫，他走近达马。

“将军，我们是在逃避报复。自从法国人撤离开罗，奥斯曼民兵就在焚烧我们的教堂。我们去亚历山大，投靠英国人的保护。”

达马命人分发饮水。神甫谢绝了。

“请把水留给您的士兵。离这里两小时路程就有水井。不过请告诉我，你们走了以后，英国人会保护基督徒吗？”

“我不知道，神甫。这不是我的事。”

“1798年你们向我们许诺宗教自由的时候，这就是你们的事。现在你们要走了，而我们留下。”

达马没有回答。神甫回到了他的队伍中。

马塞尔听完了这番对话。他对傅里叶说：

“我们刚来的时候许诺了许多事。把埃及人从奥斯曼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终结对科普特人的压迫。让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如今我们离去，留下的埃及与我们当初所见的一模一样。或许，还更糟。”

“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留下了些东西。若马尔的测量。若卢瓦的图稿。《埃及志》将会出版。”

“是的。我们留下的是书。而他们，留下来承受报复。”

科普特难民继续向北走去。法军纵队则朝西北方向前进。两队人马在一处岔开的小路口分道扬镳。

整场交谈中一言未发的若马尔，在神甫走远之前问他：

“你们在开罗的教堂，圣塞尔吉教堂，被烧了吗？”

“没有，先生。还没有。但它会被烧的。”

“您怎么知道？”

“因为它总是会被烧。每二十年，每三十年。这就是埃及的历史。你们只是路过。”

行军第八天，他们穿过一座居民已逃散的村庄。房门紧闭，街道空无一人，一间才被遗弃几个钟头的面包铺里飘出热面包的气味。纵队没有停步。士兵们目不斜视地向前走。

几名士兵离开队列。两分钟后，他们从一座院子里走了出来。其中一人抱着一只一米高的陶罐。罐里传出金属物件的叮当声。一名军官把他们喊了回来。陶罐被丢弃在路边。

若卢瓦停下脚步。他拎起陶罐。里面有七枚托勒密时期的青铜币，三只釉砂圣甲虫，还有一件彩绘石灰岩的乌普瓦特护身符。这是一户人家的家底，他们逃走时，把带不走的東西都留下了。

“我们拿它怎么办？”若马尔问道。

若卢瓦把青铜币一枚枚细看，翻过来，在心里为它们断代。从侧面像判断，是托勒密四世或五世。圣甲虫做工精良。乌普瓦特护身符以石灰岩精心彩绘而成，双眼是用红赭石勾勒的。

若卢瓦把它们放回罐中。他将罐子放在最近一座房子的墙脚下，放在阴凉处。放在主人归来时会发现它的地方，如果他还会回来的话。这位置是刻意选定的。不在路边，免得被旁人拾走，而是在墙根的遮蔽下，一处若卢瓦用靴跟轻轻踩出的凹坑里，好让陶罐不会滚动。

“继续走。”

他们重新跟上纵队。陶罐留在了墙边。

抵达亚历山大前的最后一天，他们三年来第一次望见了地中海。几名士兵喊叫起来。学者们默默地凝望。海面上的光与沙上的光不同。更冷，更灵动，是若卢瓦三年前从土伦启程时试图描绘、却始终调不出正确色彩的那种地中海蓝。

“海，”傅里叶说。

这两个字本身并无特别之意。傅里叶想说的是：而现在，轮到英国人了。

7月13日清晨，在距亚历山大二十来公里处，两名骑马的英国军官赶上了纵队。他们来自哈钦森将军的营地，带着一道签署过的任务令：在法军进城之前检查其行李。

达马以冰冷的礼貌接待了他们。

“先生们，我们将带着封好的箱子进入亚历山大。检查将在梅努将军正式投降之后进行，而不是之前。”

英国中尉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名叫桑顿，他坚持道：“我们奉命核查你们是否携带弹药和军用物资。这只是例行手续。”

“这例行手续得等到协定签署之后。在那之前，我的车不会打开。”

桑顿打量着车上排成一列的箱子。他看得见箱侧漆上的编号：I，II，III……直到 LXIII。六十三只箱子，盖着帆布。

“将军，如果您拒绝检查，我们可以把你们进入亚历山大的日期推迟好几天。”

“那就推迟吧。我们就在这里扎营等着。”

另一位年纪稍长的英国军官插话道：

“中尉，算了。他们是学者，不是走私贩。他们的箱子里装的是石头和图稿。哈钦森将军清楚这一点。”

桑顿犹豫了一下，随后敬了礼，与同伴一起离去。

傅里叶问达马：

“您认为他们真的会拦住我们吗？”

“不会。他们是想看看我们的反应。看我们是否有什么要隐瞒。现在他们知道了，我们会捍卫自己的箱子。”

“这是件好事吗？”

“看情况。如果汉密尔顿是个谈判者，那就是。如果他是
个掠夺者，那就不是。”

纵队继续行进。十一点钟，亚历山大的城墙出现在地平线上。英国的护卫舰停泊在港内。它们厨房里的炊烟在无风的天空中笔直上升。

这一夜，他们在距亚历山大两小时路程处扎营。地平线上可以望见城里的灯火。还看不出轮廓，只是一片低低的、弥散的亮光。在远征之初的头几周，地平线上出现这样的亮光，意味着一座有待攻取的城市，一幅有待绘制的地图，一份有待完成的工作。今夜，它意味着汉密尔顿。

傅里叶借着一盏压低的提灯，重读若马尔备忘录的头几页。论据是站得住脚的。让他无法入睡的并不是论据。而是汉密尔顿的训令中是否留有解释的余地。一个训令严苛的外交官不会听取论据。他只会记录在案，转呈伦敦。一个有回旋余地的外交官则可能被说服。在与他当面对坐之前，傅里叶无从知晓。

若弗鲁瓦自从扎营以来已把箱子查验了两遍。瓶塞都很牢靠。除了睡觉，没有别的可做了。若马尔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份清单，列出他打算力争归入科学仪器的物件，而不是可供扣押的珍玩。共三十二项。他合上笔记本，睡着了。

营火熄灭之后，若卢瓦仍坐在帐外。天空晴朗。他的挎包里装着那些笔记本。明天，是英国人，是汉密尔顿，是备忘录，是关于什么属于谁、依据哪一条款的种种争论。

纵队于 1801 年 7 月 14 日进入亚历山大。自开罗起，行军十二天。梅努仍据守着这座城市，被等待他投降的英军围困。学者们被安置在港口的仓库里，箱子堆在四周。外面，护卫舰停泊在锚地。关于收藏品的谈判不会现在进行。要等梅努投降之后，等英国人有能力提出要求的时候。七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等待。梅努在谈判。英国人在耐心等候。学者们守着自己的箱子。

第四章：溃败与归途

I - 大型古物

1801年9月3日，亚历山大投降协定签署的次日，英国专员威廉·理查德·汉密尔顿来到法国学者们下榻的司令部，同行的还有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他是哈钦森将军指派来主持藏品实物勘验的古物学家。

汉密尔顿是埃尔金勋爵的秘书，年方二十四岁，在剑桥受过古典古物学训练，负责统筹外交谈判。克拉克则受命逐件辨认并登记法方的藏品。他们带着一名书记员和两名士兵前来，士兵们捧着空白的登记簿。

在这些谈判中，若卢瓦和傅里叶正式代表委员会。若马尔负责捍卫测绘图件和测量仪器。他已预想到对方的所有论点。

与汉密尔顿首次会面的前一天，他把四月间起草的备忘录改写成了法律措辞。他通宵工作。预先设想，就是做好不被动挨打的准备。这是他在综合理工学院学到的。在埃及，每当需要为一项受到质疑的测量辩护时，他都一再验证了这一点。法律论证与数学论证遵循同一种逻辑：胜负在事前决定，而不是在辩论之中。新的版本把物品分为三类。

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古物，即远征之前就已存在、其在埃及的存放与法国人的任何工作都无关的物品。这一类可以扣押，无须争辩。

第二，智力成果，即委员会成员完成的测量、计算、观察和绘图。这些成果在被创作出来之前并不存在。不能将它们等同于拾得之物。

第三，灰色地带，即从法国带来的科学仪器。它们既非古物也非智力成果，而是工作工具，一旦被扣押，委员会日后的工作能力就会被剥夺。

“这份备忘录非常清晰，”傅里叶读到它时说，“问题在于，汉密尔顿是否会为这份清晰所动。”

“如果他不为所动，”若马尔补充道，“那是因为他的训令要求他无视法律上的区分。那样的话，任何论据都不会奏效。”

“您太悲观了。”

“不。我只是精确。”

傅里叶笑了。

克拉克走进仓库的院子。他在院子中央站定，缓缓转身，目光环视一周，数着箱子。六十三只。外加未装箱的物件。雕像、石棺、靠北墙堆放的石柱。他的助手是一位名叫约翰·马滕·克里普斯的剑桥青年，取出笔记本，开始记录。他什么都记。箱子的数目，它们的大致尺寸，箱上捆绳的状况。

若卢瓦观察着克拉克观察藏品的样子。这是第一次有英国人见到委员会三年来所汇集的全部成果。克拉克什么也没有流露。既不惊讶，也不满意。他在清点。先清点，再估价，然后谈判。

“先生们，”克拉克转向若卢瓦和傅里叶说道，“根据9月2日签署的投降协定第十六条，我奉命接收阿拉伯手稿、雕像以及为法兰西共和国所汇集的其他藏品，它们现已成为公共财产，由盟军将领处置。”

随后的沉默持续了三秒钟。若卢瓦缓缓放下手中的登记簿。

“全部吗，克拉克先生？您指的是我们三年来收集的每一件物品、每一幅图稿、每一件标本？”

“第十六条就是这么说的。”

“第十六条，”若卢瓦语气冷硬地答道，“说的是为共和国所汇集的藏品。不是我们的智力成果。不是我们的科学仪器。也不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用自己的钱购得的藏品。”

克拉克翻开自己的登记簿，停在第一页。稍稍退后站着的汉密尔顿，抢在克拉克开口之前插了话。

“先生们，”汉密尔顿说，“没有人否认你们工作过。没有人否认你们成果的价值。但投降条款是明确的。克拉克先生将逐件勘验你们的藏品。你们将有机会就每一类物品陈述你们的论据。我们会倾听。我们会公平裁断。”

傅里叶开了口。他的声音比若卢瓦的更沉稳，但同样坚定。

“既然如此，汉密尔顿先生，让我们确立一套工作方法。我们将提议把物品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您逐类审议我们的论据。我们不会拒绝任何检查。但我们要求每一次扣押都要有正当理由。”

汉密尔顿表示同意。

“这很合理。克拉克先生？”

克拉克合上了笔记本。

“我接受这一程序。不过我要提醒你们，我的训令很严格。对于第十六条，我没有任何权限做出超出其明文规定的解释。”

若卢瓦抱起双臂。

“而我们，克拉克先生，不打算在没有逐件争辩的情况下，任由你们没收我们三年的生命。”

与克拉克和汉密尔顿对峙的三个星期里，每当有争议的物品需要科学鉴定——一张地图、一份测绘、一件仪器——被叫来的总是若马尔。他话不多，出示自己的文件，答话极为简省，令习惯了法国人那些更富修辞色彩的论辩的克拉克颇为困惑。这个角色比他自己料想的更适合他。他发现，谈判与测量并没有那么不同。必须恪守事实，不让步于无法核实的东西，并且知道什么时候沉默胜过言辞。

“您的这位同事很难对付，”克拉克有天晚上对若卢瓦说，“他什么也不让步，也什么都不夸大。这在谈判中很少见。”

“他是数学家。”

“看得出来。”

9月4日清晨，克拉克带着几名助手再度到来，开始勘验研究院的藏品。汉密尔顿以观察员的身份在场。

最先审查的一类，是纪念碑式的大型古物。罗塞塔石碑，花岗岩和玄武岩的石棺，巨型雕像，从神庙上剥离下来的浅浮雕。对于这些物品，法国学者们提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个人所有权论据，因为这些纪念物是由委员会发现的。

“我们并不质疑你们对这些大型古物的法律权利，”傅里叶说，“我们只是希望历史记住，发现它们的是法国委员会。而不是英国军队。”

汉密尔顿表示同意。

“我向你们保证，大英博物馆会承认这些古物是由你们的委员会发现的。”

克拉克编制大型古物的清单，汉密尔顿逐条在登记簿上核准。若卢瓦站在他们身旁，看着每一件物品被带走。

首先是罗塞塔石碑。

1799年7月，法国士兵在罗塞塔挖掘工事时发现了它，它被嵌在一座堡垒的地基里，充作建筑材料。那是一道公元前196年的王室诏令，以三种文字刻成：上方是象形文字，中间是世俗体，下方是希腊文。那可以读懂的希腊文。以及有待破译的其余部分。

克拉克把罗塞塔石碑记入扣押登记簿。待实际转运时，它将被装箱。

马塞尔看着克拉克在登记簿上书写。笔尖刮过纸面，发出干涩而决绝的声响。每一个字母都是钉进棺材的一枚钉子。“罗塞塔石碑。黑色玄武岩。三语铭文。依据1801年9月《亚历山大协定》第16条扣押。”

马塞尔什么也没说。1799年7月石碑被发现时，他曾整整两夜仰面躺着，双臂举过头顶，轻轻拍打湿纸以制作拓片。他的肩膀疼了一个星期。他的手指许久都还能闻到印刷油墨混着松脂的气味。那气味刺鼻而黏腻，即使洗了三遍手也不肯散去。

他还留有二十五份完整的拓片，存放在一只扁平的箱子里，夹在吸水纸之间，保护得很好。其余的已被寄往欧洲各地。每一个符号，每一道裂纹，每一处表面的不平，都被复制下来，其精确程度是最优秀的绘图师也无法企及的。克拉克可以拿走石碑。马塞尔决心保住文本。

若马尔站在他身旁，双拳紧握。指节发白。他没有看石碑。他看着克拉克。

傅里叶则在记笔记。他已经在盘算，作为对这第一次让步的交换，能谈下些什么。此处有所失，别处有所得。

若卢瓦注视着克拉克，神情淡然，像一个刚丢了一枚棋子、却保住了全盘计划的棋手。他在心里早已接受了石碑要被带走的事实。重要的不再是留住它。而是抢救尚可抢救的东西。图稿。笔记本。马塞尔的拓片。若弗鲁瓦的收藏。真正的战役将在那里打响。

克拉克从登记簿上抬起眼来。

“石碑将在实际运往港口时装箱。在此之前，它留在这里，由英国人看守。克里普斯先生，派两个人站岗。”

马塞尔转过身去。他不愿看见英国士兵在罗塞塔石碑前站岗。这未免有些小气。可他控制不住自己。

这块石头，他触摸过。他熟知它的每一处粗糙，表面的每一粒纹理。他知道它哪里略微光滑，那是古人的手摩挲过的地方，也许是两千年前诵读它的祭司。他知道它哪里粗糙，那是它被打碎、又被用作奥斯曼堡垒地基的地方。

若卢瓦闭上眼睛片刻。它是布沙尔的部下发现的，由马塞尔拓印，登录在委员会的册簿上。几天之后，四名英王陛下军队的士兵就要把它据为己有。

这与法国在意大利的所作所为并无不同。与罗马人在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也并无不同。这条链条很长。

克拉克随后在登记簿上写道：“罗塞塔石碑，黑色玄武岩，1801年9月让与英国军队。1799年由法国远征军发现。”

若卢瓦看着。发现。不是夺取。不是从墙里抠出来。是发现。

接着是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他是埃及本土血统的最后一位法老，于公元前 360 年至 342 年在位。绿色角砾岩冰凉。若卢瓦初次来看时，曾把手伸进里面，伸到本该安放遗体的地方。棺底光滑平整，柔滑如金属。一座为接纳亡者而造的坟墓，亡者却从未来过。他的统治被波斯人的第二次入侵打断。无人知道他死于何处，遗体是否曾被运回。这具石棺大概是在他出逃之前备好的，从未派上用场。它在亚历山大的一座清真寺里被发现，在那里被当作水池使用。棺盖和棺壁上的装饰，沿用了《阿姆杜阿特》的若干段落，即太阳穿越冥界十二时辰的夜间旅程。若卢瓦曾在国王谷临摹过同样的场景。在这里认出它们，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同样的诸神，同样的旅程，镌刻给一位还没来得及在这具石棺里死去的国王。

克拉克仔细查看。他问起重量。

“长三米多，重达数吨，”若马尔补充道。

“它的历史价值呢？”

“这是为埃及最后一位法老备下的墓。它从未被使用过。这或许是我们全部收藏中最动人的一件。一座空墓，属于一位出逃的国王。”

克拉克在登记簿上记下，没有发表评论。

还有一尊灰色花岗岩的阿蒙大祭司像，与真人等身，双手在身前合拢，是神明仆人永恒的姿态，若卢瓦在上埃及的神庙里见过它被复制几十次。还有一只巨大的花岗岩拳头，是一尊王像的残片，其余部分从未被找到。若马尔估计，完整的雕像应有十二至十五米高。单是这只拳头，就已到一个站立的人的肩部。

随后是石碑，即石灰岩和玄武岩的纪念铭文，刻有王名圈和象形文字。总重量相当可观。

“这些物品，”汉密尔顿宣布，“将保存于大英博物馆，向全世界的学者开放。你们的科学贡献将得到承认。标签上将写明：‘由法国远征军发现，亚历山大投降时让与英国军队。’”

9月4日的上午，大型古物的问题已经有了定论。罗塞塔石碑已登记在册。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阿蒙太祭司像、石碑——全都登记在克拉克的簿子上。剩下要捍卫的，是其余的一切。若卢瓦被过去几周耗得精疲力竭，却怀着一种经远征岁月淬炼的决心。

“我准备好讨论一切。但我要提醒你们，没有对每一类物品的事先讨论，我不会接受任何扣押。我们有的是时间。投降协定给了我们撤离之前的几个星期。”

一直默默听着这番交锋的汉密尔顿插话了。他宁愿谈判，也不要粗暴的对抗。克拉克负责勘验，有争议之处由他裁断。双方摆出各自最初的立场，辨明哪些方面一致、哪些方面分歧，并商定了一份工作日程。就这样，两个国家之间关于文化遗产如何分割的、最漫长也最复杂的一场争论开始了。

在仓库后面的院子里，罗塞塔石碑在英国人的看守下等待着。这事在一个上午就定下了。两千年，一个上午。

9月4日晚上，法国学者们聚在仓库旁的一间厅室里。屋子的天花板很低，摆着一张桌子和几把不成套的椅子。外面听得见英国士兵站岗的声响。武器碰着背带，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

傅里叶提出了那个没人愿意说出口的问题。

“大型古物已经丢了。罗塞塔石碑，石棺，雕像。现在必须保卫那些还保得住的东西。”

若卢瓦望着他，没有作答。马塞尔立刻开了口。

“我的拓片。这没得商量。我有二十五份罗塞塔石碑的完整拓片。”

“博物学的收藏也一样，”若弗鲁瓦补充道，“每一件标本我都是冒着性命得来的。每一条在沙漠里捉到的蛇。每一只在四十度高温下采集的昆虫。必要的话，我会躺在箱子前面。”

傅里叶叹了口气。他早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应。他了解自己的同僚。每个人都深信，自己的贡献才是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

“先生们，”他字斟句酌地说，“让我们现实一点。大件已经被带走了。汉密尔顿有权利，也有实力。我们有耐心，也有计谋。我建议把力量集中在仍可守住的东西上——那些在智识上无可替代的东西。图稿。笔记。手稿。”

若卢瓦猛地站起身。椅子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

“不。”

若卢瓦站着，双手平放在桌上。

“不，”他重复道，“我们什么都不牺牲。我们要捍卫一切。每一件物品，每一幅图稿，每一件标本。克拉克必须为每一次扣押说明理由。他必须为每一次拿取提出论证。我们要用细节、类别、法律上的例外把他淹没。他想要全部？那他就得把全部都谈一遍。一件一件地谈。”

若马尔表示赞同。

“若卢瓦说得对。如果我们一上来就让步，就等于发出信号，表明我们接受扣押这一原则。之后，克拉克就会来

取走其余的一切。必须处处坚守，只有在再也无法抵抗的时候才让步。”

若弗鲁瓦抱起双臂。

“具体说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加抵抗，任由克拉克拿走剩下的东西？”

“正是如此，”若卢瓦说，“我们为一切而战。该输的我们认输。但我们要让每一次让步都付出代价。汉密尔顿会记得，我们没有白白送出过任何东西。”

傅里叶望着若卢瓦。他明白其中的逻辑。这不是一种求胜的策略，而是一种捍卫尊严的策略。他们注定要输。但他们要站着输，守住每一寸阵地。

“好吧，”傅里叶说，“我们捍卫一切。但我们要保持协调。谁也不许在角落里单独谈判。每一个论据，在送到汉密尔顿面前之前，都要先过这张桌子。”

其他人点头同意。马塞尔开了口，声音更轻柔了些。

“万一全输了呢？万一汉密尔顿连拓片也扣押了呢？”

若卢瓦重新坐下。他已恢复了平静。

“不会全输的。汉密尔顿不是掠夺者。他是个外交官。他有训令，但也有公平之心。凡是在法律上站得住脚的，他会让步。我们要做的，是让我们的论据无可争辩。”

随后的沉默便是默许。他们达成了一致。他们要捍卫一切。一起。

II - 得以保全的收藏

学者们的个人科学仪器——天文望远镜、大地测量经纬仪、气压计、温度计、精密天平、显微镜——毫无争议地被认定为不可扣押的私人财产。汉密尔顿明白，这些

仪器与古埃及毫无关系，是学者们的职业工具。至于其余的一切，英国人都将逐项细究。

9月9日，克拉克勘验了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博物学收藏。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先生，”克拉克说，“我奉命检查您的标本。请您行个方便，让我查看您的箱子。”

若弗鲁瓦的反应与若卢瓦和傅里叶不同。

“你们休想碰这些收藏，”他一边喊，一边挡在士兵和他的箱子之间，“每一件标本我都是冒着性命得来的。每一条蛇，每一只在四十度高温下采集的昆虫。你们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一切都烧掉。”

“您是以委员会正式成员的身份采集的，”克拉克说，“因此它们是法国的公共财产，因此也就是英国的战利品。逻辑链条就是这样。这不是我发明的。”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驳斥了这个论点。

“你们想窃取我的劳动成果，去充实你们的博物馆。而你们自己连一点探索的努力都没付出过。你们爱怎么称呼都行。我称之为盗窃。”

“我不信，”克拉克说，“您不会毁掉三年的心血。”

若弗鲁瓦明白克拉克不相信他。他穿过房间，打开一只装干制标本的箱子，掏出一只火绒打火机，点燃了它。火苗离干燥的稻草只有十厘米。

“我不是虚张声势。再走一步，我就点火。你们带回伦敦的只会是灰烬。”

克拉克望着火苗。这位博物学家二十九岁，手很稳。他后退了一步。让若弗鲁瓦带着他的玻璃罐离开，总好过带着一堆灰烬回伦敦。

“您的激情令我敬重，”克拉克一边后退一边说，“尽管您的手段颇具戏剧性。如果这些收藏能在法国保存下来，普世的科学将从中受益。”

“您把自己的收藏守得很好，”当晚若卢瓦对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说，“您最初的抵抗创下了一个先例，对于大型古物，我们或许本该效仿。”

“大型古物太显眼，太引人注目了。我那些装鱼的玻璃罐，英国军官们并不感兴趣。有时不被理解反而是一种优势。”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博物学收藏问题上的胜利，对其他谈判产生了积极的连带效应。学者们明白了，只要坚定而有理有据地抵抗，是可以取得成果的，前提是选好自己的战场，不在次要的问题上耗尽力气。

受这一榜样的鼓舞，若卢瓦在委员会图稿的出版问题上进一步施压。一封波拿巴的信于9月10日抵达亚历山大，距投降协定签署已过去八天。信是春天在巴黎写的，经外交邮路，通过奥斯曼的中间人，辗转了数月。傅里叶在临近中午时收到了它，当时克拉克正在查验玄武岩石棺。

信很短。波拿巴是以第一执政的身份写的，而不是以将军的身份。头衔变了，语气也变了。他在信中称赞了委员会的工作，表示相信委员会有能力抵御英国人的要求，保住收藏，并指出《埃及志》将在执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出版，并在末行添了一句：巴黎正等着他们回去。

巴黎正等着他们回去。傅里叶把这句话读了三遍。这不是残忍，波拿巴并不知道，一边看着被英国人看守的罗塞塔石碑，一边读到“巴黎在等待”，是什么滋味。这也不是漠然。这是未来，是从巴黎望出去的未来。而现在，是在此地。这两段时间互不相通。波拿巴没有写：为你

们失去的收藏，我深感遗憾。他没有写：我会换一种做法。他写的是：巴黎在等待。仿佛这里发生的一切——这三年，这些死者，克拉克刚刚记入登记簿的罗塞塔石碑——都只是某件将在那边开始的事情的序曲。

傅里叶把信折好，塞进了马塞尔装拓片的文件夹里。它将与它同行。他不确定到了巴黎之后该拿它怎么办。多半什么也不会做。没有人会回复第一执政的来信，对他说您的措辞在我看来有些轻率。

他回到谈判中。克拉克已查验完石棺。若卢瓦要求不受限制地在法国出版委员会的图稿，这等于要求汉密尔顿放弃英国对埃及古物图像传播的一切控制。

汉密尔顿犹豫了。这样的让步幅度太大。但他同时也明白，拒绝委员会出版自己图稿的权利，在法理和道义上都站不住脚。他答应了，唯一的条件是，每一幅已出版的图版都要寄一份副本给大英博物馆存档。

“每一幅图版寄一份副本，”若卢瓦说，“这不成问题。无论如何，为了商业发行，我们都需要多份印本。”

这项协议保证了集体编撰的《埃及志》得以出版，同时也为德农的《上下埃及游记》开辟了道路。德农 1799 年便已回到法国，他将于 1802 年让这部书问世，那时《埃及志》尚未完成，而这部《游记》将成为关于古埃及的第一部大获成功的出版物。

植物标本集的问题引发了一场附带的争论，没有博物学收藏之争那么戏剧化，却也揭示了这场谈判的利害所在。委员会的植物学家们汇编了收有数千件埃及植物标本的标本集。沙漠植物，尼罗河植物，开罗园圃里栽培的品种。

克拉克想扣押其中的一半。植物学家们辩称，这些标本集构成连贯的系列，将其拆分会大大降低其科学价值。

一份被拆散的标本集，无法进行完整标本集才能开展的比较研究。

汉密尔顿坚持己见。学者们只能接受。

在若弗鲁瓦·圣伊莱尔那场戏剧性的对抗解决了博物学收藏的问题之后，克拉克转而审查最微妙、最含糊的一类：法国学者们声称是用自己的钱，从费拉或古董商那里购得、而非由委员会正式发现的小型古物。

这些小型古物包括数以百计的各种物件。彩绘木质和施釉砂质的丧葬俑，半宝石质的护身符，刻纹圣甲虫，纸草残片，小型青铜像，陶器，珠宝，古代工具，纺织品残片。法国学者们辩称，这些物件是他们在当地市场上自行购得的，属个人的商业购买，而不是官方的考古发现。

克拉克对这样的分配持怀疑态度。

“要证明每一件东西是买来的而不是挖出来的，根本不可能，”他说，“想必诸位并没有留着在集市上购物的全部收据。”

傅里叶承认这确有困难。

“我们并非始终都有严谨的账册。但要把这些藏品逐件分开，得耗上好几个星期。我提议折中一下：由我们挑出一半最想优先保留的小件古物，另一半归你们，带回大英博物馆。”

汉密尔顿觉得这个提议坦率，又能免去为每一件物品无休止的争执，便接受了这一折中。

“您的提议在我看来合情合理。就这么办吧，这样也快些。”

接下来的几天里，法国学者们忙着挑选要留下的物品，优先选取科学文献价值最高或历史意义最重大的那些。他们留下的主要有：几份写有象形文字和世俗体文字的纸草文献，出自同一座墓葬的成套随葬俑，以及刻有不同法老王名圈的圣甲虫藏品。

汉密尔顿这边，则挑选了视觉上最为惊人、足以打动大英博物馆观众的物品：埃及神祇的青铜像，金银首饰，以青金石和红玉髓精雕细琢的护身符，还有品质上乘的彩绘陶器。

这一划分虽然让法国失去了许多珍贵的物品，但毕竟保住了相当大一部分小件古物，它们日后将充实 1827 年落成的卢浮宫埃及博物馆的馆藏。

学者们收集的木乃伊引出了一个特别的问题。汉密尔顿主张，木乃伊显然属于可以扣押的埃及古物。法国学者则坚持认为，木乃伊主要具有解剖学上的科学价值，而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博物馆价值；留在能够研究它们的法国博物学家手中，更有益于科学。

汉密尔顿经过思量，同意了一项安排：法国学者可保留几具动物木乃伊和一具品相平平的人类木乃伊，供解剖研究之用；英方则取走保存最完好的王室或贵族木乃伊，用于公开展览。

“这样我很满意，”汉密尔顿合上笔记本说，“每一类物品，我们都找到了可以接受的办法。”

傅里叶回答时语气干涩而不失礼数，却掩不住其中的苦涩。

“我们之所以肯合作，是因为别无选择，汉密尔顿先生。强权在你们一边。不过，请允许我正式记录在案，留给委员会的档案：我们认为这次扣押是对一项法国科学成

果的不公正掠夺，而这项成果是以三年的劳作与苦难换来的。”

汉密尔顿低下头，没有反驳。这样的抗议他已听过多次，也知道它会被送往巴黎，写进回忆录，或许有朝一日还会被公之于众。他并不想抹去法国人的怨愤，只求执行自己的训令，同时把不必要的损害降到最低。

此后几天都用于小件古物的实际清点。每件物品同时登记在两份清单上，一份由一名英方秘书记录，另一份由马塞尔记录。每日傍晚核对两份清单，以确保没有物品被遗漏，也没有未经双方同意就被挪动。这套规程虽然繁琐，却足以保证透明，避免日后的争议。

象形文字铭文拓片的问题，事实证明争议稍多一些。汉密尔顿主张，这些拓片是埃及铭文的复制品，因此可以被视为属于第十六条所提到的“其他藏品”一类。

马塞尔早已周密准备好了自己的辩护，他有力地驳斥了这种扩大化的解释。

“这些拓片不过是纸和墨，”他说，“不是可供展出的古物，只是语文学家的工作文件。大英博物馆也不知道拿它们做什么。留给我们吧。”

汉密尔顿思索片刻才作答。

“你们的笔记是你们的笔记。我在这里要找的不是这个。”

他干脆利落地合上了笔记本。

“留着吧。原件在我们手里。”

汉密尔顿承认这一论据合乎逻辑。拓片将留给法国人。

马塞尔从罗塞塔起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他为此花了心血。

三个星期下来，委员会保住了最要紧的东西。学者们将带回法国的，并不在那些大木箱里，而在铜管和皮夹之中。它们在船舱里分量不重，在往后的几十年里，分量却要重得多。

手稿和科学笔记的问题，解决得对法国人更为有利。汉密尔顿毫不费力地承认，这些文件属于个人的智力成果，与实物性的埃及古物截然不同，因此不能作为战利品扣押。

9月15日，汉密尔顿要求查看若卢瓦及其画家同僚在远征期间绘制的全部图稿。若卢瓦呈上了他的速写本。

“汉密尔顿先生，这些画在我落笔之前并不存在。法老时代的雕像没有我也存在，我的画却只因我而存在。没收一件个人的艺术作品，不是征用，而是盗窃。”

汉密尔顿久久地审视着那些画。

“您的画是您的作品，不是古物。请留着。我只要求五十来份摹本，送往大英博物馆。原件仍归您。”

要交出的摹本由若卢瓦亲自挑选。他双手按在速写本上，垂着眼。仅此而已。

古钱币的问题险些重新点燃一场原以为已经平息的冲突。委员会的学者们合计拥有数百枚希腊、托勒密和罗马时期的钱币，采自三角洲和尼罗河谷的各处遗址。汉密尔顿主张这些是可以扣押的古物。学者们则辩称，这是他们为自己的钱币收藏而进行的个人购买。

“每一枚钱币都是某位学者买的，”马塞尔说着拿出一本笔记，他以令人佩服的先见之明，在上面记下了每一次购买的价格、日期和卖主姓名，“这些记录证明了购买行为的私人性质。”

汉密尔顿仔细查看了那本笔记。这份记录显然早于谈判就已开始。它不可能不是为了眼下的需要而伪造的文件。他接受了这一论据，把钱币留给了学者们，只有十五枚左右的珍品除外，马塞尔同意让给他，条件是为最庞大的那些箱子提供额外的运输便利。

这类零星的小小妥协，正是汉密尔顿的行事风格：对训令的大原则毫不松动，对次要的细节则灵活变通。

若卢瓦得知这一决定，心存感激，却没有表露出来。这件事让他想起，汉密尔顿虽然肩负严苛的使命，却始终保有一种公道之心，这使他有别于谈判之初自己所担心的那种粗暴的没收者。

“我宁愿冒着漏掉几件东西的风险，也不愿开创任意妄为的先例。我们在这些谈判中的信誉，建立在公正之上。若是法国人怀疑我们在规则之外没收财物，往后我们就得不到他们的合作了。”

III - 掠夺的伦理

9月17日清晨，若卢瓦独自走出门，来到亚历山大的街上。他没有什么特别要画的，只想走一走。谈判持续了十四天。会议记录几天后就要签署。此后，便再没有什么需要捍卫的了。

他穿过商人区，没有停步。城市依旧。最让他触动的正是这一点：城市依旧，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井边的妇人，窄巷里的骡子，热面包和茉莉花的气味。

他在一家装订匠的铺子前停下。那人坐在门口干活，缝着一帖帖书页，动作缓慢而细致，那是一双从小就熟知这一动作的手。他抬眼看了看若卢瓦，又低下头去继续手上的活，并无特别的好奇。又一个法国人。三年里他见过不少。往后还会见到别的人：奥斯曼人，英国人，

马穆鲁克。这座城市有自己的节奏，不受从它身上踏过的军队左右。

若卢瓦看他干活。磨旧的工具，不假思索的动作，被岁月的摩擦磨得光亮的工作台。罐里加热的胶散发的气味飘在街上，甜甜的，微微有些呛。这个人做这行已经很久了。军队来来去去，簿册长存。

若卢瓦没有同他说话。没有翻译在旁，他只是站着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走向港口。英国舰船就停在锚地，静静等候。码头上箱子越堆越多。大件古物一周后启运。他自己稍后也将乘其中一艘船离开。挎包里是他的速写本。英国人的箱子里，则是罗塞塔石碑和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

他想到了那位装订匠。装订匠做簿册，他则把簿册填满。簿册将去巴黎，箱子将去伦敦。一百年后，两百年后，会有人翻开这些簿册，看到 1801 年的埃及：神庙的石柱和王室的陵墓，却没有装订匠，也没有那条街。那是若卢瓦自己选择描绘的。而他舍弃的东西——日常的城市，普通的人们，双手的劳作——将无处可寻。

他画下了港口、码头和锚地里的船。随后，在纸页的一角，凭着记忆，画下了装订匠按在书帖上的双手。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因为那双手哪里也不会去。它们将留在这里，留在这条街上，继续做簿册。它们至少值得有一笔。

他端详着这幅画。那双手，敏捷而稳当，老茧长在恰当的位置。那双手从未离开过这条街，也无须离开。那双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手艺学得那么早，已经成了身体本身。他想到自己那双沾满墨迹的手。想到阿卜杜拉·伊本·优素福，他懂运河，靠的不是测量数据。想到那位科普特工匠，他的手懂得纸草。这样的手不会被装进

任何一只箱子。它们将留在这里，继续做它们一直在做的事。

当晚，汉密尔顿派人送来一张便条，请求次日来和他们共进晚餐，不带秘书。若卢瓦把便条拿给傅里叶看。

“他一个人来，”傅里叶说，“不带秘书。”

“这意味着他是作为一个人来的，不是作为专员来的。”

傅里叶放下便条。他懂这类举动。去对手家中，不带秘书，不讲礼仪。想说些无法写进报告的话的人，才会这样做。他会代表众人应下。

9月18日晚，汉密尔顿如约来到法国人的住处。他是一个人来的。

桌子是一扇架在木架上的门板。面包，山羊奶酪，还有一瓶本地产的葡萄酒，谁也没有去评头论足。傅里叶在座，若弗鲁瓦在座，马塞尔也在座。屋外，士兵们正把箱子搬上大车。能听见木头擦着木头的声响。

他们默默地吃了一阵。要求登门的是汉密尔顿。他们在等着知道原因。

“奈科坦尼布二世的石棺，”他终于开口，“就是你们在亚历山大研究过的那一具。明天启运去港口。我想当面告诉你们。”

若卢瓦慢慢放下酒杯。奈科坦尼布的石棺是绿色角砾岩的，长逾三米，通体刻满《阿姆杜阿特》的铭文。他曾整整花了一天时间描绘它。他记得光线落在角砾岩上的样子。不是反光，而是吸收，仿佛石头为自己留住了光。那些象形文字刻得极为精准，历经二十个世纪，仍能分辨出鸟的羽毛和蛇的关节。他为这项工作付出了整整一天。

“这具石棺，”傅里叶说，“在我们之前就在亚历山大了。阿拉伯人把它改作喷泉的水池。是我们把它从那里弄出来的。是我们研究了它。”

“我知道。我们在波科克旅行记的档案里，也发现它曾被当作喷泉。这正是我想当面告诉你们的原因之一。移动过它的，你们不是头一批。”

屋外，一只箱子撞上了另一只。有人用英语骂了一句。

“您知道让我不安的是什麼，”若卢瓦说，“不是你们拿走它，而是一百年后，一个埃及人要想看到自己某位法老的石棺，得跑到伦敦去。”

汉密尔顿望着自己的酒杯。傅里叶则望着那个望着酒杯的汉密尔顿。

“如果一百年后有个埃及人想看这具石棺，”汉密尔顿说，“那是因为有人教过他这是什么。而那个人多半是依据你们的图稿和测绘来研究的，而不是依据石头。”

“这不是回答。这是辩解。”

“是的。我们对自己在这里所做之事给出的一切回答，都是如此。”

一时之间，没有人动筷。马塞尔给自己斟满酒，那份精确，一如他做每件事时的样子。

“这具石棺，”马塞尔头也不抬地说，“在阿拉伯人之前就已经几度易手了。它从未盛放过奈科坦尼布的遗体，最后流落到亚历山大。有人把它当作浴缸。阿拉伯人把它改成喷泉。我们测量了它，描绘了它。你们要把它展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占有埃及的方式。”

“而埃及自己，却没有说话的份。”

若弗鲁瓦望着天花板。

“又不是埃及邀请我们来的。”

谈话刚刚触及了汉密尔顿未曾预料的东西。他想到自己的指令：扣押古物，维护公平。指令里没有提到埃及人。没有人想过把他们写进去。他没有回答若弗鲁瓦。那不是傲慢，而是诚实。

“如果有朝一日埃及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傅里叶接着说，“并索要它的财物，大英博物馆会如何回答？”

“回答的不会是我。会是另一个人，在另一种情势之下。我无法为下个世纪作出承诺。”

傅里叶记下了这个回答。它是诚实的，也是不充分的。但那天晚上，处在汉密尔顿这个位置上的人，也只能说这么多了。

几年之后，在为《埃及志》撰写序言的笔记中，他会重新找到这句话。他不会把它写进去。它过于私人，与一个没有任何官方见证人的夜晚联系得太紧。但在撰写《埃及志》序言时，他会想起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第一个起身。他为这顿晚餐道了谢。走到门口，他停住了脚步。

“如果哪位法国学者想到伦敦查看这具石棺，我会为他提供方便。”

若卢瓦目送他离去。屋外，士兵们仍在装货。亚历山大的夜色从窗口涌进来。阿拉伯语的人声，一条狗，港口的气味。

“我们对他说的每一件事，他都认了我们有理，”马塞尔说，“可石棺他还是拿走了。”

第二天早晨，若卢瓦穿过院子时，奈科坦尼布的石棺已经不在那里了。原地只剩沙地上一道长方形的印痕。

9月22日一大早，一位埃及商人来到仓库门前，请求面见汉密尔顿。

他名叫马哈茂德·塔维勒。他在亚历山大的科普特区开着一家古董店，离港口只隔两条街。他十五岁的儿子陪着他，充当翻译。若卢瓦恰好从院子里经过，见他们到来，便停住了脚步。

汉密尔顿在充作办公室的那间屋子里接见了他们。一张桌子，四把椅子，还有秘书两个星期来一直在整理的成堆会议记录。马哈茂德·塔维勒把一张折起的纸放在桌上，等儿子翻译完毕。

他声称，英方那批小件古物中的几尊小雕像，是1798年被法国士兵从他那里偷走的。他要求归还。

“他说，他父亲是从自己的父亲手里得到这些东西的，”儿子翻译道，“它们在家里已经传了三代。占领的第一个星期，士兵们从店里把它们拿走了。他有证人。”

汉密尔顿听着。他看了看那张折起的纸。上面是用阿拉伯文描述的八件物品的清单，旁边标注着皮亚斯特的数额，那是他父亲当年购入时付的价钱。他要求见证人。儿子出去，领回来两个同街区的男人，他们证实，在法国人到来之前，马哈茂德·塔维勒确实拥有这些东西。

若卢瓦已走近门口。他认出了其中一尊小雕像的描述：一尊青铜小像，是站立的奥西里斯，双臂交叉，高约二十厘米。他画过它。不是在这个人家里，而是在1798年最初那几天，宿营地一只敞开的箱子里。他当时没有问它从哪里来。

“这些东西我无法还给您，”汉密尔顿说，“它们属于一次经投降条约认可的正式扣押。在这样的背景下，逐件归还的程序在法律上是一团乱麻，无从理清。”

儿子翻译了。马哈茂德·塔维勒听着，神色没有变化。他问了一个简短的问题。

“他问，这些东西现在归谁？英国人，还是法国人？”

“英国人。它们在英方扣押的箱子里。”

又是一个简短的问题。

“那他问，既然东西在英国人手里，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归还？”

汉密尔顿花了些时间斟酌措辞。这并非强词夺理。这是一套本不是为此类问题而设计的制度所能给出的实话。

“因为这些东西如今已是国家扣押物的一部分，受国际条约规范。个人权利，即便正当，也无法在这一框架内处理。那将开启一个没有尽头的程序。”

儿子翻译了。马哈茂德·塔维勒听完，点了一下头，说了句什么。

“他说他明白。他还说，无论如何，请记住我的名字。”

汉密尔顿记下了。他写下姓名、地址、八件物品的描述，以及两名证人的名字。他在那一页上签了字，把一份副本交给马哈茂德·塔维勒。

商人接过纸，仔细折好，塞进长袍里。他道了谢，语气并无暖意，随后和儿子一起出去。在院子里，他停了片刻，望着靠墙堆放的箱子。他什么也没说。他往城里走去。

若卢瓦仍站在门框里。他想着那尊奥西里斯青铜小像。想着自己速写本里画下它的那一页。小像将去伦敦。画将去巴黎。马哈茂德·塔维勒的名字，将留在一份英国人的登记册里，多半永远不会有人再去翻找。这一切都已记录在案。这一切，没有一样会被归还。

确有具体的受害者，被剥夺财产的物主，正当的诉求，而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能力公平地处理它们。

9月22日晚，最终的会议记录在仓库的院子里签署了。

院子里摆好了一张桌子，位置与前几个星期相同，仍在那顶帆布遮棚下，只是九月的阳光已把遮棚的下沿晒得褪了色。汉密尔顿的秘书把文件的两份副本并排放好，一份用法文写成，一份用英文写成，各附有编号的附件。每份二十二页。秘书把羽毛笔、墨水瓶和火漆印章都排列整齐。他做这一切时，带着那种明白自己的工作将被存档的人所特有的一丝不苟。

汉密尔顿最先到场，带着两名军官作见证人。傅里叶与若卢瓦代表法方。若马尔也在，站在后面，没有任何正式身份，却执意要亲眼看看。

汉密尔顿第一个签字。礼仪如此要求：强加条件的一方先签。他毫不迟疑地签了，那动作出自一个已在许多国家签过许多文件的人。

傅里叶拿起笔。他握着笔停了片刻，没有落下。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犹豫，决定早已作出，别无选择。那是另一种东西。是手接受心智早已接受之事所需的那一点时间。他签了字。墨迹在傍晚的暑气里很快就干了。

随后是若卢瓦签字。秘书用双方各自的火漆给两份副本盖印，英方用红色，法方用蓝色。每个印章都在柔软的蜡上留下清晰的印痕。印章压在蜡上的声音沉闷，不容更改。

若马尔下意识地数了数附件。每份二十二页，共四十四页。这些纸页里，有英方扣押的大件古物清单，有认定归法方所有的科学藏品清单，有互相查阅的条款，有运输的保证。数字，描述，类别。这些纸页中，没有一处

写明奈科坦尼布的石棺有多重，也没有写明若卢瓦描绘它的那一天有多漫长。

两份副本分别交给了双方。汉密尔顿把自己的那份塞进公文包，没有再看一眼。傅里叶把他的那份在手里托了一会儿，仿佛在掂量它的分量。分配已经记录在案。在伦敦的就在伦敦。在巴黎的就在巴黎。仍留在那些小巷、集市和发掘工地里的，并不属于桌边的任何一个人。

几秒钟里谁也没有开口。随后一名英国军官轻咳了一声，所有人同时动了起来。

汉密尔顿最后又说了一句话，若卢瓦觉得措辞恰如其分。“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事，后世会作出不同的评判。我不知道这评判对我们是否有利。但我们至少努力以某种公平的方式去做了。”

若卢瓦没有回答。他累得没有力气谈哲学。但当晚他就把这句话记进了速写本，连同日期和情境。它不会出现在任何出版的著作里。

IV - 告别

关于藏品分配的所有谈判结束后，法国学者与英国专员在九月的最后几天里，把各自要运往目的地的物品打包。英方的大件古物自9月4日起便已登记在册。克拉克的人只需把它们装箱，并检查绑带和封印。仓库的院子里，箱子、罗塞塔石碑、石棺，以及装在大车上的雕像，都等着装船，不会再有人去打开它们。谈判中已经定下的就是定下了。没有什么可以重新打开。

若卢瓦默默地看着这些准备工作，心中既有苦涩，也有无奈。他知道这些东西将永远去往伦敦，此生再也见不

到了。但至少他保住了自己的画稿，即便实物已为法国所失，这些画稿仍能在视觉上保存这些古迹的记忆。

9月24日，汉密尔顿前来感谢若卢瓦和傅里叶在谈判期间所给予的有限合作。

法国学者这边，则把他们设法保住的藏品装箱。

每位学者都为自己带走的一切编制了详细的清单，一件件列明每件物品、每份手稿、每幅图画。

9月25日，在一名英国军官与傅里叶的共同监督下，进行了初步检查。每只箱子都被打开，按清单核对内容，然后重新封好。

9月26日晚，所有的打包准备工作均已完成。法国学者们已准备就绪，一俟英国船只可用，便登船返回法国。

9月26日那天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若卢瓦召集助手做最后的核对。他让人把每一只装图稿的金属管都打开重新检查，查看管塞是否严密，管身有无裂缝。成捆的文稿、成箱的笔记、成夹的拓片，他也都照此办理。委员会要带回法国的一切，装在几只箱子和几卷铜管里就够了。对三年多的工作来说，这实在太少。可这就是全部。

“我们没有落下什么吧？”

“没有什么要紧的。测量仪器在三号箱。建筑测绘笔记在四号箱。您的画稿在一号至二十三号管里。马塞尔的拓片在夹子里。研究院的日志在五号箱。”

若卢瓦看着那些金属管。管子里，卷起来，用棉纸垫稳，放着的是那些图版，它们呈现了军队所走过的整个古埃及，化为厚纸上的线条与排线。如今这些纸比古迹本身更珍贵，因为它们可以通过雕版无限复制，可以跨越时间与空间传播。

9月26日至27日夜里，若卢瓦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金属管沿着他左手边的墙排成一行，他整理着自己画稿的索引：一份按字母和主题编排的清单，列出所有已记录的古迹，按遗址、时代和建筑类型分类。

这份索引，他在凌晨四点左右完成，将成为日后那部《埃及志》的第一份目录。它列出了两千零八十七幅画，涵盖一百八十六处不同的遗址，南起菲莱岛，北至亚历山大。对每一幅画，他都注明了它是全景、建筑细部、铭文，还是人物形象。

黎明时，他合上索引，把它放进一号管，连同他最珍贵的几本速写本。他准备好了。埃及就在管子里。他可以走了。他吹灭了灯。

箱子的最终封印于9月27日上午十点加盖。一名英国军官，两名法国见证人，还有一名为此临时充任的军中公证人。仪式很简单，其意义却极其重大。这四十二只箱子将渡过地中海，汇入法国的国家藏品。在经历了那一切之后，这是一场局部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胜利。

若马尔在心里把这一幕刻了下来，打算日后写进回忆录。给他深刻印象的不是场面本身，而是它所象征的东西。他生命中一个时期的终结，一个与其他任何时期都不相像的时期。年仅二十三岁，他已经经历了大多数人一生都不曾经历的事情。

而若卢瓦想的不是未来。他想的是金字塔，是门农巨像，是菲莱的神庙。是所有他没来得及画下的东西。

9月29日，法国学者们得知，用于送他们回法国的英国船只，两天后即可接载乘客。这一消息催着最后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

9月30日上午，法国学者们接到正式命令，要他们做好准备，次日登上英国的运输船，经由马耳他返回法国。

登船之前，汉密尔顿最后一次拜访了法国学者。他带来了官方通行证，凭此可让他们的箱子通过英国的港口检查。这份文件签了字、盖了章，是正式的保证，确保最后一刻不会有人试图扣押他们的物品。

“这是你们的通行证。祝你们归途顺利。”

他把那叠文件递给若卢瓦。若卢瓦接过，然后回答道：

“我也祝您善用您带走的東西。”

汉密尔顿短促地笑了笑。他明白了。在这种情形下，所谓善用罗塞塔石碑、石棺和王室木乃伊，就是认真研究它们，让学者们得以接触，从中得出惠及众人的知识。这将是他在所作所为在道义上唯一站得住脚的理由。

“我们会尽力的。”

仅此而已。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最后一晚，学者们聚在一起，没有汉密尔顿，也没有英国军官。他们吃得很少，谈得很久。人人都有遗憾：没有去过的遗址，没有抄录的铭文，再多一年便可研究的古迹。但每个人也都明白，他们完成了一件从未有人做过、也不会以同样方式再有人做的事。

9月30日至10月1日夜里，若卢瓦躺在仓库的草垫上，听着海浪声和海鸥的叫声。他在脑海中让过去的三年一一掠过。在亚历山大登陆，穿越沙漠的行军，初见金字塔，上埃及的神庙，开罗的暴动，罗塞塔石碑，克莱贝尔之死，与汉密尔顿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谈判。这一切在他看来，仿佛都属于另一种人生，由一个比如今的他更年轻也更天真的人度过。

黎明时他起身，最后一次去检查金属管是否都已绑牢，然后走到码头上。海面在尚显昏暗的天空下平静无波。

西边还留着几颗星。锚地的船上亮着灯笼。几个小时后，他就在船上了。几个星期后，就到巴黎了。

10月1日早晨，各人依性情，告别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若卢瓦在开罗结识过几位埃及学者，与他们结下了长久的情谊；此刻，他最后一次拜访了亚历山大的一位谢赫。那位谢赫曾在爱资哈尔求学，两人此前常就法老时代的古迹交换看法。他是个年迈的饱学之士，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却不懂法语，对若卢瓦拿给他看的那些画，表现出由衷的好奇。

“他说，法老们是巨人，”翻译转述道，“是为永恒而建造的巨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在那里生活。”

“他也许没有说错。这些古迹比占领过这片土地的所有帝国都活得长久。它们也将比我们的帝国活得更久。”

谢赫又说了句别的话。翻译迟疑了一下才译出来。

“他说：你们看这些石头，仿佛它们有灵魂。这很好。这个区别很重要，即便你们已经离去。”

若卢瓦记下了这句话。它与 wakil 阿卜杜拉的话相呼应。他开始明白，他们投向古埃及的那种专注的目光，撇开一切政治和军事的考量，自有其独立的价值，而这一点连埃及人自己也认可。

10月1日上午将尽时开始登船。英国船只在离码头几百米处抛了锚。几艘小艇在码头与船只之间往返接驳。法国人的箱子最先装船，这是与汉密尔顿商定的，他理解学者们对自己藏品的焦虑。

这些船分别叫作 HMS Peterel、HMS Alceste 和 HMS Unité。最后一艘原是一艘法国护卫舰，转归英国旗下，英国人沿用了它的名字。

“小心，”若弗鲁瓦对一名水手说，那人正抓着他一只标本瓶箱子的一侧往上提，“这箱子易碎。”

水手把箱子翻来覆去，掂量它是否平衡，然后把它与其他箱子一起放进了小艇。若弗鲁瓦咬紧了牙关。

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舱内的位置。护卫舰的货舱昏暗、潮湿、通风不良，还要承受船身颠簸和海浪的撞击。装酒精的标本瓶是最严重的问题。若是风暴中有箱子在舱里翻倒，若是木板在撞击下裂开，标本瓶就会破碎，酒精就会流淌出来，而一旦附近有盏灯笼，货舱里便有起火的风险。他已向英国船长指出了这一风险，船长明白了，并允许把最易碎的几只箱子放在下层甲板上一处便于看管的地方。

若卢瓦最后一个登上小艇。他从水面的高度最后看了一眼亚历山大。平顶露台的白色房屋，修长的宣礼塔，建在古代灯塔废墟上的城堡，而在这一切之后，沙漠已然开始，尼罗河谷向南消失，还有那无数军队没能全部到达的古迹。

“要看的东西还那么多，”他喃喃道。

“永远都会有的，”同乘一艘小艇的若马尔接口道，“这就是埃及的本性。它是无穷无尽的。”

小艇离开了码头。若卢瓦没有回头。他眼前留着那天早晨亚历山大的模样，在十月干燥的空气里，清晰而明亮。上船安顿下来之后，他拒绝把自己的铜管留在货舱里。他把它们带进自己的铺位。那是分给他的一处位于下级军官舱的空间，一个两米乘一米五的小隔间，里面有一张帆布铺和一只悬在顶上的挂钩。他把挎包挂在挂钩上。二十三根管子，约五十公斤。铺位在这额外的重量下微微下陷。

头一夜他几乎没有睡。船每动一下，挎包就晃一晃。他在黑暗中望着它们，数着摇晃的次数。

若马尔把自己那几箱测绘资料，经与大副商定，用绳索固定在舱壁上，如同固定炮械一般。这是军中防颠簸的法子。

“您以前运送过这样珍贵的地图吗？”大副问他。

“没有。不过我见过你们是怎么固定火炮的。”

大副点了点头。这合乎情理。

船上，法国乘客，无论学者还是士兵，与英国船员混杂在一处，而这里原本只为他们人数的三分之二设计。两派依旧泾渭分明，法国人在船头和左舷，英国人在中部和右舷。可在狭窄的过道、舱廊和梯子上，他们一天要擦肩而过二十回，彼此却不交一语。

学者们心中感到的，与其说是耻辱，不如说是荒谬。他们乘着刚刚夺走罗塞塔石碑和奈科坦尼布二世石棺的那些人的船，返回法国。还是那支舰队，当年在阿布基尔击沉了他们自己的舰队。历史自有一套首尾相接的办法。若卢瓦在当晚的信里就是这样写的。这封信他没有写完，也从未寄出：

“我们乘着战胜者的船回到法国，口袋里装着他们的通行证，而罗塞塔石碑在他们的货舱里。我们从埃及人手中夺取了埃及，他们又从我手中夺了回去。石头如今驶向伦敦。我们的画稿驶向巴黎，装在我放在铺位上的铜管里。我想，从长远看，这是一个要紧的区别。”

若卢瓦把信揉成一团扔掉了，找不到言辞来表达他的感受。他将试着在《埃及志》里找到别的词语。

V - 横渡

十月的地中海自有它的脾气。到第二天，东北风骤起，海面汹涌。船开始剧烈摇晃。好几位不惯航海的学者，头几天都躺在舱房里，唯独若马尔下到货舱去查看自己的箱子，另有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每隔两小时就上去检查一遍。

若卢瓦留在甲板上。去程时他没有任何不适，在埃及的那些月份里，他与大海建立起一种平和的关系。他观察着浪涛、云朵、变幻的光线，目光与他注视古迹时一般无二。专注，敞开，不加评判。一位英国军官，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走过来同他说话。

“您那些管子里究竟装着什么？”

“古埃及。”

军官看着他，没有听懂。

“是画稿，”若卢瓦解释道，“古迹的测绘图。铭文的摹本。三年多来我能记录下的一切。足够填满整整几大卷。”

“像百科全书那样吗？”

“带插图的，”若卢瓦说。

军官似乎满意了，走开了。若卢瓦又在甲板上待了一个小时，望着大海。在地平线之后的某处，金字塔依然矗立。不动声色。它们什么也不等待。

第五天，风势减弱。海面恢复了规律的起伏。学者们重新出现在甲板上，脸色仍旧苍白，却已能站立。每个人都回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笔记，自己的计算。还没望见马耳他，工作就已重新开始了。

若马尔在整理他的测量笔记，追查其中的矛盾。有几处能够化解。有两处怎么也解不开。

“看看这些数据，”他说着把笔记本放在船舷的栏杆上，“哈夫拉金字塔的底边，东西向比南北向略长一些。不多。两百一十五米里差二十厘米。但吉萨三座大金字塔都有同样的情况。”

“是您测量的误差吗？”

“有可能。但可能性不大。每一边我都量过三遍。”

“那么呢？”

“那就是说，他们的测量把地球的曲率考虑在内了。实践可以走在理论前面好几个世纪。”

若卢瓦久久地望着他。

“把这个发表出来。”

“现在不行。这只是一个假说。我想到巴黎后同蒙日核实一下。”

蒙日已随波拿巴离去。但测量数据与若马尔同行，装在四号管里。这一成果刊载于《埃及志》的各卷之中，将使他成为现代大地测量学的奠基者之一。而在那个晚上的甲板上，若马尔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睡不着觉的人。

若马尔没有说出口的——自离开亚历山大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曾说起的——是：这一假说让他既兴奋，又害怕。如果金字塔的建造者知道地球的曲率，那就意味着有什么东西已经失落了。不是被遗忘——知识是会被遗忘的——而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失落：被毁灭，被散佚，变得无从触及。二十个世纪的征服、劫掠与火灾。亚历山大图书馆。恺撒的士兵不加阅读就烧掉的纸草。历代占领者对墙壁所载内容的漫长漠视。

他从外套里取出十七号笔记本，那是他专门留给未经证实的假说的。几个月来，他在里面记下了那些抗拒立即解释的观察。神庙的天文朝向。卡尔纳克的阿蒙大神庙

在五百米长度上比例毫无差错。大金字塔内部诸室与长廊的布局，其轴线在他看来，对应着某种他尚未完全重构出来的演算。

金字塔不仅仅是坟墓。也许根本不是坟墓，至少不是法国人通常理解这个词的那种意义。它们是仪器。是测量世界的机器，是把天空固定在石头里的机器，是把纸草无法保证的知识传给后来者的机器。因为纸草会燃烧。石头则不然，至少不那么容易。

他合上笔记本。这个假说太宏大，放不进一条脚注。它需要十年的工夫。他才二十三岁。他有的是时间。

夜幕降临。地中海上的星星不如沙漠上空的明亮。他寻找猎户座，找到了，它低低地悬在地平线上，腰带的三颗星略微朝南倾斜。他一直望着，直到寒冷逼得他回舱。四号管里，在两卷油纸之间，他塞进了一张折成四折的小纸，上面抄着他在吉萨量得的底边精确数据。这些数字不会说谎。那是他的锚。

后甲板上，傅里叶在写作。好几天来，他一直在寻找《埃及志》历史导论的开篇。那句能让读者明白，为什么埃及比其他一切古代文明都更重要的话。问题不在素材，而在语调。若采用学者的语调，他将失去那些想被打动的有教养的读者。若采用演说家的语调，他又将辜负研究院对他严谨的期待。

他已写满并撕掉了十一张开头的稿纸。这十一次尝试里有同一个错误：他总是从远征写起。“1798年5月19日，法国军队从土伦启航。”或者：“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由一百六十七名成员组成。”这些措辞无可挑剔，却只会告诉读者，他即将读到的是一份报告。可这不是报告。

他所寻找而找不到的，是那个能让读者明白埃及为什么与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词。不是更美，也不是通常意义

上的更古老。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古老。古老，如同空气、石头、河流的一种物理属性。他要把三千年的历史装进一篇序言。而还没有人找到过书写三千年的办法。

“从哪里开始呢？”他高声说道，既是自言自语，也是说给听着他的若马尔听。

“从不变的东西开始。尼罗河。每年的泛滥。季节。其余的一切，法老，王朝，征服，与这些相比都是转瞬即逝的。从地理开始。其余的自然会跟上来。”

傅里叶记了下来。他感到胸中有什么东西松开了。不是技术意义上的地理，不是纬度和子午线。而是作为世界的形态、对人构成约束的那种意义上的地理。涨落的尼罗河。夹在两片沙漠之间的河谷。文明作为对物理约束的回应。这些，他写得出来。

他开始写第十二页。这一次，他没有撕掉。他写了三行，又重读一遍。这几行立得住。第三行断言，尼罗河穿越了数个世纪，而世纪却无法穿越它。这并不完美，但它是活的。这是一个开端。他继续写了下去。

就在这几天里，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整理笔记，这些笔记日后将成为他关于尼罗河动物群的最初几篇文章。他在自己的舱室里工作，四周是用绳索固定以防船身摇晃的标本瓶。用来保存动物标本的酒精气味，在狭小的空间里飘荡不散。

“您写这些描述的时候，心里想着什么？”一天晚上，若马尔问他。

“我想着五十年后读到它们的人。我希望他们看见我所见到的，不多也不少。只是实情。”

这就是他的信条，尽管他从未将它说出口：忠实地呈现，传递而不背离原貌，给后世留下的是一份观察，而不是一种阐释。

10月10日清晨，船驶入瓦莱塔港。学者们上了岸，三三两两地漫步在这座设防城市的街巷中。自法国守军迫于英国压力撤离该岛，至今才一年多一点，米字旗已在堡垒上飘扬，而1798年6月途经此地时，若卢瓦曾在这些堡垒上见过三色旗。

“我们用三天拿下了这座岛，”傅里叶望着瓦莱塔的城防，带着忧郁的讽刺说道，“又在围困两年之后失去了它。这就是我们埃及历史的缩影：辉煌的胜利，无声的放弃。”

若卢瓦在圣约翰联合主教座堂前坐下，迅速画下它朴素的正面。这不是为了《埃及志》——那部书只涉及埃及——而是为了他自己，出于一种本能的举动：他的手面对一座出色的建筑，早已不懂得如何闲着。这幅画花了二十分钟。当他抬起眼睛时，若马尔正站在他身后。

“您还在画啊，”若马尔说，亲切之中带着几分钦佩。

“我会一直画下去。这是我看世界的方式。”

晚上，学者们在客栈里聚餐。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了每个人回到巴黎后的打算。若弗鲁瓦·圣伊莱尔想回到自然史博物馆的岗位。傅里叶惦记着波拿巴答应给他的伊泽尔省省长一职。马塞尔则满怀眷恋地说起国家印刷所。

“那您呢，若卢瓦？”若弗鲁瓦·圣伊莱尔问。

“我吗？我要工作。如此而已。这些画可不会自己去上版刻印。”

10月11日拂晓，船起锚，继续向西北航行。西部地中海比东部的海面更清凉，也更汹涌，那灰绿的色调让他们想起了青年时代的普罗旺斯海岸。

在航程的最后这一段——从马耳他出发共五天——学者们每天都聚在大舱里讨论《埃及志》。谁写什么。按什么顺序。共多少卷。

“这部《埃及志》必须是一部百科全书，”傅里叶说，“不是几张图版配上若干说明，而是我们所见、所测、所察的一切。古迹、地理、博物学、当代社会。至少二十卷。”

“这些图版要么完美，要么就不必有，”若卢瓦说，“要请巴黎最好的雕版师，需要多少时间就给多少时间。一处瑕疵，就重来。”

若马尔想要一部完整的地理图集，要有整个尼罗河谷的第一批精确地图。若弗鲁瓦要求给博物学留出显要的位置。马塞尔想到的是罗塞塔石碑的拓片。

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身后会留下什么。若马尔站在船头，从笔记本上抬起眼睛。海岸还看不见。他想到了自己管子里的那些测量数据：一百年后，会有人使用它们，而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对他已经足够。

10月16日，一个澄澈的秋日午后，法国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先是一道低矮的暗线，随着渐渐靠近，显出海岬与丘陵的轮廓。法国。他们没有说话。无话可说。

10月17日清晨六点，船驶入普罗旺斯的近海水域。海上的秋光，与东地中海的光截然不同。更淡，更散，带着一种轻盈，与埃及那浓稠的光亮形成反差。

“我认得这光，”若卢瓦对若马尔说，“这是法国的光。我从前不知道光也有祖国。”

海岸越来越近。现在已能分辨出石灰岩的峭壁、小海湾，以及最初的几间渔民的房屋。

“我们回来了。”

这简单的一句话包含了一切：如释重负，惆怅，疲惫，还有前方等待着的工作。仿佛埃及只是一段插曲，而真正的生活现在才重新开始。然而这两位学者心里明白，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生活，曾在那边，在那些炽烈的岁月里。眼前展开的，是平凡的世界。

VI - 回到法国

船于 1801 年 10 月 18 日抵达土伦，距 1798 年 5 月法国舰队从这同一座港口出发，已过去三年零五个月。归来的情形与出发时形成鲜明对照。当年是三百五十艘船的舰队，载着三万八千名士兵；如今，只有几艘英国船只，载回一支战败之军的残部。

学者们在土伦登岸，心中百感交集，却谁也说不确切那究竟是什么滋味。法国变了。他们变得更甚。

若卢瓦走下英国船的舷梯，双脚踏上了土伦的码头。潮湿的石头，冰凉。海盐与焦油的气味。海鸥在港口上空鸣叫。

若卢瓦停住脚步，任由其他人从身边走过，一言不发，也没有俯身亲吻大地。他望着码头，望着建筑，望着城市上方的山丘，望着十月的灰色天空。空气冰冷而潮湿。那是十月地中海的寒意，不同于埃及干燥的冷。他将它吸进肺里，等待自己的身体将它记起。

那些箱子——若卢瓦的画稿、若弗鲁瓦·圣伊莱尔的标本、马塞尔的拓片、仪器、手稿——在他们的监督下被卸下了船。

他们在土伦的一家客栈里聚在一起。

“敬埃及。”

傅里叶举起了酒杯。

“敬那些没能回来的人。”

他们默默地饮尽。晚宴散得很早。

次日清晨，土伦港口当局派来一名军官，办理箱子的正式卸货手续。这名军官很年轻，对埃及远征一无所知，只知道巴黎的报纸上说过些什么。他以行政人员的一丝不苟查验了运输清单，清点了箱数，指定码头附近一座有守卫的仓库。

“这些物品是共和国的科学遗产，”傅里叶对他说，语气里带着不容置辩的权威，“它们将尽快在护送下运往巴黎。请务必让仓库保持干燥，并妥善上锁。”

军官躬身行礼，照办了。傅里叶本能地找回了巴黎官员的腔调，那种代表一个机构说话的人所特有的笃定。三年的埃及岁月并没有将它抹去。

下午，几位学者来到海事长官公署的办公室，起草呈交内政部的第一批正式报告。这些报告须说明：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已完成使命，其藏品中得以保全的部分完好无损，出版工作可以开始。傅里叶以沉稳的笔迹撰写了主报告，对英国人造成的损失，只在附录的一则事实性说明中提及，别无他言。

“政治，就留给那些将会用到它的人吧。我们的本分是陈述我们做了什么、带回了什么。其余的，属于历史学家和外交家。”

若马尔从他肩后重读报告，点头称是。他才二十三岁。他的一生正在眼前展开，而这一生已经带着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有的经历的烙印。这对他就足够了。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宽慰。

在土伦的最后几个小时，都花在了行政手续上，这些手续与刚刚经历过的非凡之事形成强烈反差。表格，签名，

官方印章。执政府的官僚体系，将埃及远征纳入了它日常运转的轨道。

若卢瓦暗含讥讽地留意到，那位登记委员会箱子的官员，对待它们的方式，与对待一批面粉或羊毛并无二致。箱中之物的非凡之处，在哪里都看不到半点踪迹。四十二箱。官僚体系看到的，仅此而已。

“文明就是这样保存自己的记忆的。保存在没人读的行政表格里。”

傅里叶笑了。这话是真的，而这也正是他的希望所依凭的原则：《埃及志》将比政权与战争活得更久。它会被编目，被登记，被一代代学者查阅，他们永远不会听说傅里叶或德农，却会读到他们的文字。

第二天清晨，他们踏上了前往巴黎的路。

旅程大约持续一周，走的是主干道，穿过罗讷河谷，再向北经勃艮第而去。学者们乘坐公共驿车，珍贵的行李则另由安全的运输车队随后跟进。

在这段旅途中，他们得以观察法国，并确认在他们流落埃及期间发生的重大政治变化。法国换了政体。

在阿维尼翁，一群人守候在驿车前。人们打听儿子、兄弟、丈夫的消息，三年来他们杳无音信。傅里叶下了车，耐心地一一作答。他并非对每个人都知情。

这一幕给他留下的印象，比金字塔还要深。这场宏大的冒险，底色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现实：有人在等待。有一位五十来岁的妇人，手里握着一幅微型肖像。她什么也没有问。她只是看着那些走下车来的士兵的面孔。傅里叶移开了目光。有些人将永远等下去。

途经里昂时，他们停留了两天。好几位学者在这一带有家人或朋友，趁机举行了临时的团聚。傅里叶的家人在

欧塞尔，他只是从里昂寄出一封信，告知自己即将抵达巴黎。

而若卢瓦则利用在里昂的这两天，拜访了一位著名的雕版师，远征之前他就见过此人的作品。他想评估这位雕版师能否参与《埃及志》图版的制作。

“这是一些样稿，”若卢瓦说着，在作坊的桌上摊开了几本速写簿。

雕版师久久地审视这些图画。他那技师的眼睛在评估其中的难点。象形文字的线条要求极度的精确，浮雕有深浅层次的细微差别，用平面雕版很难表现，神庙的全景则需要对透视的掌握，并非所有雕版师都具备。

“这是正经的活儿。我做得了。不过我需要时间。很多时间。”

若卢瓦看着雕版师的手。宽大，稳定，老茧长在只有刻刀才会磨出的确切位置。这双手与他自己的不同。他的手作画，这双手将镌刻。从一种动作过渡到另一种动作，这一点他至今仍理解得不够透彻。他们需要一起学习。

“我们有时间。我们没有的，是敷衍了事的权利。”

他们就原则性的条件达成了一致。若卢瓦把这个名字记在笔记本上。这位里昂的雕版师，正是他要找的人。

晚上回客栈时，若卢瓦在公共大厅里遇见了傅里叶。

“波拿巴抛弃了我们，”他说，“而现在他要利用我们的工作，来成就他的荣耀。”

傅里叶试图缓和这一严厉的评判。

“没有他，我们就不会去那边。而且他有财力资助《埃及志》。把这两件事都记在心里吧。”

在里昂，若卢瓦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了一册他自己与研究院的通信集，那是在他离开期间出版的。书商没有认出

他。在法国读自己从埃及寄出的信，给他一种奇异的感觉。仿佛是另一个人经历了那一切，从远处向他汇报。他认得那些字句，却不完全认得那声音。他的文字变了。变得更直接，不那么在意效果。这或许是件好事。

“我已不是 1798 年 5 月从土伦出发的那个人了，”他在路上对若马尔说。

“是啊。谁都不是了。”

他们是在暮色中经圣安托万郊区进入巴黎的。这座城市在他的记忆里比实际上要大。在埃及的那些月份里，他把巴黎理想化了，直至把它当成了自己所缺失的一切的象征。而现实中的城市，以其平淡而一以贯之的样子令他震动。同样的街道，同样的气味，同样的大车碾过石板路的声响。

“巴黎永远是巴黎。”

“先生，您是从很远的地方回来的吧？”车夫问。

“从埃及。”

“啊，”车夫说，“听说那儿很美。”

“远不止是美。但要回来了，才知道它有多大分量。”

10 月 28 日抵达巴黎，比某些人所期望的要低调得多。没有游行，没有官方的欢迎，没有演说。东方军团是战败而归的，执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去庆祝一场投降。波拿巴早已在没有埃及的情况下重建了自己的传奇。在官方言论中，这场远征成了一段慷慨的插曲，一桩出于科学兴趣的举动，只是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中止，而不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军事失败。

若卢瓦任同伴们各自散去，独自回到了圣多米尼克街的家。公寓关着门。他的家人已由土伦寄出的信件得到通知，让人重新打开了百叶窗。他走进屋，放下外套，坐

进他惯常读书的那把扶手椅。壁炉里生着火。火焰的热度烘着他的脸，柔和，稳定，是木柴燃烧的暖意，与埃及的热毫无相似之处。

一切都在原来的位置。书架，画作，书桌。埃及三年，而巴黎纹丝未动。

他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空白笔记本，是随手拿到的第一本，在第一页的页首写下：“1801年10月——工作开始。”然后合上笔记本，上床睡觉去了。

家人的团聚在随后几天里陆续进行，消息在亲友之间渐渐传开。父母，朋友，昔日的同事。每个人都想听故事，听描述，听轶事。金字塔真的像旅行家们所说的那样高大吗？炎热能忍受吗？当时真的像信里所暗示的那样害怕过吗？

若卢瓦耐心地回答，依听者的不同来调整自己的叙述。对父母，他避开战斗与疾病的细节。对学者朋友，他详述那些古迹。对大众，他保持惊奇与奇妙的口吻。这种依听众调节叙事的本领，他在自己身上认出是一门艺术，而此前他并不以为自己拥有。它将对《埃及志》有用。

“还要更甚。对于无法想象的事物，传闻总是不及现实。”

这句话引来了几道不敢相信的目光，也引来了几份晚宴的邀请，那些好奇的巴黎人想听听他的历险。他接受了，讲述了，但总觉得言语背叛了经历。埃及是无法讲述的。它只能亲身经历。如今它活在堆放于公寓里的那些铜管之中，等待着被译成镌刻的图版。

那天夜里，他带着这个念头入睡。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它从明天开始，并将持续二十年。这正是他们所着手之事的确切尺度。而在此刻，二十年在他看来，既全然合乎情理，又全然令人眩晕。

12 月，重逢之初的热闹劲儿过去之后，学者们开始着手具体的组织工作。

12 月 10 日，傅里叶在杜伊勒里宫受到波拿巴的接见。走廊宽大而冰冷，壁炉的暖意传不到前厅。波拿巴在他的办公室里等候，一如既往地站着。傅里叶呈上了出版计划。波拿巴明白，尽管军事上失败，颂扬他的埃及远征仍有政治上的好处，因此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出版吧，”波拿巴说，“我把它定为国家工程。”

波拿巴以正式命令宣布，由法兰西国家出资，全额承担《埃及志》的筹备与印刷，并将这一出版物视为头等重要的国家工程。他任命了一个编辑委员会：傅里叶出任总编辑，德农出任艺术总监，负责全部图版，另有若干学者担任分编辑，分别负责各个专题部分。

学者们在巴黎的一幢政府大楼里分得了办公室，可以每天在那里工作。一笔可观的预算被拨出，用以雇用专业雕版师、辅助绘图员和抄写秘书。

德农用整个 12 月整理他成千上万幅画稿，着手把他那些匆匆的速写转化为精心制作的雕版图版。他按古迹和类型分类：全景，建筑细部，浮雕，象形文字铭文，平面图，剖面图。

“这项前期整理工作是不可或缺的，”他向助手们解释道，“而后才能开始真正的雕版工作。若没有严密系统的整理，我们会白白浪费数周去寻找需要的图稿。有了这种按地点、按类型的有条不紊的整理，我们才能高效地工作。”

他开始遴选巴黎最优秀的铜版雕刻师，把复制他画稿的精细工作交给他们。他会见了每一位可能的雕版师，审视他们以往作品的样品，长时间地讨论他将要求的质量标准。

与雕版师的最初接触，暴露出一个意料之外的困难。这些训练精良的技师，能以任何传统风格复制一幅原作。但德农的画稿不属于任何传统风格。它们有一种笔触的自由，一种紧迫感，一种富有成效的含混，是学院派雕版所无法转录的。

“你们得训练自己的眼睛。这些惯例并非笨拙。它们遵循着一种逻辑，你们必须先理解它，才能去复制它。若不明白埃及人的面孔为何这样画，雕版师一动手修改，就会铸成大错。”

这项工作将比他预料的更漫长。但很明显，德农绝不会妥协，而《埃及志》将成为他有生以来参与过的最宏大的工程。

傅里叶这边，则在推进历史序言的撰写。他采用了一种与项目规模相称的审慎学者的口吻。每一句话都经过斟酌。他不愿《埃及志》只是一部带插图的目录。他要它成为一桩思想的事业，一座可与《百科全书》比肩的思想丰碑，一部向后世讲述法国对埃及理解了什么的文本，或许也讲述埃及对法国说了什么。

1801年12月就在这种专注的工作中结束了，在这些办公室和作坊里，宏伟的巨著渐渐成形。当时没有一位学者能预知，要完成它还需要许多年，全部二十三卷对开本的《埃及志》要到1829年才会完成。近三十年的工作，只为记述三年的远征。这种悬殊，或许恰是他们所见之物的确切尺度。

12月19日在法兰西研究院举行的会议，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自回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傅里叶精心安排了召集事宜，给每一位仍在世的成员——有三十来人已在埃及殒命——都寄去了私人信件，邀请他们到研究院的大厅里重聚。

到场的约有六十人，来自法国各地。有些人自亚历山大那段投降与登船的日子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他们重逢时，带着幸存者那种克制的激动：他们共同分担了一段旁人无法完全理解的经历。

傅里叶以应有的庄重主持了会议，回顾已完成的工作，克服的困难，蒙受的损失，提到已故同僚的名字，随后介绍了《埃及志》的出版计划、从执政府获得的资金，以及预定的日程。

“这项工作需要时间。也许十年。也许更久。你们每个人都将受邀为撰写自己的部分出力。我们在埃及开始的事业，我们将在这里，在巴黎，在我们的办公室和图书馆里完成它。冒险在那边。巨著在这里。”

德农坐在听众席中倾听，想着他公寓里的那些笔记本，想着所有等待着被镌刻的画稿。他在埃及所做的工作，不过是工作的一半。另一半，正要开始。

12月的最后一周，用来撰写科学与艺术委员会呈交内政部长的第一份正式报告。这份长达九十二页的报告，清点了委员会已完成的工作，所带回的东西，以及打算出版的内容。

傅里叶撰写了报告的主要部分，德农负责艺术部分，若弗鲁瓦·圣伊莱尔负责博物学部分，马塞尔负责有关语言与手稿的部分。这份文件朴素而精确，给部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附上一份赞许的批注，把它转呈给了波拿巴。波拿巴自两年前回到法国以来，一直关注着各项藏品的进展，他召见傅里叶，举行了一次工作会议。他希望《埃及志》不仅是一座科学的丰碑，同时也是一座颂扬他东方战役的政治丰碑。这两个目标并非不相容，但它们的并存，要求学者们小心翼翼地周旋。

“我们为科学服务，”傅里叶在会见波拿巴之后对德农说，“并且让波拿巴相信我们在为他的荣耀服务。伟大的科学著作，向来就是这样得到资助的。”

德农笑了。这个说法，或许是他听到过的、对他们自远征之初以来的处境最为恰当的描述。

波拿巴接过委员会的报告，兴趣并非装出来的。对远征的某些方面，他怀有真切的求知兴趣：金字塔，罗塞塔石碑，底比斯那些巨大的神庙。一年之后，他将满怀热情地读德农的《游记》，并向朋友们谈起它。

“您的德农文笔很好，”蒙日说，“这在学者中很少见。他那些谈金字塔的信，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描述。”

“他看到什么，才描述什么，”波拿巴说，“他既是学者，也是艺术家。”

波拿巴点了点头。几周之后，他让德农知道，自己为他想好了一个主意，却没有细说。

对于留下来继续编写《埃及志》的学者们来说，德农有可能谋得高位，是个好消息。这一前景保证了他们在政府中有一位身居高位、理解他们又消息灵通的对话者。

波拿巴给予的资金慷慨，但并非没有限度。学者们很快就必须面对一部巨著出版的经济现实。雕版师价格昂贵，大幅图版的印刷更贵，优质纸张也所费不菲。

傅里叶制订了一项混合筹资方案，把政府拨款与图书馆、学院和富有个人的预订结合起来。这一办法既能控制成本，又能扩大发行，预示了十九世纪大型科学出版物的筹资模式。

德农这边，则与一家巴黎出版商谈妥，将他的《上下埃及游记》作为独立的一卷出版，先于集体编撰的《埃及志》。这一迅速的出版，早在1802年，就能维持公众对古

埃及的兴趣，并为《埃及志》问世时营造一个有利于它被接受的氛围。

“我们分两步出版。先出我的《游记》，面向大众，保持这股势头。《埃及志》随后，面向学者，也面向永恒。”

1802年11月，执政府颁布法令，任命德农为国家博物馆总馆长，这对他本人和委员会的同僚来说都是一个意外。波拿巴是在读过《上下埃及游记》、并与德农就艺术和藏品谈过几次之后做出这一决定的。

这个职位，他并未谋求，而是波拿巴自1801年12月他们那次谈话以来一直为他留着的，它将使德农置身于一个矛盾的中心。作为博物馆馆长，他将监督来自拿破仑帝国所征服各国的艺术品的征集。他将成为一项系统性掠夺政策的核心枢纽，而这项政策，他在埃及曾以批判而又无力阻止的见证者身份亲眼目睹。

然而他接受了。他认为，在这个位置上，他能够影响藏品的构成与陈列方式，强调科学的一面，而非凯旋的一面。这将是另一场战斗，用的是另一些工具。

他未来的角色与过往的经历之间的这种根本张力，并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他把它记在日记里，带着那种他专留给难以承受之观察的冷静精确。然后，他转向了别的事情。要做的事太多，无暇在自身处境的悖论上流连。

此后的二十年，将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富成效的二十年，尽管在性质上与他刚刚度过的岁月不同。更为伏案，更偏行政，更带体制色彩。但在它自己的方式上，同样苛求。要让《埃及志》问世，需要与远征本身相当的耐力和纪律。德农明白这一点。眼前是二十年的工作。他走出门去，来到街上，迈开了脚步。

VII - 工作开始

自回国以来，若马尔一直住在克鲁瓦-福班街。一间冬天冰冷、朝北的屋子，但有一张大桌子，他把测量图纸铺在上面。

他回来已有一年。这一年里，他不断地誊写、比对、修正。他的地形测绘如今铺满了两百张毫米方格纸，从三角洲直到阿斯旺的瀑布。那是有史以来绘制的最精确的埃及地图。

他在计算大金字塔的高度：一百四十六点五米，约合二百八十个埃及王室肘尺。建造者们使用的是一种精确的度量单位，如今这一单位可以被重新找回。他在笔记中公布了这个数值：0.5236 米。埃及学家们将沿用它一百五十年。

他还想到了苏伊士运河。波拿巴曾设想过它。

总工程师勒佩尔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他得出结论，认为红海比地中海高出近十米，因此没有船闸，运河就不可能修成。

若马尔已经对这些数字心存怀疑，却无法加以证明。勒佩尔的报告将在 1803 年发表。

这个错误将耗去近半个世纪，直到 1847 年布尔达卢重新测量，证明两海几乎处于同一水平，之后费迪南·德·勒塞普斯才在十年间开凿了这条运河。

若马尔在他冰冷的屋子里，凝视着他的尼罗河地图。每一道河湾都是以罗盘和经纬仪测得。每一个村庄。每一座神庙。尼罗河谷自北向南铺展在十张图纸上，其精确程度，足以让一位工程师预知，若是修建一座水坝，水将流向何处。

一个世纪之后，修建第一座阿斯旺大坝的英国工程师们，仍将查阅若马尔的测绘资料。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一切的工作，是为了让下个世纪的工程师，能够管理一个我们未能治理的民族的水。”

他吹灭了蜡烛。在委员会能够开始印刷《埃及志》的第一卷之前，他还有一百一十张图纸要誊写。

十月带来了工作中最初的真正阻力。

最深的一重并非技术上的。那是象形文字的问题。

德农每天晚上重读当天的笔记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卡尔纳克、卢克索、国王谷画下了数百列铭文。他以雕版师般的精确一个符号一个符号地临摹下来，却一个也不懂。《埃及志》将刊出这些铭文列。成千上万的读者会看着它们。没有人会知道它们说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缺口，而且没有任何现成的补救办法。

马塞尔在十月的一次会议上把这一点说得很明白。

“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描述性风格。只写我们所见，不写它意味着什么。”

起初，《埃及志》是傅里叶的一个构想。并不完全如此。波拿巴下令出版，若马尔负责组织，德农提供图像。但最先明白这部书应当是什么的，是傅里叶。一座丰碑。一部关于整个文明的百科全书，一如人们发现它时的模样。

他将在巴黎的寓所里，用两年时间撰写历史序言。一百六十页密密麻麻的文字，是自希腊人以来关于埃及的全部所知的综合。

图像的数量令人眩晕。德农有他的笔记本，若卢瓦和德维利耶有他们的，总共二百三十七本。若马尔有二百张

测绘图纸。若弗鲁瓦有数百张动物学和植物学图版。工程师们为所到访的每一座古迹都画有建筑平面图。总计八百九十四幅图版，其中约六十幅为彩色。约四百名雕版师，历时二十年。数十名绘图员，其中许多人参加过远征。

图版之大，巴黎没有一台印刷机能够印制。孔泰——就是在埃及制造过铅笔的那位孔泰——在 1805 年去世之前，为要求最高的幅面设计了一套特殊装置，由他的继任者付诸实施。新的印刷机被造了出来。有些图版近一平方米。必须专门制造纸张，并压上水印 古今埃及。有些图版单是一幅就花了两年工夫。

第一卷于 1809 年问世。最后一卷于 1829 年。共二十三卷，以带水印的罗纹纸印制一千部。庞库克商业版将自 1821 年起出版，共三十七卷。

傅里叶将看到最初几卷问世，随后是全部完成的巨著。他将于 1830 年去世。

《埃及志》创立了埃及学这门学科。它记录了此后已被毁掉的古迹，已被抹去的色彩，已被劫掠的遗址。它使一位法国学者得以构建他的释读方法。法国真正从埃及留住的，是一百六十七个头脑，以及他们所创作的八百九十四幅图版。至于它曾夺走的东西——这个词是准确的，无论辩解如何——则在伦敦。雕像在伦敦。知识在巴黎。

这是唯一可得的慰藉。它是真实的。

其余的难题——不同艺术家所作图版之间的一致性，古迹名称的标准化——傅里叶以他一贯的方法制订了工作程序，由此一一解决：清晰，实用，立即可行。每一幅图版都对照尺寸测绘数据核查。他们采用现代阿拉伯语名称作为正式名称，古希腊名称置于括号之中。

若马尔提出了命名的规则。傅里叶加以施行。

11月，德农开始撰写说明文字。每幅图版都须附有一段文字：位置，尺寸，保存状况，可能所属的王朝。

德农撰写了他曾勘察过的主要神庙的说明。他的文学风格受十九世纪初新兴的浪漫主义散文影响，把科学描述的精确与富有感染力的段落结合起来，传达出凝视这些雄伟古迹时所感受到的审美与精神的激动。

他为卡尔纳克写的说明以尺寸开头。围墙长五百四十米，宽五百五十米，占地三十公顷，多柱厅内有一百三十四根圆柱，中央十二根圆柱高二十一米。然后是一句话：“这片圆柱的森林所产生的效果，犹如一处人的伟大与神的伟大浑然交融的空间。”

傅里叶划掉了这句话。德农又把它恢复了。

傅里叶审读那些说明文字，把其中的抒情段落划去。德农又将它们恢复。傅里叶再次划去。

“我们做的是科学，不是文学，”傅里叶说。

“什么科学？”德农回答，“这些建筑当初建造，就是为了在观看者心中激起某种效果。如果我们不传达这种效果，我们不过是在给石头编目。”

谁也没有让步。他们让两种口吻并存。《埃及志》将同时是这两样东西。也许正因如此，它才会流传久远。

傅里叶住在圣维克多壕沟街，离博韦府邸步行二十分钟。他想到了波拿巴。不是他的虚荣或野心，对此他早已不想再去反对，而是某种更简单的事：这个人发动了一场远征，改变了欧洲看待埃及的方式，改变了傅里叶自己看待历史的方式，而他对此想必所知不多。对波拿巴而言，埃及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误，被一场成功的政变所弥

补。对傅里叶而言，埃及将终其一生都是他所经历过的最为浓烈的时期。

这就是创造历史的人与理解历史的人之间的差别。很少是同一批人。

他在圣雅克街的拐角处停下。一个年轻人在寒冷中卖报纸。他买了一份，没有看，继续往前走。

若马尔在克鲁瓦-福班街的屋子里，仍在工作。他租了一间过于狭小的屋子，在一张铺满描图纸的桌上安放了他的笔记本和仪器。那天晚上，他在拟定将用于《埃及志》地图集的地图投影系统。尼罗河谷纵跨八个纬度，宽度却从未超过二十公里。他需要一种投影，既能保持这条狭长沃土的比例，又不使距离过分变形。

他画出了本初子午线。接着是纬线。接着是北面的尼罗河口，在罗塞塔。接着是河流向南的走向，那些河湾，他曾花十八个月逐一测量，早已烂熟于心。

地图一笔一笔，渐渐成形。

午夜，若马尔放下了笔。他吹灭了灯，而不是任由它燃尽——这是埃及留下的习惯，那里的油很贵——然后在黑暗中待了一会儿。二十五岁。他见过金字塔，见过底比斯的神庙，见过沙漠，经历过一场战斗、一次投降，测量过在他之前无人测量过的东西。

而现在，他在一间冰冷的屋子里画地图。

这并不逊色。真正的科学是在夜里，靠耐心完成的。他想起了阿卜杜拉，那位运河的 *wakil*，他曾对他说，学习永无止境，因为运河也永远在变。现在他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了。埃及是收获。眼前的这些，是被打下、被收进谷仓以便过冬的谷粒。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在塞纳街，给居维叶写信。他们是对手，彼此心知肚明。但他所写的这封信无关竞争，而是一封关乎真理的信。

信中他向居维叶描述了萨卡拉的木乃伊朱鹭，尼罗河的鳄鱼，布巴斯提斯的猫。他还说到一件他至今未对任何人提起的事。那是在埃及的那几个月里他萌生的信念：物种并非固定不变，它们随环境而改变。

居维叶将与他对抗。他们将在科学院面前争论三十年。这场论战将成为欧洲博物学史上最重要的论战之一。它就始于此处，始于 1802 年 12 月巴黎的一间屋子，始于一封写给他既爱又与之相抗的人的信。

他合上信，封好火漆。夜晚结束了。第二天早晨，他把信寄了出去。

埃及仍在远处，作用于那些曾走过它的人的心灵。那不是怀旧。那是某种更顽固、更有用的东西。一种看待事物的不同方式，不会消退。

12 月，财政部通知傅里叶，开支超出了预算。雕版师占去了预算的百分之四十。优质纸张，百分之二十。要削减而不牺牲质量，不可能。傅里叶对部长这样说了。部长说他会考虑。

他考虑了。资金保住了。《埃及志》继续进行。

那天晚上，若马尔在屋里取出了他的法尤姆笔记。那是些灌溉测量记录，他还没来得及为《埃及志》誊写。渠道，流量，水车的轮转次序。他曾在那里花了两周，测量费拉们心中有数却从未写下来的东西。一套与法老同样古老的水利系统，整套完整地存在于那些自幼便操持它的人的头脑里。他把它记录下来，换算成分钟和流量，整理成形，好让下个世纪的工程师能够读懂。这或许是挽救它的唯一办法。

他放下笔记本。屋外，巴黎一片寂静。某处悬着与法尤姆同样的星辰。想必也有同样的牛，在各自的圈子里转着。

12 月底，二十卷书正在同时进行筹备。方向已经确定，各个班子也已各就各位。

1802 年 12 月 31 日晚，德农放下铅笔，望着靠在书房墙边排成一系列的铜管。四根铜管，用黑漆编了号。一号管里，是他最早的笔记本：亚历山大，穿越沙漠的行军，金字塔的最初几幅画。三号管里，是底比斯与国王谷的测绘。四号管里，是最后的画稿，作于离开前夜的开罗。他起身，取下一号管，旋开管塞。抽出第一本笔记本。它翻开在一幅速写上。朱诺号的甲板，背景是风帆与舰队，画于 1798 年 5 月的航渡途中。四年前。几乎是另一个人了。他合上笔记本，旋紧管塞。把铜管重新靠回墙边。

屋外，巴黎在一座大城市寻常的喧响中走完了这一年。钟声，人语，车轮碾过潮湿的石板路。几小时之后，1802 年将变成 1803 年。《埃及志》将满一岁。还需要二十六年。他任火焰熄灭，走到街上。他漫无目的地走了一阵，周遭是巴黎夜晚的干冷。在格勒奈尔街的拐角处，他停下脚步，抬起头来。天空晴朗。猎户座就在那里，在屋顶之上，恰恰就在他 1798 年冬天于金字塔上空见到它的地方。

同样的星辰。同样的夜。另一个国度，另一种人生。

他回到家，在桌前坐下，打开一本空白笔记本。在第一页的页首，他写下日期。然后在下面写道：“卡尔纳克神庙，多柱厅。中央圆柱：21 米。直径：3 米 50。纸莎草花苞式柱头。”

他开始撰写说明。

而波拿巴则并未等待。共和八年雾月起任第一执政，1802年任终身执政，1804年成为法兰西人的皇帝。这个曾对开罗的学者们说过他们的工作将在他身后延续的人，正在建造某种更宏大也更脆弱的东西：一个政权。《埃及志》将在帝国治下问世。德农将执掌它的博物馆。这场远征在事实上曾是什么样子——岌岌可危，残缺不全，代价高昂——在官方叙事中正逐渐成为国家荣耀的奠基。事情终归就是这样站住脚的。

德农还没有结束。战事即将重启。德意志，奥地利，普鲁士。而随着战事而来的，是藏品。

第二卷完